

趙承信著

獄中雜記

——一個社會學的解釋

燕京圖書館惠存

著者敬啟

目錄

- (一) 鐵窗風味
 - (二) 被審
 - (三) 拘留人之形色
 - (四) 羣體生活
 - (五) 沉思的機會
 - (六) 論學談道
 - (七) 大病不死
 - (八) 上帝之愛
- 附一 社會學註釋
- 附二 後記

獄中雜記

趙承信

(一) 鐵窗風味

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八時三刻我從穆樓課室窗戶外望，看見好幾輛載着日本憲兵的汽車在貝公樓前面停着，當時心裡感到有異。下班鈴搖過，尚未離開課室，即有工友通知我有電話，那是培志來的，報告日美已于今早七時開戰，我答應了一句『沒有關係』，便將耳機掛上。十時，日本憲兵召集燕京教員開會，報告接收燕京大學財產等事，並云對於個人生命財產決無問題。

我因為學校已被日本憲兵圍困，不能回家，只得在林莊家午飯。這時林莊家可熱鬧了，凡是不能回家的，很有幾位來他家午飯，陳其田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飯畢，又來張東蓀先生容庚先生等十多人，大家閒談着，但誰也沒想到同人中會有被扣留的，更沒想到我自己會被扣留。

下午四時與張東蓀先生陳其田先生離開林莊家，到校園散步去，見貝公樓東門前一大群人聽候憲兵發令出校門回家的，我們三人聽了，非常高興，但還沒到放行的時間，

遂先到貝公樓西門去躊躇躊躇，正遇見西苑日憲兵花田氏從門裡出來，陳先生問他能否現在就回燕東園，花田用日本腔的北京語請我們到貝公樓應接室等候放行命令，我又回到林莊家通知同人要回燕東園的，遂又來到貝公樓等候，當時尚不知我們三人即已被扣留了。

在應接室裡，除了我們三人，還有陸志韋先生和趙紫宸先生。五人交談着，轉眼不見了陸先生，問了各位均不知先生的去向，有說進城接司徒校務長的，但見陸先生的帽子和圍巾留在應接室內，故心裡想陸先生許是被傳問話去了。這時已到放行時間，張東蓀先生向我使個眼色，即起身跟隨着群眾出校門去，我想如果憲兵有話詢問，逃也沒有用的，所以沒有走。



過了兩三刻工夫，花田及楊翻譯領着陸先生返回應接室。花田見張先生不在，便罵我們道：

「做錯事的人還要逃走，是應當的嗎？」

「張先生肚子餓了，回家吃飯去。」

在座的同人這樣回答他，但是沒有平息了花田的暴怒，便領着陸先生回燕東園去了。

現在應接室內剩下的只有趙紫宸先生，陳其田先生和我三人。應接室外面站着好幾位英美籍同人，高厚德先生劉兆慧先生還不時進來和我們談話，我利用機會，將鑰匙銀行存摺託劉先生代交培志。高先生忽然望着我們說，

「今天是我來華四十一週年紀念日。」

我立刻記起去年今日學校還爲了高先生開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會，現在不免有些今昔之感，兩眼瞪着高先生，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不一會花田又進應接室來巡視一下，我已準備被傳問話了，但等了又等，仍無消息。快七點鐘了，楊翻譯手裡拿着報紙包着的三份日本飯團進來說：

「你們餓了吧？這裡有日本飯團，是日本憲兵們吃

的，請你們也嚐嚐吧，就怕你們吃不慣。」

我吃了沒有半個，見陳趙兩先生都沒有吃，我也不吃了，當時實在也忘記了肚子餓這回事了。

手裡拿着飯團，陳先生看我一眼，我們一時恐怕不易回家了，但當時還沒完全放棄深夜回家的希望，陳先生說：

「誰先問完出來，在外等着，一同回燕東園去。」

趙先生和我都答應了，三人遂在室內踱來踱去，站了又坐，坐了又站，甚是不安，此時室外已站着一個帶鎗的憲兵。

時間約摸已九點鐘光景，我們三人正在室內徘徊，花田及另外一位又高又胖的憲兵走進屋裡來，後面跟着陸志章先生，劉裕軒先生及嘉通三人。那高胖的憲兵隨即發令道：

「不許說話！」

大家就默然坐着，面面相覷，真有點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形。

不一會，高胖的憲兵又領着後來的三位出去了，再過一會又把我們三位領到法學院辦公室去，原來嘉通他們也在那

裡。沒有多大工夫，張東蓀先生被一個憲兵押着回來了。我見大家沒有顯示着緊急的樣子，我也稍爲放心了。我們這時除了大小便，不能出門外一步的。門外有偽警察看守着，室內不時有荷鎗的日本憲兵進來巡視。

有的憲兵進來的時候，手上常帶着英文雜誌，看過去，才知道是美國『Time』雜誌。想是從對面校務長辦公室拿來的。憲兵還帶着很得意的神氣問我們會不會說日本話，又好幾次給我們紙張，叫我們把自己的名字，履歷等寫上。

雖然得了『不許說話』的命令，但一有機會，大家便輕聲細語地交談着。陳先生坐在我旁邊，我拍了他一下說：

『想不到法學院院長會像註冊時學生坐在這裡等候

見院長時一樣坐着。』

說完，我跟陳先生都笑了。

深夜，正從城裡回來，報告我們校務長還沒從天津回來，博晨光先生也來看我們，憲兵怪他多事，將要扣留他，幸虧正誼替他說是來找他的，才免於難。

這一個晚上，我們都沒有怎麼睡。終夜開談着將來美國空中堡壘空襲東京事。趙紫宸先生將三把椅子拼起來平躺，着睡了一回，憲兵進來看見了，倒沒有干涉；其餘同人多靠着椅背瞌一會眼，就算睡覺了。

天色漸漸的發亮了，這是九號的早上，我看看錶，正是七時，遂到靠近註冊課的廁所去，見有同學在那裡，才曉得在研究院辦公室內還有十一位同學，他們是昨夜九時被扣留的，已在那裡睡了一夜。

整個早上，我們七人又飢又渴。從法學院辦公室窗戶往外看，見貝公樓西門外，穆樓與容樓三間的那塊空地上，滿站着人；男女同學把行李散開在那裡，無條件的受日本憲兵及中國警察的檢查，其狼狽的情形，不忍目覩。只見夏仁德先生，博晨光先生及其他的幾位年輕的美籍的同人，在那裡東奔西跑，無一分鐘的休息，幫着同學捆行李。這時我的理智不能抑壓我的情緒了：戰爭發生得太迅速了，以至於學校尚未充分的準備，遂至有今日這樣慘痛的離散，這使我非常悲憤，再一想到培志和孩子們的安全，又使我非常焦慮。七人中，劉裕軒先生和我是最焦急的了。

不久，嘉通和張東蓀先生又加入我們二人的集團，也發起脾氣來，但陸陳趙三位比較鎮靜。忽然有一位想起叫工友拿水來喝，一會，工友果然帶來一筐饅頭和兩壺開水，我們一時忘了被扣留的事，大吃起來。幾杯水似乎沖淨了身體內不少的热情，室內的空氣也覺稍為鬆弛。

九號整個上午沒有憲兵來騷擾我們，守門的是一名僑警，因此，我們出入較為自由。艾楨從註册課出來，被我們邀進來，對他說了不少的話，我託他把我的自行車送回家，他去推我車的時候，不幸被楊翻譯看見，竟被扣留起來，我看着又氣惱又歎。後來王寶興先生送進來一盒自來紅和自來白，沒有被日本憲兵看見，所以沒有碰上艾楨的惡運。正午時，博晨光先生站在門外用手摸着嘴：意思是問我們吃過沒有，我們點點頭，他才走了。

下午兩點鐘的光景，花田和楊翻譯進來了，領了張趙陳三位出去。三點鐘又來領了我們及同學們到貝公樓西門外，用小汽車分幫送我們到西苑日憲兵分隊處去。在貝公樓門外看見王克私先生，蘇路德教習，馬文綽先生，一時竟說不出話來。還是王先生開口，問我們有什麼話要他

帶回各家的，他用小冊子記下來。同時還把自己的大衣脫給陸先生穿上。花田問王先生願意跟我們一同去不？王先生很幽默的說了一句「我不去！」

第一批上小汽車的是陸先生，嘉通，三位同學和我共六人，楊翻譯用福建話對嘉通說了幾句，嘉通譯給我們聽，說是不害怕的意思，因為沒有什麼問題的。小汽車出校門，一直往北去，陸先生說：

「到西苑去，總比進城去好。」

我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車到西苑時，見先走的張趙陳三位被關在小屋內，我們六人即被押入隔壁大屋內，不一會，其餘的八位同學也陸續到了。有一個東北口音的，穿着藍布長衫，很神氣的樣子走進來，向我們命令道：「不許說話。」

我們在西苑扣留不少時間，大家有點餓了，於是各人將衣袋裡藏的饅頭和自來紅自來白全拿出來充飢。

已經是下午四點鐘的光景了，布！布！布！汽車來了。一個很年輕的憲兵，軍裝上滿沾着塵土，下了兩座汽車，他大概是從城裡來的。不一會，這年輕的憲兵帶上那東北

口音的翻譯叫我們出來，我們在院子內排列成行。正當這時，日籍同人鳥居龍藏先生從憲兵辦公室出來，向我們點點頭，便坐上洋車走了。他大概是替我們說話來的吧？但看他臉上的表情，他此行是沒有達到目的的了！

陸志章，陳其田，趙承信，張東孫，趙紫宸……以後繼續着學生的名字。嘉通的名字，沒有在上面，我很替他高興，希望他是誤連的。艾植是後來才扣留的，所以也沒有名字，我心裡更覺不安。

點過名了，年輕的憲兵即命令我們上載重汽車，並喝令不許在車上說話，違者軍法從事。汽車開行不久，就到西校門，在校門北邊十數步地方略停一會，即繼續往前駛去。見正誼坐着校務長汽車剛巧從西校門出來，嘉通急揮手示意，正誼的車即尾隨于後。

這日正在刮着西北風，坐着沒有篷的載重汽車，大家都感到有點寒冷，穿得少的終于向穿得多的借衣服，這種說話幸虧沒有引起憲兵的軍法從事。在汽車上的兩個憲兵也開口跟我們大談起來了，兵到底也是人呀，那能老板着面孔呢？我心裡這樣想。當時緊張的空氣，也稍為緩和。

車進了西直門時，門警沒有停止汽車檢查我們，我們也沒工夫和心思去分析他們這時的表情。

汽車開得很快，不用三刻鐘，已到沙灘紅樓門前。全體下了車，即入日本北京憲兵總部的電話室，正誼也跟着進來了。電話內司機生忙着接電話，無暇顧及我們，我們遂和正誼在室內細聲談起話來。不久，正誼即離開我們，臨別時，東孫先生囑咐他多來看我們。

正誼走了，我們又被領到客室去了。室內只有幾把大沙發椅子，不够分配。憲兵送進長凳來，大家坐下，隨即任意閒談起來。看守我們的那個憲兵很愛看美國電影，於是那幾位電影迷的同學就跟他大談起來。會客室內有一份日文報，同學劉子健君會看日文，大家請他將報上主要消息翻譯出來，日憲兵也很高興，因為所載的都是日軍勝利的消息。

在閒談時，有問憲兵他們對英美人怎樣處置，他很得意的答道：

「打完仗，通通送他們走。」

又有問及輔仁大學的，他答不用關門，照常開學。

二十四小時內，只吃了幾個饅頭，喝了幾杯水，大家的肚子終於噁哩咕嚕的響了。說話的方向從電影而至戰爭，最後轉至吃飯的問題來了。憲兵很俏皮有問我們愛不愛吃

餡，籍貫——填寫好了。有一個很矮小的憲兵即來領陸先生，幾年和我往地窖子走。在往地窖子的石階上，陸先生說：

罐頭牛肉。內中有幾位很老實的答「愛吃」，也有幾位很幽默的說：「不吃罐頭東西。」然而大家都向憲兵發問：

「單人居住，事情嚴重，數人合住，事情還好。」我點了點頭，就到了扣留我們的地窖子了。

「什麼時候才有飯吃！」

大概是晚上七時吧，那年青的憲兵進來了，他隨即用日本腔的北平話說：

關於沙灘紅樓非刑拷打的傳說，這幾年我們聽過的，實在不少了，這時我們可要實際經驗着了。地窖子內拘留所的門一打開，我就看見兩邊兩排木作的監房；地窖子行人

「請大家去吃飯，快快的走！」

道的當中有一張桌子，牆上還掛着鐵鍊。坐在桌旁的兩名

我們邊走邊說着話，就到了一間很大的屋子，像是辦公室的模樣。我以前到過此地，那時是北大的書報閱覽室。長方桌上沒有筷子，更沒有碟子等，却有幾個拿着紙筆的坐在那裡。年輕的憲兵看見我們排列好了，就訓話道。

憲兵見我們進來，都站將起來，又把我們重新檢查一次，問一聲：「什麼都沒有了？」即將我送到北邊那排木作的監房去，我見監房前面有木柵阻擋，房頂射出暗淡的燈光，房內送來臭味，這一切都使我非常難堪，以前聽過的關於沙灘紅樓的故事，現在一幕一幕的在腦子裡翻來覆去。

「你們的生命絕對沒有危險，很對不起，就請你們在此委曲幾天。」

走到第五號監房門外，憲兵拿出鑰匙來開小木柵的門，

飯是沒有得吃的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鞋襪外，其餘東西統由憲兵部保管。眼鏡經過交涉後，才許我們帶上。我的名字較前，故很快的先把很簡單的表格——姓名，年

隨即命令脫鞋，便把我推進屋子裡去了。屋內地板上早已躺着一位了，他兩眼緊閉着像死了一樣，多麼可怕啊！聽見憲兵鎖了門走開了，他就睜開眼來，吁了一聲，隨即用

手示意，叫我躺下。

我此時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找小便的地方，因為自從離開學校大門，即無機會小解了。遂向這位可怕的同屋請教，他用手指示方向，我不知道桶子會有蓋的，撒到滿地都是。同屋乃起來將我尿濕的便桶邊揩乾，我此時深刻地了解患難相交之可愛了。

憲兵送進來毯子四張，我用鼻子聞一聞，尚不覺有異味，隨使用一張作墊子，一張疊起作枕頭，兩張當被蓋。衣服還沒有脫了，就躺了下去。我兩眼瞪着我的同屋，見

我好像要跟他說話的樣子，他就用左手捂着嘴，右手指着貼在牆上的一張紙。屋內燈光太暗了，我看不大清楚，就站起來仔細看，標題是「拘留人的心得」，一共有四條，無非是說要肅靜，衣冠整齊，服從看守人的命令等。

一時憲兵又來了，站在柵門外叫我，我以為他問我要吃什麼，我便說什麼都可以。原來他送來一條褲腰帶，問是不是我的，這使我很失望。

沒有多大工夫，憲兵又來開門了，進來的是一位同學，我心裡稍安，到底有一位同來的人作伴。我忘記他的名

字，還是他先開口！

「你是趙先生嗎？我是沈聿溫，先生府上是廣東，我也是廣東。」

於是我們使用廣東話對談起來，廣東話說不通時，就用英語來補充。我們很怕那第三者聽到我們的話，所以用粵語英語夾雜着談了大半夜。

因為昨夜沒有睡覺，精神肉體都困憊極了。我對聿溫說：

「我們睡覺吧，明天再談。」

一夜便告無話了。

我合着眼，恍恍惚惚，似睡非睡。屋內空氣非常窒塞，喉嚨乾得很難受，老是咳嗽，我不得不站起來了。眼見聿溫早入睡鄉，但那第三者却被我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實對我很同情，便對我說：

「小木柵門右邊，靠恭桶的那裡有一鐵罐水，乾淨的，可以喝。」

我往前摸索，摸着罐了，但水却冰涼的，過去的习惯使我不能喝這水呢。忍受着吧。憲兵沒有進來干涉，我就輕

步的踱來踱去。還不時聽見從不遠處送來陸先生的咳嗽聲，真是同病相憐的聲調。

兩條腿酸痛得很，還是躺着吧，终于在夢中睡着了。睡了沒有多久，緊張的情緒慢慢的消散了，身體也就感到冷氣逼人。我身上穿了兩件羊毛衛生衣，兩條褲，一件絨襪衫，一件厚羊毛衣，外面套着皮袍和藍布大褂，但身體仍覺着冷。外面颼颼的颳着寒風，我實在忍受不了，還是站起來吧。從窗戶往外看，天色未明。爲着要增加身體的溫度，乃開始作着久已荒疏的柔軟體操。

但我心裡想，還是睡吧，隨即將藍布大褂脫下，將它疊好，用作枕頭，原來用作枕頭的毯子，現在又改作被來蓋了，身體似乎感到暖和一些，不知不覺的才入了睡。

我還在夢中，半溫把我叫醒了，我耳邊仍能聽到屋外憲兵喚着『起床』的怪聲。

起來吧，反正是不能睡了。我正要站起來，只覺得滿身酸痛，四肢散開，不像是自己的了。我嘆了一口氣，現在才覺得過去睡慣了軟床，把身子慣壞了，不然不至于受不了這硬地板的，現在真是笑不得哭不得了了。

我勉強用兩隻手把脖子搖動幾下，頭現在慢慢的可以轉動了。室內非常寒冷，我兩腳亂跳，手也亂動起來，這種動作，不但能增加體溫，亦可減少骨頭的疼痛。

剛叠好兩張被，一個憲兵就進前來了，站在木柵門外向室內四圍看一看，沒有說話就走了。我用兩張毯子當襪子，一張當披風，一張蓋腳，我靠牆坐下，樣子好像街頭的乞丐，不覺自己也笑了。

不久，那位老拘留人站起來了，他到屋的一個角落處拿着一個小碗，送到木柵門旁邊的小竇去。我看他是五十歲左右商賈模樣的老者，遂問他說：

『老先生，那用來作什麼的？』

他正要說話，外面就來了一個人放了一點什麼東西在碗內，他拿來給我看，並細聲地說：

『這是鹹菜，送稀飯用的；今天還不錯，總算不少，三個人够吃的了。』

他剛說完話，又到那角落去拿了三個大碗，蹲在木柵門旁，不久，果然送來稀飯。他又忙着拿水杯給站在外面的那個盛水。

我把稀飯接到手上，仔細一看，那稀飯是大麥米作的，味很香，但那盛稀飯的碗實在骯髒得很。在家裡，這碗稀飯就不會吃的了，但現在境域不同了，而且肚子又餓得很，我便從碗中吃起，吃到肚子有幾分飽了，但碗邊及碗底還有點剩下來，我實在不敢吃下去了，遂問那位老者道：

「老先生，吃不完，怎麼辦？」

「往恭桶倒就是了，反正他們不收碗的。你拿點清水把碗洗乾淨了，預備吃中飯川。」

我于是照他說的做了。渴了一整夜，現在覺得那杯水比那碗大麥米稀飯還好吃，雖然那杯水比那碗稀飯還髒。

飯前我沒有洗臉，但見那位先生用鐵罐的涼水撲撲臉，用衣服揩乾就算了事，現在我算吃完早飯了，就用手絹沾點水擦擦眼睛及嘴邊，也就算洗過臉了，口是用不着漱的，既無牙刷，更無牙膏，那談得上漱呢！我心裡想：這種生活，有生以來，還是第一遭哩，自己也覺得可笑了。

我無意識地學着老先生坐下。那是日本式的坐法，盤着腿在地上坐着。我估據了靠恭桶那邊，聿溫估着當中，老先生坐在極左端。三人坐下，有機會就談起來。我問老先

生的姓名職業。他很不願意說，倒反過來問我跟沈聿溫的關係。我們將姓名籍貫履歷等逐件的說了，他才放心，但關於他個人的事情，還是語焉不詳。這樣我和聿溫跟老先生一時找不着什麼共通點來作談話的資料，於是我們兩人又談起來了。我們最先說着學校此次開門時的情形，後來涉及學生生活，學校課程等。談話的方向由學校轉到各人的家庭境况，人生觀等。聿溫雖是念化學的，但是好動，我念社會學，却好靜，這是我們彼此觀察得來的結論。這時是十號的上午，時間過得還快，不知不覺又到午飯時候了。老先生已站起來，拿着飯碗水杯往小竇那裡去，我跟聿溫也站起來了，因為覺得被人伺候，總有點不好意思的。

此時送飯的還沒有來，趁着憲兵沒有在門口站着，我乃靠木柵站着，兩眼往對面房看去，剛巧對面屋也有一位靠木柵站着，看着我們這邊，我仔細一看，原來是陳其田先生。我記得陳先生昨天告訴我楊翻譯跟他說他和嘉通會被優待住大房間的，還有沙發椅子坐，現在才知道他是被騙了，我們彼此打了招呼，各退回原處，等候送飯的到來。

午飯每人有兩個饅頭，一碗白菜湯，一杯水。饅頭皮很饊，我把皮剝了，用破筷子夾着早上剩下的鹹菜送饅頭吃。兩個饅頭那裡能飽人，就用水填飽吧。好在腦子裡問題太多了，那裡還有閒心去管吃的呢？

中飯完畢，碗也洗過了。昨天夜裡睡不暖，現在又感覺晒了，合着兩隻眼睛，不知不覺又入夢境了，直到聿溫叫醒我。聿溫跟我約定，一個人看着憲兵，一個人睡覺，因為白天憲兵常進來巡查，所以我們無時無刻不是提心吊膽的。

大概是下午三四點鐘光景吧——老先生按着三頓飯來計算時間——老先生站起來，伸伸懶腰，輕步走到恭桶那裡，用布把尿濕的地方擦乾，將恭桶搬到小木欄那邊。我也坐得太久了，感到有點累，于是也站起來，要去幫忙。這位老者的確是熟手，果然憲兵來開門了，我幫着他將恭桶送到屋外，我初時以為這算了事了，那知還得將恭桶送到樓外去呢。

站在地窖子行人道上已有好幾對了，兩人同着一條鍊子，鎖在腰間。我看着鐵鍊，不覺顫慄起來，從今真個作

上囚犯了！用手提着恭桶邊的鐵環，老先生在前，我在後，走到那排人堆裏去，老先生用鍊子先扣在自己的身上，然後又拿那端幫我扣在我的身上。大概有七對吧，大家都鎖上鍊子了，一個憲兵在前，一個憲兵在後，手裡都拿着短槍，押着我們到樓外去倒恭桶。

在這紅樓的西北角落裡，原來還有一堆小房子，其中有一間門外寫着「支那人廁所」。這便是我們拘留人倒恭桶的地方。廁所旁邊小屋內，還有自來水管，恭桶還得用自來水沖盡，拘留室內那罐水也于此時盛滿帶回去。其實倒恭桶打水，都很平常，不足為奇，但排成隊伍去倒，倒很新鮮。這次倒恭桶時，見到幾位同學，教員却只有我一人。在路上，老先生偷着機會跟別人說話，我見着同學，只點點頭，笑一笑，却不敢說話。回到拘留室內，我對聿溫說：

「這倒是一種好運動，明天你不妨試試，換換空氣也好。」

這個下午，我沒有和人交談的念頭，只在沉思默想裡渡過了。究竟憲兵會問什麼呢？我從個人的活動，想到學校

的工作，看看有那幾件憲兵會認為是抗日的，我又應當怎樣對付？關於我個人的，我想到以下的幾件：（一）與南方朋友通訊，現在辦公室內還有吳師及安宅兄的信呢；（二）會將社會部定章印送同學；（三）同學借過我家開會，討論抗日工作；（四）對同學談話——我平常說話不很仔細——差不多什麼話都說過，或被作間諜的同學聽了報告進去了。（五）清河實驗區房子，清河滿蒙織呢廠曾經多次想租用，都被拒絕了。又日本軍修築馬路，將實驗區土地佔用了，由我交涉要求賠償費。

關於學校方面的：（一）法學院，研究院，校務會議等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又校務長南下歸來談話講演等多有鼓動抗日的嫌疑。（二）在拘留所內，教職員中如張先生陳先生陸先生嘉通等，他們對於詢問學校回答一定會跟我的回答作比較的。假如問到教育部通令等，我將怎樣回答呢？說出真話來，即可證明燕京大學抗日了，不說真話呢？他們幾位是怎樣說的呢？同學中如慰祖，子健，克蔭，他們的對答或許與我的有關，我將怎樣措辭，才能不與他們矛盾呢？

憲兵會問什麼問題，我在學校被扣留時已思索過不少了，現在又逐條分析，心裡一緊一鬆，再也不能安定下去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心裡稍為有點把握的就是林莊其玉他們都沒有被扣留，從這個事實，我在心裡下了一個結論：憲兵對於燕京的活動沒有知道多少。

關於過堂時的應付法，慢慢的我想出兩個原則來：第一，把自己的地位降至最低級，把自己的活動減至最低限度，使憲兵覺得我是一個沒有多大出息的人；第二，把自己跟其他的人分開，絕對不牽連到其他的人，不再拉進新的人來，特別是法學院的同人。關於第一條原則，我想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因為我在學校裡的地位本來不高，原是無關輕重的。關於第二條原則，只要我的頭腦冷靜，不亂說話，也不會太困難的，心裡既覺得這兩件都可以做到，情緒便稍為放鬆了一點。

這時我的沈思，又被那位老先生給打斷了，他又拿着碗往小寶那邊走去，我也站起來，從窗戶往外看，天色已黑了。我問：

「老先生，什麼時候了？」

「快六點鐘了吧，晚飯快來了。」

「吃什麼呀？」

「大概是日本小鹹魚和饅頭。」

不久，送飯的來了，我接過來看，果然是小鹹魚，每人兩尾，又跟中飯一樣每人饅頭兩個，水一杯。老先生最怕吃鹹魚，把他的兩條分給我跟聿溫了，聿溫和我都很愛吃，可惜憐點。但這晚鹹魚吃得太多一點，開水又不够，口裡很渴，整夜有點難受。

飯畢，跟兩位同屋的說了幾句，我又繼續思索下午未了的問題。看守的憲兵呼喚着「睡覺」，我才無意識地站起來，把毯子鋪好，但這時候思想似乎有點過度，血都注在腦部，那裡還睡得着呢？躺了不久，我又靠牆站着。站了不知多少時間，才又躺下，好容易才入睡。睡着的時候總是夢着在冰水池中沐浴，終於因為太冷了，我就警醒了。窗外颼颼地刮着風，我這一整夜，簡直不能入睡。

正在發愁，忽然來了一個憲兵，我告訴他太冷了，有沒有的餘的毯子，他不懂我的話，帶了一個懂日本話的犯人來作翻譯，他似乎了解了，最後他說：

「大家一樣，沒有了，睡覺！」

他身上穿得不多，站在木柵外，我見他也打顫。說完，他走了，我也只得躺下。

躺着，似睡非睡的，在朦朧中又聽到「起床號」令了。因為這幾夜都沒有好好地睡過，我感到有點頭痛。躺在硬的地板上，使我的骨頭也疼痛難支，但是憲兵快來了，我得趕緊疊毯子。

送飯的又來了。渴了一整夜；那杯水比那碗大麥粥還有用。我早已跟聿溫商量多要水，我把一個大碗送給送飯的，請他多給我一點開水。那個送飯的是一個胖子，很好的，他看看沒有憲兵跟着，就很快的滿足了我們的要。一大碗水，三人分，雖然還不够，但總比沒有好。那位老先生尿水特別多，也很需要水。但他告訴我們他來了三個多禮拜了，總不敢多要開水，渴時只得喝涼水，可惜涼水喝得太多，又要瀉肚了。現在既能多要開水，倒覺得快樂許多。中飯時，他手拿大碗向送飯的多要開水，却碰了一個釘子，他便又喪氣了。我覺得在拘留室內，一個人的喜怒哀樂總是無常的。

早飯過去了，照樣沒有洗臉。這是十一號的早晨。我對聿溫說希望我們十八位當中，會有一二位去過黨的。果然，少頃，即聽見憲兵叫着劉豁軒和劉子健的名字，但是否帶去問話，我們却不得而知了。

我無聊地向對面監房望望，恰巧見陳先生站在那裡，我們沒有打暗號，只是招呼一下。陳先生似乎很規矩，總不會在木柵旁多站一會的。

午飯時，才得了一個半飽。我又跟聿溫分工合作地一個看守，一個打盹。大家合了一會眼，即又感到非常無聊，談話一時又找不着什麼材料。沈默良久，還是聿溫先開口：

「昨天我們談得很有趣，今天採取辯論方式吧。但是辯論什麼呢？」

大家靜默了一會，又是他先開口了：

「你是社會學家，我們辯論婚姻問題吧！」

我自然很感激他的盛意。

好容易挨到倒恭桶的時候了，聿溫見我頭痛，外面天氣雖是寒冷，但屋內只有三個人，他得要跟老先生出去了。

我靠木柵往外看，但還得提防憲兵進來。不一會，他們回來了，聿溫很高興。他說：

「外面下雪了，活動，活動，倒不冷。」

我問他見了誰，他說，

「好幾位同學，還有陸志章先生。」

「有研究院院長跟你們一塊倒恭桶，一定給你們同學不少安慰。」

說罷大家都笑了。

這時，見劉豁軒和劉子健從我們拘留室門前經過，又帶回他們的拘留室去了，然則他們並沒釋放。起初我們見他們出去之後，老不回來，以為他們都釋放了，誰知他們又回來了，那麼他們準是去問話去了，不知憲兵會問他們什麼來着，心裡很是納悶。

晚飯前，我跟聿溫向老先生打聽憲兵問話的方式，他逐件說了。我們又問他憲兵問話時會不會打人。他說他沒有挨過打，小心點說話，不會挨打的。我們聽了，倒稍為放心。但在外面聽過很多沙灘紅樓非刑拷打的故事，所以對於老先生的話，只能半信半疑罷了。

晚飯過去了，在談話中好不容易又挨到睡覺的時候。我很怕睡覺的，一則天氣太冷，二則地板太硬，在在都使我不能入睡。但已盤腿坐了一整天，現在有個機會躺下，倒也不錯。

我白天覺得暈，想睡覺，但一到晚上，却精神十足了，越想睡，越睡不着。此時外邊正刮着大風，我從考慮憲兵問話又思念到家中的四口。記得正誼告訴我們說九號學生搬出學校，十號十一號便要輪到教職員了。在這樣冷天氣裡搬家，孩子們不凍死，也會凍病的。至於東西怎麼搬法，那更談不上了。假如我在家裡，還可分擔培志的工作。現在呢，不但不能分擔她的工作，反來增加她的憂慮。我越想越焦急，傷心，眼淚差不多都流了出來。一時禁不住寒氣，思想又從家裡轉到自己的身上。我終手又站起來了在屋內慢步的踱來踱去，心裡一狠，想道：『也罷，全家死了倒也乾淨。』一想到這裡，倒不覺得太難受了。這一夜又在這種情景中瞋着幾次眼，好容易才渡過了。

早晨起來，屋內又添了一位新來的。聿溫問他什麼時候進來的，他說是昨夜從隔壁屋搬過來的。這位新同屋，大

概有二十多歲，工人的模樣，舌頭很短，說話很不清楚。他靠近老先生那邊坐着。他來了，老先生就不感寂寞了。我聽見他昨晚跟老先生談了大半夜，想來他們倆必定有點連帶關係的。現在我們的屋內，分成兩個團體，互相交談着。

大家談話雖覺有趣，但那年輕的時刻不絕口的嚷餓，早飯時我剩下的小半碗大麥粥送給他吃，但也無濟于事的。中飯時，我又把剩下來的饅頭皮送給他吃。我還多要了一碗水，他得着四分之一，不餓，還得要喝涼水，所幸他的身體強壯，住了快一個月了，沒有病過。

上午，聿溫跟我很注意有沒有人過堂。中飯過去了，仍沒有聽見叫燕京來的。我們此時又渴望着外面親戚朋友替我們努力，那麼不用過堂就可以釋放了，多麼好呀，但恐怕這只是夢想而已。

下午倒過恭桶，忽然有一個憲兵站在木柵外叫聿溫，初時我以為叫他去問話，原來是給他送來牙刷洗臉毛巾等。聿溫一時很高興，我却很惆悵，從沒有得到家裡送來的東西，想到家裡一切可能的遭遇，心裡實在難受。聿溫一陣

高興過去了，便又發起愁來，他說：

「東西來了，大概外面營救沒有效了。」

接着，我們聽見憲兵叫着好幾位同學的名字，大概他們也是接到親友送東西來了。

我這幾天脾氣越發越壞了，睡不夠，吃不飽，心裡又焦急。老先生看着我發怔，對我說：

「趙先生，你瘦得很多了，看你這幾夜總是睡不着，我也替你發愁。」

我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呢，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晚飯來了，還是小鹹魚兩尾，饅頭兩個，開水一杯。韋溫計算每日我們從食物中所得的熱力。他說我們所得的熱力約及我們消耗的一半，這怎得了？我對韋溫說：

「照這幾天的情形來說，我恐怕精神上肉體上都不能再維持兩個星期了。」

我們都認為對於知識份子沒有比這種懲罰更難堪的了。

好容易又挨過一夜了，這是十三號的早上，正是星期六，吃過早飯不久，老先生便告訴我們每星期六要出去洗浴的，我怕冷，會招涼，先擬不洗了，但借此洗洗臉，倒

也不錯。不一會，憲兵進來說：「洗，洗，」隨即開門，

我們不由自主的便脫了衣服，剩下內衣，跑到浴室去了。

浴室裡已有好幾位同學在那裡，我見他們很得意的洗着，我也解下內衣，借了同學的肥皂，擦在身上，然後用水來沖，不知爲什麼，憲兵想用棍來打我，有懂日語的告訴我小心臊子泡，憲兵說浴槽內的水給弄髒了。

浴槽是用木做的，可容兩個人。接着木槽的一邊有一大鐵罐。罐底有一火爐，燒着火煎水，連貫木槽與鐵罐的是一枝很短管子。我把身上臊子沖掉，就學着其他各位一樣，跳進木槽。槽裡的水燙得很，我在槽裡泡不到兩分鐘，就跳出來了。拭去身上的水，披上衣服，穿上鞋，就跑回監房。好不舒服的經驗，但沒有招涼，心裡稍安。

星期六過去了，沒有聽見有人過堂的消息。星期日我們更不希望會有人被傳過堂的，星期一也照樣沒有一點消息。我們被扣留足足一星期了，到底作了些什麼了？從心裡的難過處說，這一星期比一年還長，我于是想起「三秋」的意義來了。但從活動的價值來看，一個星期本來可作不少事的，假如讓我們看書，最少也看完一千頁，如

今日白白消耗了七天，却又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我想時間的意義是因各人的視點不同而有異的。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是我們被扣留的第二個禮拜的第二天，住在沙灘紅樓，却剛剛一週間。對於地板地慢慢的也習慣了，不洗臉的習慣也早就養成了，但滿肚子的牢騷，却沒發洩的機會——假如憲兵現在把我放了，我遇着我能打罵的人，必然把他們大打大罵一頓；可惜在拘留室內那裏有這個機會呢？只得將滿嘴罵人的話往肚子裡咽，將要打人的手，打在自己的身上。

這一打，倒把自己的理智打出來了。我想這種懲罰算得了什麼？這一星期內送給太平洋大魚肚子裡的死屍不知已有多少。中日打了四年半的仗，不知犧牲了多少有為的青年。我現在不用工作，反有得吃，還有什麼脾氣可發呢？回想燕京大學這幾年來，拼命抵抗日本勢力的侵入，而且還做過不少愛國的活動，難道日本軍人還不恨我們入骨嗎？先扣留了七位教職員，十一位同學，這種懲罰不得謂之太重吧！這樣一想，我倒是心平氣和的了。懲罰吧，讓日本人懲罰我們吧！只要他們把這幾年積下來的心頭仇恨

發洩了，得了滿足，我們這些人就可重見天日吧？但不知他們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滿足。我就這樣用感情的衝動與理智的鎮壓來紀念這一週間的生活。

『睡覺，』『起床，』又渡過了這可怕的黑夜。這是星期三（十七日）早上，我想這也不過是平常的一日罷了。早飯過去了，午飯又過去了，倒恭桶又過去了。我看見對面屋的陳先生今天也出去倒恭桶了——這還是陳先生頭一次出去呢。好容易等了一個禮拜了，今天出去吸吸新空氣，倒也不錯，我這樣想着。不料陳先生剛回到監房，就有一個憲兵領着一個翻譯的來請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我看看聿溫，聿溫看看我，還沒有說幾句話，對面屋的木柵門又開了，原來陳先生已回來了。我對聿溫說：

『不會是問話吧！不然，那能這樣快就回來了呢？』

我用手給陳先生示意，他也似乎用手示意，我跟聿溫站在木柵旁邊看着，但不了解是什麼意思。問話不問話也罷，反正日本憲兵還沒把我們忘掉。

快到睡覺的時候了，忽然聽見對面監房，有一位大叫大嚷的。我和聿溫靜聽，原來是叫爸爸媽媽的，我對聿溫

說：

「怪可憐的，他準是監禁瘋了！」

一時憲兵過來，問他曠什麼，他說：

「我看見我媽媽抱着我的小孩，又聽見我爸爸在叫我。」

我聽着實在可憐他，同時又可憐我自己。

好容易又挨過一夜，我現在倒慢慢的把憲兵問話這椿事擱置在腦後了。家裡的問題老想着它也是沒有用處的，反正搬家的事早已決定了，就讓它自然演變吧。我此時忽然

入社會學的問題來了，記得燕京被迫停辦前兩個星期，我還在社会研究法班上講過美國社會學家 Lintelman 的局內觀察法的 (The method of participant-observation, 見氏著 Social Discovery) 現在我是一個拘留人，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來試試林氏的研究法呢？(林氏的局內觀察法是把一個社會學家跟一位局內人合作起來做研究工作的，原是兩個人合作一事；後來社會學家把林氏的說法修改爲一個人做着局內活動 Participation 與社會學家觀察社會活動 Observation 兩種)

我一面想着，一面站起來，先把拘留室的物質設備重新注意一下。第一：每間拘留室實分內外兩間，外間沙灰地，又分藏物小室及行人路兩部。並且外間與地窖子的過道隔着一對木門，這個木門常開着，但有時也關着，因爲怕拘留人看見過道上的來往人。內外兩間隔着木柵。從大木門至小木柵門，約五尺距離。

在外間靠木柵的一角有一長約三尺的一排暖氣管，但我們這第五號房，却是冰涼的。憲兵不時進這外間來巡查。裡間約有十三尺見方，左邊還往外間凸出約有三尺見方的地方，是放恭桶的。裡間木柵以內的三個牆壁都是木板做的，大塊木板釘得還密，地面上也鋪着木板，但很不嚴密，故老鼠常從大孔隙鑽出來。第五號房座北朝南，北牆往外開着一扇六尺寬，三尺高的大窗，窗的橫豎，間隔着鐵條，還有兩扇玻璃窗門，是關着的，但西北風常從孔隙處帶進沙土來。通外間的木柵門約三尺高，二尺寬，木柵門旁邊有一小竅，即前面說過，專爲領飯用的。

第二，吃飯的用具：每人有一個四五寸直徑，深約二寸半的飯碗，一個六寸直徑，深約一寸半的盤，都是鑄作

的，另外還有一個二寸直徑，深約三寸的洋瓷漱口盂，作水杯用的。

第三，坐臥的用具：初時每人有四張毛毯，後來人多了，就減少了一二張。毛毯的大小不一，普通約寬三尺，長五尺。厚度亦不一致，我有一張毛全脫下來了，連毛巾被還不如。那位老先生却有一張很舊的大棉被。

第四，屋內還有一個木製恭桶。和一個鐵水罐，這是公用的。恭桶每天由拘留人帶到樓外去傾倒一次，順手就把鐵罐注滿了水，帶回來。

把這些物質設備記在心裡，我又往四邊牆壁去細細觀察一番。原來木牆上用尖硬的東西，畫了許多記號，還寫了不少的詩詞。看來「正」字畫得最多，必是用來記拘留日子，我慢慢地計算拘留的時間是七天到一百天。當我看到一行有二十個「正」字時，心裡又胡思亂想起來，不由自主地便從社會觀察者的地位回復到拘留人的地位了。在這裡住一百天，那裡受得了呢！

送飯的走來，才把我的心思打斷。我正蹲在小竇的旁邊，又看見小竇的上頭寫着四句，「此竇可領飯，宜蹲不

宜站；循規爲上策，飯後思雄辯。」下款寫着「過來人題」四個字。我覺得寫得很有意思，頗能勾勒出拘留人的生活狀況。

時間過得雖然很慢，但現在我覺得並沒白白地耗費時光了，因爲我漸漸地對於我現在的生活感到有一種特殊的興趣了。但我又希望能早日脫離囚籠，所以盡我所能的把目見耳聞的事情，都牢牢地記着，預備回家去寫文章。

倒是來得真巧：我正在想着寫文章，卡溫就問我：「假如你要寫文章，你想用什麼題目好？」我答：「你有什麼好意見，可以貢獻給我？」他說：

My funlough in prison 如何？

我曾告訴他今年本來是我的休假期，想不到會在這裡休息起來了，所以他給我出了這個題目，竟使我哭笑不得，呆了一會，才答他道：

你給我的題目不錯，但我想還有一個更好的。かみ (Kame) 這個題目，你看如何？」

原來かみ (Kame) 這個字是我學會的第一個日本字，即從那年輕的同屋學來的。當他要便紙的時候，他就說：

「看君，かみ (Kame)」

憲兵聽了，就給他紙了。聿溫見我要用這個字作題目，不覺說道：

「你未免太 sarcastic 點了。」

聿溫說完，我們都笑了起來。其實我心裡已經有了一篇文章的題目了：那便是 *An American-trained Chinese Sociologist as a Japanese prisoner in Peiping at the Outbreak of the Nippon-ABCD war*，我現在天天都想着這篇文章，看怎麼寫法才好。

對於拘留室的物質設備，既已相當熟識了，我的心思乃轉向回憶過去十天的生活去了。對於過去這十天的生活，倒覺得很有趣，但心裡仍是相當的焦急。雖然作着社會學家的活動——社會觀察，但自己終于擺脫不了拘留人的身份。夜裡越加寒冷，越使我感覺到拘留人的苦痛，同時夜裡的黑暗——燈光不够亮——又使我非常煩悶。

星期六又來了，早飯過後，屋內我們四人都脫下外衣，準備去洗澡了，果然進來一個憲兵，我們趕緊問他：

「是不是去洗浴？」他答：

「洗浴慢慢的。」

說着，就帶了那位老先生和那位年輕的出去問話。不久，我跟聿溫也就到浴室去了。今天我怕冷，只洗了一把臉；又洗了一下腳，便跑回屋裡來。中飯時，那兩位才回來，飯畢，又被叫去問話，直到吃晚飯時才回來。原來星期六下午，憲兵也不休息的。我心裡這樣想着，好像又觀察了一點新事態似的。

那兩位一回來，即彼此交談着，談得都有點面紅耳熱。但談話的時候，那位老先生眼總是朝向木欄那邊去的，那位年輕的却因談得太興奮了，就把憲兵進來視察這樁事志得一乾二淨了。我跟聿溫看見憲兵輕步地進來，就喊了一聲，可惜已經來不及了，那個憲兵 *ment* 一聲，用手指着那位年輕的，大家都裝着沒有聽見。憲兵惱了，又 *ment* 一聲，那位年輕的沒法，只得站起來，鞠過九十度角的躬。憲兵還不满意，拿起劍鞘就要打，但那年輕的站得距離遠些，劍鞘不够長。那年輕的這時有點嚇壞了，更不敢向前迎去。終于憲兵去拿鑰匙，開門進來了，舉起劍鞘，往那年輕的頭上亂打。那年輕的只在那裡哭泣，哀哀求饒。打了

不知幾十下了，憲兵似乎有點累了，可是還是不能滿意，又用穿着皮靴的腳，踢了幾下，才得意地出去。我心裡好像被針刺了幾十下似的，但那位年輕的，一等憲兵出去，

又笑了起來，雖然還不時用手摸着頭頂。這時沙灘紅樓非刑拷打的故事，又在我腦海裡，一波一波地翻騰着。憲兵打拘留人，這還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呢，但在其他拘留室內憲兵打罵人的呼喝聲以及被打的嚎哭聲，却早已聽得多了。

挨過了一夜，今天又是星期日了。大概因為昨天準備洗澡，衣服脫得太多了的原故，那位老先生招涼了。同時他昨天過堂回來，太興奮了，晚上睡不着，早上有點頭痛。他說：

「屋子太悶了，空氣很不好，我想請憲兵開窗，你說好不好？」我答：

「好！」

不一會，憲兵來了。那位老先生站起來，向憲兵鞠了

個躬，然後說道：

「我頭裡有點痛，屋內空氣不好，請你開開窗。」那憲兵說道：

「你來，我看看。」

見老先生走進木欄。那憲兵即舉起劍鞘照着老先生的頭打了兩下，並問道：

「頭不痛？」老先生答道：

「謝謝，不痛了！」

不知是嚇壞，抑是為別的，他果然整天不覺得痛了。這種醫病法，我倒是初次開眼，我心裡這樣想着。

又是星期一的下午了，我們被扣留，整整兩個星期了。

忽然一個憲兵站在木欄外。叫我的名字，我正跟聿溫說話呢，不提防這一叫，嚇了一跳，定了定神。站起來，硬着頭皮往前走。見憲兵手上拿着一包東西，他指着問道：

「這是你的。」

我打開一看，原來是家裡送來的衣服，牙刷，牙膏，胰子等，才放了心，遂答道：

「是我的！」

我趕緊脫下髒衣服，交給憲兵帶走，聿溫很替我高興。但送來的那件衛生衣却是有刺激性的，我是不能穿的，培志也知道這事的，怎麼又送了來？我心裡又是痛苦，又是生氣。痛苦的是培志的情緒大概太紛亂了，沒有仔細看看衣

服，就送了來。生氣的是培志怎麼兩個星期才把衣服送進來，偏又送錯了。也罷，反正拘留室這麼髒，換不換衣服，也沒關係，我的理智又把我的情感壓下去了。

吃過晚飯了，我跟聿温又把剛才包衣服的紙細細的檢查一番，看看有沒有寫着什麼字。果然有，紙上寫的是：「送到徐軒先生。」我才知道其他的同人一定也收到家裡送來的東西了，而且是一同送來的。我想了一想，便對聿温說道：

「教員一定沒有搬家，這倒是好消息。但是爲什麼不搬呢？趙先生不是明明說兩天內就要搬的嗎？」

我們猜了許久，發現兩個可能：第一，教職員請求緩搬；第二，憲兵改變了態度，要監視燕京的教職員，等完結了案子，才讓搬。我們覺得第二個可能性更大，我們很怕燕京的案子會鬧大了，於是兩人又發起愁來，我由自主地往最壞的可能的方面想去，用慣了的 *hoping for the best,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的木鐸，一時解不脫我的憂慮與煩燥，終于一夜又不得安寢。

星期二早上起來。我覺得頭很痛，看看老先生，他果真

大傷風了，我想是被他招上的。聿温這時也怕被招上了，我們都好像大難將臨似地恐慌。假如傷風不好，弄壞了，變成肺炎，那只有九死一生了。家裡如果只有培志一人，倒也罷了，但是現在還有三個小的，可怎麼辦？想至此，心裡酸痛極了。「願上帝保佑我啊！」有好幾年沒有祈禱了，現在不由自主地向天呼籲了。

太陽出來了，屋裡稍爲暖和一些。我頭重重的，站起來，向憲兵要了兩片阿司匹靈，吃了就躺下。本來在拘留所裡，就是有病，也不能躺下的，但是我的確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勉強躺了，犯了獄規，再說吧！

睡了快有一個鐘頭吧，頭倒不覺得痛了。起來吧，快吃午飯了。」聿温對我說。

還好，待我睡醒了，憲兵才進來，他見我們四人好好地盤腿坐着，沒有說什麼，就走開了，我總算有運氣，幸免於罰了。

又是一天了。星期三早上，老先生見我吃過藥，倒有點効。他本來說日本藥有毒的，不肯吃，現在却也動心了。剛好，憲兵走來，他就向他索藥。但不知是換了憲兵，抑

是憲兵因人施藥，竟瞪他一眼，就走開了，原來拘留室內也有不平等待遇呀！

老先生病了，我也病了，倒恭桶時，那位年輕的很不願意出去，他說：

「怪冷的，我不去了。」

老先生真是好人一個，扶着病，跟聿溫出去了，我心裡很不舒服。聿溫倒完恭桶回來時，我對他說：

「那個年輕的，這幾天太懶了，地板也不幫着擦，恭桶也不幫着倒。我現在要做個試驗，看看有沒有効。」

晚飯來了，我把吃剩的饅頭皮倒在恭桶裡，那年青的奇異地望望我，好像問我爲什麼不再把吃剩的東西送他吃，但他沒有開口，我也裝做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起來，接過大麥稀飯來，我又把吃剩的倒了，那年青的，又看看我。我覺得機會到了，遂對他道：

「你太懶了，我再也不給你吃的了。」聿溫又加上一句道：

「你還不幫着擦地板！」

能吃的年青人，爲着肚皮問題，果然站起來，拿着一塊

布開始工作了，適當的刺激，得着預料的反應，我心裡這樣想。可惜這個環境太簡單了，若在人事複雜的社會裡，刺激與反應恐怕沒有這麼容易控制的。一時我又想到社會學實驗問題來了，又想到社會學系這幾年來在農村裡的研究工作，沒有得到預期的收穫，就遭此次學校解散而停頓，心裡很是難受。

老先生一共病了三四天才痊愈。好在家裡給我送來半打手絹，我拿一條包上鼻子和嘴，我的傷風便漸漸地好了。聿溫對我說道：

「老先生很羨慕你的手絹呢，爲什麼不送他一條？」我覺得聿溫說的很對，毫不猶疑地就送給他了。老先生接來手絹很是快樂，但又覺得手絹太乾淨了，捨不得使，用鼻子聞聞，就收起來了，過了好幾天，才拿出來用。

現在屋內四個人都很熟識的了。那位年青的是農村裡的勞働者，除了耕種幾畝田地外，還有點小販的工作。那位老者在馮玉祥將軍某部下曾經充過書記，後來才改作小販。他們兩位，這次被捕的原因，都是因了犯着和八路军作買賣的嫌疑。在憲兵部裡住着的有十二三位都是爲了這

個原因。在我們未進來之時，他們已被問過多次了，但和我們住了十來天了，還不見他們再被問過，這幾天憲兵却又忙着他們的案子了，按我的推測，他們的案子早就該結束了，而還在磨磨不前，真叫人感到憲兵部工作效率太差。

有一天上午，那年青的過完堂了，下午沒事，倒恭桶時，他很願意出去，我也想活動活動，于是我和他一同出去倒恭桶了。在路上一得到機會，他便和人說話。回來時，他正要跟走在前面的一位說話：我見憲兵瞪着他，趕緊拉拉身上的鐵鍊，他會意了，不再說下去。憲兵站在他旁邊，對着他罵了幾句，我以為就沒事了，一進屋裡，我即對聿溫說：

「在路上，這位年青的險些被打了。」

話還沒說完，一個憲兵即近前來說：

「是他！」

木柵門開了，另一個憲兵進來，向那年青的喝道：

「你說什麼？」年青的答道：

「我沒有說什麼。」憲兵說：

「路上我見你說話！」

那年青的正要答話，憲兵早已一掌打到臉上來，繼之一腳踢過去。第一個憲兵又送進來一根長約五尺的竹桿，那進來的憲兵就接在手裡，向那年青的亂打。打得他大概受不了了，他就跪下去求饒，憲兵順勢一脚又把他踢倒下。這時，那個憲兵似乎才有些滿意了，遂揚長出去。我的心還在志志地亂跳着，而隔壁拘留室裡又有打人的呼喝聲和號哭聲傳出來了。那位被打的想是我同屋的夥伴，也是因為在路上說話而被打的。

屈指算來，我們來到憲兵部已有兩個星期了，老先生和年青的接連過堂數次，即蓋了手印。據他們說，這就算結束了。憲兵對他們說：

「你們都沒有罪，遲幾天就可以放你們了。」

他們兩人聽了，都非常高興，打算着出去後，怎樣理髮，洗澡，照像，吃頓好的。我跟聿溫都向他們道喜，並請老先生給家裡帶信，送些厚衣服和食物進來，又說了些感謝他的話，他一一都答應了，並說道：

「用不着感謝，反正大家都是患難的朋友。」

聽了這句話，我差不多流下淚來。

自從家裡送來手絹，手巾，牙刷，牙膏之後，我又開始過着半文明的生活了。早飯時，總是多要開水，爲的拿來嗽口用。家裡送來的兩塊毛巾，我用一塊洗臉，一塊包頭。因爲家裡沒有送厚衣服來，我身上仍然披着毛毯子。頭上裹着毛巾，身上披着毯子，望過去，儼然是個叫化子，但爲了暖和，我也顧不得許多了。憲兵檢查時，看見這樣子，就來干涉。我說：

「太冷，沒有法子！」

他倒沒有要打要罵的狠相，我更不怕他的干涉了。

照例，每天上午和下午，憲兵進屋來檢查一次。有一

天，我跟聿溫不約而同的問來檢查的憲兵道，

「爲什麼還不過堂？」我更加上一句道：

「等到我們凍死了，你們就沒有機會問了，豈不白吃了你們的傻頭？」憲兵答道：

「我們不管這個，沒有法子。」

憲兵檢查時，看上我們的皮袍了——特別是聿溫那件白羊皮的——總是向我們笑着問皮袍的價錢——所以我們就敢和他說話了，每天來檢查時，我們沒有不和他說話的，因爲在屋內說話的機會實在太少了。假如現在憲兵放我回家，我的話說上一整日一整夜也不會完的。

(二) 被審

這時聖誕節快到了，在平時我對這個節期並不感到多大興趣的，但現在呢，節前恐不能回家了，一旦失掉了這個聖誕節，倒覺得非常難受了。跟着聖誕節來的，是陽曆元旦，我們此時只渴望着外面營救我們的親戚朋友，會利用這元旦的名義來請求日本憲兵釋放我們。

聖誕節終於到了。聖誕前夕，我在夢中似乎還聽見燕京的聖歌，醒來不勝惆悵。下午聿溫到外面去倒恭桶，見落着滿地的雪，回來興奮地告訴我，我們都覺得聖誕節下雪，是最可愛沒有的了，然而今天不能在家裡享受這個佳節，不覺太息登連。但一想在這聖誕節期間，各處戰地不知堆積了多少屍體，一時不由自主地我又向天呼籲了：

「願上主用這純白無瑕的雪花洗淨人類的罪惡啊！」

聖誕的第二天下午，剛倒過恭桶回來，正跟聿溫聊天，忽然一個憲兵跟着一個穿藍布大褂的走進來，叫着我的名字，我沒有提防，倒嚇了一跳，覺得大難臨頭的，身上出着冷汗。我站起來，憲兵已把木柵門開了。我跑出來，很快的穿上鞋，就跟那個穿藍布大褂的慢步向前走。走到放在第三第四號房之間的那張桌子旁，穿藍布褂的即向憲兵報告我的名字，憲兵就在名單上作個記號，我們又往前去了。

邊走，那個穿藍布褂的邊問我：

「你是社會學系主任？」

「是。」

他的態度倒是很客氣的，但我怕他繼續問下去。這種非正式的話，像冷箭一樣可怕，比較難于應付的，幸虧他倒不再問下去了。不一會，就到了一個辦公室。

辦公室內擺着一張很大的桌子，桌旁擺着三把椅子，坐在迎面椅子上的是一個小矮個子的，穿的却是西服，小臉上帶着大眼鏡，睜大近視眼盯着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總辦燕京大學案子的上村。

一進屋，穿藍布褂的就讓我坐下，我說：

「不必客氣，站站也好。」

上村很得意的樣子說道：

「坐下說話！」

我也不再客氣了，就坐在第三把椅子上，那個穿藍布褂的即坐在我對面的第二把椅子上。

這時，上村還是瞪着眼睛我，做着各種怪臉。我忽然想起耶穌被審時的情形來了，於是低下頭，避開他的眼光，讓他任意變怪臉給那個穿藍布的瞧吧。我這樣一作，倒好了，他覺得沒有意思了，就開始用吃人式的詰問話了。

「名字？」

「趙承信。」

「籍貫？」

「廣東新會。」

「學歷？」

「民國十九年燕京大學畢業；十九年秋到二十年夏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肄業，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美國米希干大

學研究院肄業」

「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呢？」

「回國供職實業部」。

「不是！」

「是……」我正想繼續說下去，却被他的話打斷了。他喝道：

「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你在莫斯科抗日大學讀書，你的同事和同學都說你是共產黨員。」

「不是！」

「你不說真話，就先開你五年再問你！」

「的確不是！你不信，可以查實業部的公報，那裡全有記錄的。」

「誰有工夫去看你們實業部的公報？我們對你的工作早有詳細的記錄了。」

我見這一番話並非問話，沒有反駁的必要，就低下頭，不再言語。這時上村和那穿藍布的說了許多日本話，我猜上村一定懂點中國話的，他好幾次不等翻譯就打斷我的話了。他們的交談，正好給我一個鎮定的機會。我正在思索

的時候，又聽見穿藍布褂的開口了：

「東亞新秩序是什麼意思？」

「我所知道的，只是從報紙和雜誌上得來的一點。」

「這算是答語嗎？」

「我正要說下去！」

「簡單地說一句。」

「簡單的說，東亞新秩序就是你們所說的中日合作。」我沒有提到「滿洲國」，大概上村也忘了還有一個「滿洲國」，所以沒有再問下去，却跟翻譯的譏笑我道：

「哈，哈，他也懂得東亞新秩序的意義！」

「哈，哈，他也懂得東亞新秩序的意義！」

我覺得沒有說話的必要，所以照舊低着頭，不言語。

「燕京有一個輔導委員會，是不是？」

「是。這個委員會倒是很有意思的。」

我說完了才覺得第二句話是多餘的，但已說了，只得罷了。記得暑假時司徒先生派我作輔導委員會委員之一，不久，我因為太忙，便退了出來，這次上村無法細問我會內的情形，所以他又轉到別的問題方面去了。

「你懂得漢好是什麼意思嗎？」

「漢奸的意思因人而異，甲說乙是漢奸，乙也可以說甲是漢奸。」

「我現在給你一個罪名：你是東亞新秩序的大漢奸。」

「我配不上這個罪名！」

「你不說真話，不問你了，先關你五個月，看你說不說？」

此時穿藍布褂的翻譯已站了起來，要帶我走，我也站起來，但又說道：

「我能說一句話嗎？」

「說！」

「我實在太冷了，你能通知我家裡送點厚衣服來嗎？」

「你不說真話，該罰一罰。冷算不得什麼，還有比冷更利害的刑罰呢。」

我見上村和翻譯都有點不耐煩了，就不便再說，跟着翻譯的回到拘留室來。走到第三號與第四號之間那張桌子時，翻譯的又把我的名字報告給那個憲兵，憲兵拿着鑰匙開了木柵門，我脫了鞋就進去了。

一見憲兵走了，三位同屋的就問我：

「怎麼樣？」

我稍爲定一定神，就把過堂的經過，告訴聿溫，他說我的答詞沒有什麼毛病。得着第三者的同情，我才放些心。不久，晚飯來了，我計算着過堂的時間，大約有半小時的樣子。這種罵人式的過堂，我倒不怕。我猜下次過堂，不是比這次嚴厲，就是比這次客氣，總要換換方式的。但無論怎樣毒打或好待，我是決不上當的。我心裡這樣想着，飯就沒有好好的吃了。

晚飯後，我時而和聿溫交談，時而獨自思索，此時才感到在中學時念新約全書的用處。我慢慢地把新約內記載耶穌被審的情形，一幕一幕地在腦子裡，像戲劇似地重演一下，覺得很有意義，所以我的精神非常痛快，好像戰士打完了一場勝仗似的興奮。

我整夜不能安寢，只在尋思應付過堂的方法。我不相信憲兵會關我五個月才再問我，我更不相信憲兵能關我五年——不到五年，他們早就要離開北平了。我現在準備着應付一切可能的問話。初進來時所怕憲兵要問的幾點，現在想來是不會問到的了，因爲他們知道我的事情太少了。

十二月廿七日早上起來，吃過大麥稀飯，我好像戰士似的已準備着應戰去了。但一個上午過去了，仍沒有動靜。我想這也好，可以利用這機會作一種養精蓄銳的工作。

下午，大約四五點鐘光景，看見有三四位穿着大衣，好像燕京人的裝束，從五號門前經過。其中有一位很像其玉的模樣，走進對面十一號陳先生屋裡去了。我站在木柵旁邊往對面看過去，見那邊站的有陳先生和那位新來的。這位新來的倒有點面熟，但不是其玉，心裡才稍為鎮定。

後來知道進十一號房的這位是燕大農場沈壽銓先生，其他的三位是洪煨蓮先生，蔡一謬先生，鄧文如先生。此時尚不知正誼早一日已進來，並即住在隔壁第四號房。過了兩三天，聽見隔壁打嚏聲，又聽見跟憲兵說話聲，才知道正誼也進來了。再過兩天，又見仁之和袁賢能先生也在這裡了。真想不到沙灘紅樓竟會變成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的寄宿舍了，想起來，倒也可笑。

二十八日早飯後，憲兵剛來檢查過，外面又站着一個憲兵叫我的名字，門開了，我走出去，穿上鞋，就來到行人路上那張方桌子旁邊，憲兵在人名單上作一個記號，就把我

交給一個穿西裝的日本人。

這個日本人很年青，約三十左右，身體不高，約五英尺。他領我到另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面積倒還大，約十四呎見方的屋子。裡面放着一張長方桌子，三把椅子。牆上有兩個窗戶，一個向西開，一個向北開，玻璃窗戶全關着。但往北開的那一個窗戶，有一扇玻璃破了，北風帶進來寒氣及塵土。室內溫度總在零點以下。我摩摩暖汽管子，大概已壞了，涼冰冰的。穿西裝的日本人到外邊去了，不一會帶了好幾張報紙來，用按釘把那扇北窗破的地方全封上。室內塵土總算減少了，但室內的溫度，却並未增加。他見我發抖，就問我冷不冷，有沒有大衣。我說帶來的衣服都已穿上，仍感不足，請他幫忙叫我家裡送衣服來。他聽了，出去一會，帶進一件大衣來說道：

「請你先穿上這件，我跟長官商量向你家裡要衣服去，但不知道長官答應不答應呢。」

我自然很感謝他。不一會，有個勤務員帶進空白的紙及鉛筆來，不一會，又有一個送進茶來，這個西裝的日本人讓我喝茶，又拿出煙來，請我抽，我謝謝他，把茶喝了，

並說道：

『我不會抽煙，請你自便。』

他抽着煙，問道：

『你會不會說日本話？』

『對不住，我不會。』

不一會，又有一個西裝日本人進來，約有五十歲的年紀。

大家落坐之後，那個年輕的即向那個年老的說了許多日本話。那個年老的就給我一枝鉛筆，幾張白紙，告訴我寫姓名，年齡，籍貫，學歷，履歷，財產等。十個指頭，早已凍僵，那裏還能執筆，所以寫得很慢。我寫完了，就交給年老的，他就將我寫的翻譯出來，寫在紙上。我寫的字有點潦草，年老的看不懂，經我解釋一番，他似乎明白了，又繼續翻譯下去。我看他的工作很無意思。那個年輕的坐得不耐煩了，站起來，在屋內踱來踱去。

終於把姓名履歷等翻譯好了，那個翻譯員又給我三張紙，紙上分寫着對日對美對英的態度。我在每張紙上，寫不了一半，就交卷了，翻譯的說我寫的不够，我又補上幾

句，就算完了。這時勤務員又送進一頁紙來，那年青的問官接過來放在桌子上，紙上油印着六七個題目。我猜這一定是二十來天憲兵部議定要問我們的題目。

問官把我寫的對日美英態度的文章看完了，又和翻譯的說了日本話，我趁空坐在椅子上沉思。忽然翻譯的向我說道：

『你寫的太空泛了，你心裡有什麼話，不妨說出來，愛國之心，大家都有的。比方美國侮辱我們日本，我們就攻打他，說他壞話。難道日本這幾年來把你們中國的地方佔據了，你不生氣嗎？你不恨我們日本嗎？請你很不客氣的說出來。反正你沒有抗日的行動，我們不會虐待你的。』

『我很了解你的意思，』我答道：『也很感激你們的款待。我冷了，你給我大衣穿，你又給我茶喝，我難道還不老老實實地把我心裡的話說出來嗎？你對我的文章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不妨提出問題來，我必然盡量答覆。你剛才說我為什麼不恨日本？愛國之心像你所說的乃是大家都有的。但是愛國之道可不必大家一樣。我恨日本，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呢？』

翻譯的聽了我的話，只是搖頭，好像抓不住什麼似的。遂將我的話翻譯了，問官又向他說了許多話，翻譯的老是點頭，並哼着 *havi*。我猜是「是」的意思。

問官說够了，翻譯的哼夠了，又向我問道：

「你說你不恨日本，你可知道日本國有什麼優點，能使你羨慕的嗎？」

「很對不住，」我答道：「我知道的日本，實在不多，說出來的只不過是普通人所說的，不像一位學者研究過日本國情的所說的。你不嫌我淺薄，我就說吧。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效法歐美，努力發展工商業，不但提高了國民的生活程度，現在且能與歐美各先進國並駕齊驅使白種人不敢輕視東亞民族。日本民族這種精神，我想我們中國人是很佩服的，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翻譯這次表示滿意的樣子，將我的話告訴那問官，問官點點頭，似乎多少也有點滿意了。他正要再問，一位高級的長官進來，屋裡的兩人，立刻直立起來，低着頭，聽着那剛進來的訓話。我初時還坐着，後來覺得這個長官好像有許多話要說的，一時不會離開這間屋子，我也站起來

了。這個長官說了十數分鐘的話，那兩人除了點頭跟哼 *havi* 外，沒有說過一句話。日本人真能服從長官的命令，我這樣想着。長官說完了，那兩人向他鞠了一個九十度角的躬，我也跟着鞠個二十五度的躬，他就走了，我們三人才坐下。大家喝過茶，問官抽着煙，又向翻譯的說了一番話，翻譯遂對我說道：

「我們彼此都是兄弟，你就把我當作哥哥一樣看待好了，很不客氣的把你心中所想的告訴我們。」

「那是一定的，」我點頭道：

問官又在紙上寫了三個字，問我道：

「你知道這個人嗎？」

「不是燕京的吧？」我答道：「我不認得。」

「你大概不認得的，」翻譯的說道：「他是一位共產黨員，在河北省帶着兵跟我們打了好幾次仗，後來被我們捉住了，我們好好的待他，他于是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訴我們了，現在又替我們作事了，所以你也不用害怕。」

「謝謝你的好意，」我答道：「但我並沒做過什麼事，所以我也不用害怕的。」

聽見門外傳來搖鈴聲了，問官遂說道：

「回去吃飯罷，下午我們再談。」

我把大衣還了那個問官，翻譯的就領着我回到第五號拘留室。

吃過午飯，問官果然又來叫我去。這回他領我到一間存貨的小屋去，這間屋子倒是很暖和的。坐不一會，翻譯的也進來了。問官即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紙條來，上面寫着

「蔡一謬」三個字，問我道：

「認得這個人嗎？」

「認得。」

「他自己說他去過重慶，你說他去過嗎？」

「我沒有聽見他到過重慶，但美國是去過的。」

「你沒有說假話？」

「沒有。」

問官就用筆將蔡一謬三字劃掉。

於是翻譯的又繼續問上午未了的問題：

「你說你不親美，我倒覺得奇怪。燕京不是美國人辦的學校嗎？你吃了人家的飯，現在美國又幫你們中國打我們

日本國，你們燕京的教員那能不親美呢？」

「任何國家都有好壞，」我鎮定地答道：「好的地方我們要效法，壞的地方我們要批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做的事會全對的，美國自然也不是處。」

「哦，你們吃人家的飯，還敢批評？」

「其實我對於美國的評論，也是從讀美國人的寫作裡得來的。」

他們兩人看着我，好像不了解我的話。于是彼此又對談一會，那翻譯的才開口道，

「中國不是講男女授受不親的嗎？」

「中國古來有這種說法。」

「你們燕京男女同學，還不是受了美國人的影響，這不就是你們親美的明證嗎？」

我見他們的問題，有點孩子氣，乃勉強忍着笑，答道：

「是的。」

他們聽見我說出個「是」字，已然承認親美了，他們都很滿意。我想假如今天我穿着西裝，而他們穿着大和服，他們必然用服裝來證明我親美。現在呢？他們倒沒有這個

機會再來一次小孩氣的問話了，我替他們很可惜。

問官又在紙上寫了『燕京大學教育的目的。』我回寫，『因其理得自由以服務。』他把真理與服務全劃掉，只留下自由，並說道：

『你們一切都自由。』

我覺得沒有什麼辯論的必要。所以沒有理他。

這時又聽見搖鈴聲了，翻譯的先走了，接着問官就領我回到第五號拘留室。聿溫問我：

『怎麼樣？』

『還好。』

『大概所有的教員全出去問話了，下午倒恭桶時，沒有見到一位教員，却都是同學的。』

吃過晚飯，我正要和聿溫述說今天下午過堂的經過，憲兵又叫我的名字，我不提防晚上還要過堂，趕緊應聲出了木柵門。

問官一直領我到樓上我們初進來時填寫表格的那間大辦公室，我坐在靠大方桌的一把椅子上，問官坐在我右邊，把我的供詞全拿了出來。不一會，第一次給我作翻譯的那

個穿藍布褂的進來了，問官叫他坐在我的左邊，站在我對面的還有兩個翻譯——一個穿長袍馬褂約五十歲光景，留着鬍子，另一個約二十五歲，穿着灰呢西裝。

一切安置好了，問官才開口道。

『你們燕京大學，一定有許多抗日團體的，你就在這張紙上全寫下來吧。』

他說完，就拿起報來看着，三個翻譯的彼此交談着，穿西服的翻譯拿出煙來請我抽，我說：

『不會抽，請你自便。』

他就自己點了一支，也沒讓別人抽。那個穿馬褂的跑到我面前來看我寫的，並開口道：

『你們燕京現在還敢抗日嗎？』

我覺得沒有答覆的必要，所以沒理他。穿藍布褂的接着說道：

『你們以為美國可以做你們的靠山嗎？你瞧吧，地圖上快沒有美國了。』

我低着頭，好似沒有聽見他說的，只管繼續寫下去。一張寫完了，那穿藍布的便忙着翻譯，當第二頁快寫完時，

問官便接過那張已翻譯了的，還沒有看完，便大怒喝道：

「不用寫了，這些都是法定的團體，我要的是非法的抗日團體。」

原來我寫的都是些校務會議，基督教團契，同學會，同鄉會等，都是沒法加上抗日名義的，他那會滿意呢？所以他很生氣，但我還能鎮定地答道：

「我知道的只有法定的團體，我沒有參加非法的團體，那能够知道它們的存在呢？」

問官見我這樣答法，更生氣了，就舉起右拳，打我的右臂，連打三下，且疊聲道：

「快說！快說！」

我身上穿了不少的衣服，故不覺得什麼，但我也生氣了，同時覺得也應當生氣給他看，所以止住他道：

「不要打，越打，我越糊塗了，更說不出什麼來了。」

一說完，我就低下頭去，裝着思索的樣子。他聽見我這樣說法，表面上也回復了常態，却又找不出什麼可追問的，遂命令道：「你就繼續寫下去吧！」

我一共寫了三頁，才寫完了。翻譯的幫忙，把寫的看完

了，他倒不問我這些團體開會時有沒有談論到中日的事實，

手裡却拿出一張紙來，上印着燕京抗日團體的名字，但都是七七事變前的，問我知道不知道。我想了一想說道：

「好像記着兩三個名字。」

我一面說着，一面在紙上勾了三個團體的名字，無非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先鋒隊」等，他又問道：

「你可知道他們的活動及會內的中心人物？」

「我當時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活動，那個時候我剛到燕京任教，太忙了，那裏有工夫注意這些事情？」

「教職員有沒有抗日的團體？」

「聽說九一八以後，曾有過，但當時我沒有在燕京，所以不知道實際情形。何梅協定以後，國民政府主張和陸邦交，禁止一切抗日活動，就沒有聽見教職員有抗日的組織了。」

這時已快到晚十一時了，他們才放我去睡覺。

回到拘留室，看見三位同屋的早已熟睡了。我一面鋪毯子，一面想着今天過堂說過的話。現在正是三九天氣，外面刮着強烈的西北風，但我太興奮了，倒不覺得寒冷。我一時放下過堂的事情，又想起德俄戰線上的死屍，一時又

想到送給太平洋大魚肚子去的屍體，同時又念着過去四年半國內因此次戰爭直接間接犧牲了的性命，於是不由自主的又想起人類的罪惡，互相殘殺，不知要殺到何日，方能止息。想到這裏，我全身的肌肉，非常緊張，血往腦上注來，睡是睡不着了，接着又想到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人來了——我的父母，我的妻兒，我的姊姊們——不知他們生死存亡，我想到這裏，身上又發抖了，我的眼淚差不多又掉下來了。

我又想，現在我不也是一位戰士嗎？我的生死仍未決定呢！外面一切的營救，想已絕望，唯一的方法只有自救了。打死我也罷，反正日本憲兵不能從我這裏得到什麼的。心志立定，反倒坦然了，同時也因忙了一天，躺在地板上，既不覺得硬，也不感到寒冷，不知不覺地就入了睡。

清早起來，我把昨天過堂的情形告訴聿溫，又準備一切，向前擄殺，好像一位戰士衝鋒陷陣的樣子。果然，早飯後，憲兵還沒有來檢查屋子，問官就叫我出去了。

今天上午過堂的地方，仍是昨天下午那間小屋，仍像昨天一樣的暖和。翻譯的仍是昨天下午那個穿西服的老者，

我坐在椅子上喝茶，見問官把昨日的供詞看了一遍，問道：

「九一八時你在美國，會有什麼抗日活動？當時在美的華僑，有什麼活動？你們學生有什麼表示？」

華僑當然有各種愛國的表示，抗日後援的活動，但一時記不清楚了。留學生也有各種表示的，但我只參加過一二次，所以不甚知道內容，大概是講演，募款等等吧？」

翻譯沒有把我的話告訴檢問官，便問我道：

「我不相信你沒有活動，你是念社會科學的人，難道沒有一點國家觀念？」

「三年內要把研究院工作完畢，那有工夫去參加抗日的活動呢？你不信，你去查吧！」

他把我的話翻譯給檢問官聽，問官倒沒有追究，只問我道：

「你在美國念書，得着美國學校的津貼，那能不親美呢？」

我覺得他對於昨日的親美證據，自己也覺不滿意似的，想是上官提出質問他了，我打算這回要給他一點滿足了，反正無關緊要的，遂答道：

「你要怎樣說就怎樣說吧。」

這時問話的方向又轉到燕京大學的抗日問題來了，檢問官先開口道：

「你們燕京大學，有沒有抗日份子？」

「我不知道。」

「難道司徒雷登到重慶去，林適可到第八路軍區去，都不算抗日嗎？」

「他們外國人，我那裏問得着呢？」

「燕京有沒有得到重慶教育部的津貼？」

「我不知道，因為燕京大學的財政，我也不用過問的。」

「難道燕京每年得到重慶教育部六萬元的津貼，你也沒有聽見過嗎？」

「有此傳說，但不知確實與否，你們的消息倒比我還靈通呢？」

「哈，在燕京校內，有我們的偵探，燕京大學，一切抗日的活動，我們都知道，難道你倒不曉得嗎？你還是老老實實的說真話好。」

「你們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了，我倒要向你請教燕京大學

抗日的活動了。」

「你們校長到過南方幾次？」

「我也記不清楚了，大概一年會有一次吧。反正他坐你們日本飛機到上海的，所以你們總會知道的。」

「他回來報告什麼？」

「我那裏記得住這許多事情；他的演講，總是公開的，講詞在燕京新聞上也有記載。燕京新聞你們念得爛熟了，所以你們必然比我知道的還多。」

「你們私人來往上談過什麼？」

「校長是個忙人，我這無名小卒，那有機會跟他談話？」

檢問官和翻譯的越聽越生氣了，同聲喝道：

「不要再強詞奪理了，快說，快寫在紙上。」

「不要焦急，」我鎮定地答道：「你們急了，我也急了，就寫不出來了。」

我邊說邊慢慢地把我記得的三數點寫下來，檢問官和翻譯的搶着看，問官並且問道：

「你寫的是最近那一次講演吧？」

「也許是吧？反正我記不住他是那一次說的了，你要詳

細的知道，還是問校長自己最好。」

「你對於校長的演講，有什麼感想呢？」

「沒有什麼。反正離不開報紙上所登載的。我到會並不是爲聽他的講演，乃是表示歡迎他返校。他是一校之長，千里迢迢，從南方回來，我們當教職員的，還不到會表示歡迎嗎？」

「那麼校長南下前，你們知道嗎？」

「多是不知道的。」

「校長在大禮堂講演，並且報告南下的情形，這豈不是要鼓勵學生愛國，鼓勵學生南下抗日嗎？」

「這個解釋自屬可能，但燕京學生也有不南下的，同時校長又與日本人以及地方當局時有來往。……」

「他向這般人打聽消息，」檢問官憤憤地說道：「給南方作報告，他並沒有意思跟我們合作。我再問你，你們學生到南方去，是誰負責辦理的？」

「校章上沒有明文規定，我那裏能知道呢？」

「你是一個學系主任，那能不知道呢？比方你的學生要到南方去問你時，你怎樣答覆他們呢？」

「學系主任的責任在指導學生讀書，研究學問，對於他們的出路，我可無從負責了。學生如果問到我時，我就告訴他們問校長去。」

「你們校長，那有這麼多的工夫呢？」

「這是他的問題，我可不能替他答覆。」

「社會學系有沒有學生到南方去的？」

「社會學系同學到上海香港去的不少。」

「上海香港不算，南方是指重慶政權治下的地方，快快說出來，學生的名字全寫出來。」

「我都記不清楚了，記得的寫下來吧。」

我一面說，一面寫，共寫了十來個名字，其中有六七個是女的。檢問官見我寫完了，又問道：

「怎麼都是女的，沒有男的嗎？」

「社會學系三分之二是女生，你不相信，可以查學生名單。」

我一面說，一面想着，一時又想到一位男同學的名字，就向他說道：

「又記起一個男學生的名字。」

「快寫出來。」

檢問官看完名子之後，又問道：

「你沒有勸他們南下嗎？」

「沒有，因為用不着我勸，他們又不是小孩子。」

「學生南下，豈不就是你們燕京大學抗日嗎？」

「南下的不一定抗日，同時也有在北方的。」

檢問官一定以為北方即指日本軍治下的地方，倒沒再追

問下去。

這時已是日本時間一點鐘了，我才有休息的機會。

回到拘留室，聿溫正在吃中飯，我的也代領了。聿溫邊

嚼飯，邊問道：

「怎麼樣，完了沒有？」

「沒有。但燕京抗日的罪名快要宣佈了，不過是團體的

責任，我個人倒不至有問題的。」

我很快地吃過中飯，合上眼，不幾五分鐘，憲兵又來開

門了，我就跟着檢問官到那過堂的小屋子去。

檢問官，翻譯的和我三人一齊坐下。檢問官一面抽煙，

一面看我的供詞。翻譯的在紙上寫了一個題目：「你對於

日美戰爭的感想。」

我拿過紙來就寫，他繼續翻譯着我上午的供詞。不一會

我把感想寫完了，遂交給翻譯的。他一時翻譯不過來這兩

天的供詞，而檢問官又想立刻知道我寫的是什麼，所以翻

譯的就把我寫的讀給他聽，檢問官擇要記錄下來，有問題

的，作上一個「？」號。

我在紙上寫的是：第一，根據基督教的博愛主義，反對

戰爭；但第二，根據社會科學的精神，未把事實分析清楚

之前，不隨便下斷語。

檢問官一時抓不住可問之點，倒是翻譯的先問了：

「難道有人打你，你不但還手，還要用你們基督教的

博愛主義對待他嗎？」

「假如有一個大人，打一個小孩子，小孩子自然氣極

了，但是如果他還手打那個大人，他的性命恐怕也難保

了，倒是忍着挨打好些。若是你現在打我，我也不會還手

的，你說是嗎？」

他大概不知道昨夜檢問官用拳捶過我，所以笑道：

「誰打你呢？」

我沒有回答，那個檢問官倒臉紅了。他又思索半天，才說道：

「你寫的太籠統了，簡單的說一兩點感想吧！」

我想他既要直截了當的答案，遂具體地答道：

「從自身利害來說，我反對日美戰爭。因為我的父母遠在香港，生死未卜，我的妻女，更不知下落。你說戰爭殘忍不殘忍？又這幾年來中日戰爭，不知傷害了多少人，弄到多少人家散人亡。我可憐你們日本人民受了這幾年戰爭的禍害，現在又加上日英美荷戰爭，日本人民更難堪了。」

翻譯的聽了我的話，大為不滿的答道：

「我們日本人不用你來可憐！」

那個檢問官倒沒說什麼，我就被送回拘留室裡。我見室中只有聿溫一人，遂問他道：

「那兩位放了？」

「沒有。想是送到十六號大房裡去了。」

原來那十六號大房是專為已經完結了案子的拘留人住的。白白地吃了他們的饅頭，總得要叫他們做上一兩個星期的掃地工作，才肯放走。過兩天，果見那位年輕的剃光

了頭，在外面過道上掃地哩。

這時，屋內只有聿溫和我兩人了，我們就把屋裡清潔一下。晚飯吃過了，我跟聿溫大談起來。他們兩人走了，我們倒可用北平話做談話的工具了。一直說到睡覺的時候，我把這兩天來過堂的情形都告訴聿溫了。

翌日，清早起來，我又準備過堂去了，但是快到吃中飯的時候了，還沒有人來叫，我也不着急，反正已經忙了兩天，休息一天也好。中飯過後，我正想合合眼，而檢問官又來了，我跟他到過堂的屋子去，翻譯的早已在那裡忙着了，見我們進來，就站起來。

三人落坐後，翻譯的即開口道：

「這些日子，我們待你太客氣了，可是你太不客氣了，總是拐着彎兒說話，此後待你可不能再客氣了，你可得小心！」

我看他一眼，就低下頭不去理他，檢問官却不發言，只一面抽煙，一面翻供詞，見有「？」記號的地方，才問我道：

「你們校長到南方去，想必跟你們校友會面，並開會報告這邊的情形，又採取校友在南方抗日活動的報告，是不

是？」

「見面是有的，但有無採取抗日活動的報告，我可不知道了。」

「你們校長到南方時，一定會跟重慶教育部長會面的，並且聽取教育部訓令，回來加強抗日課程，是不是？」

「會而有可能，但燕京大學的課程，這幾年來，卻沒有什麼大改變，所以加強抗日的課程，這道訓令，我想是沒有的。」

我一面答着，一面見檢問官的眼色沒有什麼改變，我倒放心了。這個問題，我想憲兵一定會問嘉通的，假如兩人供詞不符，可怎麼辦呢？此時正聽見嘉通在隔壁屋裡說話，他的聲音很響亮，我聽見他說道：

「我是教心理統計的，是個書獃子，那有工夫去管這些事呢？」

不知他所指的是什麼事，可惜以下的話再也不繼續了。我的檢問官一面問我，一面寫報告書，一面又和翻譯的說話，翻譯的今天沒有把我的供詞寫下，只用口述，檢問官才寫在報告書上。他邊寫邊又問我道：

「你們有沒有向重慶送錢？」

「昨天你不是說我們向重慶要錢嗎，怎麼又會有錢送到重慶去呢？救濟捐款是有的，但都用在學校附近的窮人身上。」

翻譯的聽見我這句話，就搶着說道：

「新秩序之下，那有窮人？即使有，新政府也有辦法，用不着你們幫忙的。」

「唔！」我搖搖頭道：「窮人多着呢，你不信，可以看看燕京新聞。」

檢問官仍忙着寫報告，翻譯的見我閉着，就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問我道：

「你懂得嗎？」

我念道：

「小市民階級。」

「你就是小市民階級，聽你的談話，想你一定沒有多大出息的，老掛念着家，自念社會學了！」

我見他說這話，倒覺得高興，我想大概快要回家了。果然，檢問官把報告書整理完了之後，即問我道：

「你最後有什麼感想呢？」

「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難道你不願意早日回家嗎？」

「這自然，請你多幫忙。」

檢問官聽我說完了話，又在報告書上加了一句，遂交給翻譯的念給我聽。

報告書的要點，大約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爲抗日總指揮，領導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煽動學生南下，接收重慶津貼，遵循重慶政權抗日的訓令……等。

檢問官見我聽完了，遂問道：

「有什麼要修改或補充的嗎？」

「沒有什麼了，我想這樣就行了。」

檢問官和翻譯的聽見我說沒有修改的了，就很高興地拉着我的右大拇指在報告書上蓋一個紅印，他們兩人也蓋上他們自己帶來的印鑑。

至此，總算告一段落了，翻譯的領着我回拘留室，途中我稱贊他道：

「你的北京話真好，不像是日本人說的。」

「那裏的話。我在北京祇有四年，但在日本倒念過十年中國書。」

「這更不容易了，我在北京的日子比你多兩倍，但是我的北京話還不如你呢。假如我學日本話，能像你學北京話那麼快，我可就樂死了！」

他聽了非常高興。一時來到拘留室，我對他說：

「再見。」

「再見。」

他點點頭回答着就走了。

我進了木柵門用右大拇指一按左手掌，聿溫就明白我已過完堂了。我對他說道：

「個人倒沒有什麼，可是燕京大學抗日的罪名却已經承認了。」

聿溫好像不理會我的解釋，只着急地說道：

「我想你快出去了。我到現在還沒有機會過堂，怕他們已經把我忘掉了。」

「絕對不會的，」我安慰他道：「總要把燕京人全過完了堂，案子結束了，大家才得釋放的。」

我私自慶幸日本憲兵並不知道我個人的行動，所以一點也找不出破綻來。關於學校兩樁要緊的大事，日本憲兵好像也不曉得的。他們太信賴他們派來的「漢奸」密探了，然而這般「漢奸」，要的是日本人的錢，倒不像真正要賣國或賣校的。燕京抗日的風氣，這樣濃厚，這般「漢奸」們日夜受薰陶，那有不被感化的？這真所謂以子之盾禦子之矛了。

雖然還有再被審問的可能，但總算告一段落了，我身上好像放下一個重担似地輕鬆。進來時那種逐漸緊張的情緒頓然消釋，雖說暫時不能回家，但是如果日本憲兵真講法律的，我必然可以恢復自由了。這樣一想，對於吃飯和睡覺，倒有興趣了，對於目前的一切，也表示樂觀了。外面的戰事，也沒心理會，沒有報看也不在乎了。心裡只想看書，或用紙筆，把這二十多天的生活記錄下來，可惜這一切都不能實行，只有用心記下來罷。

我本來對於年節是不發生興趣的，但今年在拘留所內，倒很想回家過年了。陽曆年就在眼前，回家過年是有希望的，但陰曆年一定不成問題的，聿溫也這樣的想。

陽曆除夕，我們只吃了兩個冷饅頭，兩尾小鹹魚，一杯開水，想起去年今日，不禁啼笑皆非，人生真如一夢呀！大年初一，日本憲兵也不休息，還忙着過堂事。教職員慢慢地都問完了，所有的同學也開始問了。四號下午出去倒恭桶，向同學們打暗號，他們都表示已經問完了。聿溫也是這天下午就問完了，因此，他也很高興。隔壁六號房住的慰祖，也是這天問完的，我也覺得很高興。因為他是社會學系的同學，初時我很怕他的供詞和我的不符，現在可無這個憂慮了。

憲兵在地窖子裡新掛了一座鐘，每半小時打一次，我們住在第五號的，倒聽得很清楚。有一次，正在數鐘點時，忽然聽見東蓀先生跟日本憲兵說道：

「我不吃饅頭，改吃大米飯。」

既而又聽見他說：

「大米飯太涼，還是饅頭好。」

他說話的聲音也表示着他很高興的樣子，從進來沒有聽見過他說話，現在才開口，想是也完結案子了，而且必然是很滿意的，我一方面替他高興，一方面我自己也放心

了。

但是五號下午出去倒恭桶時，遇見周學章先生，我們的心又沈下去了。原來他也進來了，而且一定沒有問完話，見他面部憂鬱的樣子，使我忽然想起學校那些位同人來，他們必然爲着我們的安全憂慮，同時也爲着他們自己的命運焦急，這從新進來的周先生表情上便可得知了。志韋先生倒是老拘留人了，很鎮定的樣子，並且不時地向周先生示意。鐵年已問完了，他跟周先生同屋，必然會把過堂的情形告訴周先生，使他有所準備，我想着才放心些。

六號那天，又有一位很面熟的站在我對面，他是新來的，不會給自己扣鐵鍊，被憲兵說了一頓，我順手替他鎖上。後來我問劉豁軒先生，才知道這位是孫瑞芹先生，是爲了在美使館供職而進來的，他跟正誼住在隔壁第四號房。

對面十一號房陳先生，我和他每日總見一兩次面的，只要他屋子一有響動，我就站起來看個究竟。陳先生早已表示過他已過完堂了，但這幾天來，他總是出來進去的，我用暗號問他，才知道他又重新過堂了，我心裡又起了一層陰雲，他的案子不完，我們大家都不會釋放的。

七號上午十一時的光景，憲兵進來叫聿溫出去，我想難道燕京的案子又有了變動？心裡很是焦急。同時又聽到別的燕京人也出去了，幸虧沒有半個鐘點，聿溫就回來了。

他告訴我大家都要出去再打一次手印。十個手指頭都要打，先一個一個來，後來左右手合起來打一個整的，還填了一張表。下午我也出去了，在憲兵休息室內，照樣打了手印。在屋內見到正誼，我跟他大談起來，慰祖也在裡頭，我們都覺得快要釋放了，心裡很高興。但是晚上給陳先生打暗號，知道他還未問完，一時又覺得兩三天內走不成了，思想跟着也亂起來了，究竟陳先生又在寫什麼呢？八號九號又在無聊中渡過了，却仍沒有動靜。十號早晨出去洗浴，見到正誼，偷着機會說話。他低聲對我道：

『快出去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這是他聽見看守的憲兵說的。果然吃中飯時，就有一個憲兵站在木欄門外要畫像貌，先畫我的，後畫聿溫的，從第一號房起陸續畫燕京人的像貌。我對聿溫說：

『聿溫先生的話對了，但是未到家時還不必太高興了，日本人都會騙人的，初時說委曲幾天，現在已經一個月零兩

天了，還不釋放，你說他們的話，還敢置信嗎？」

聿溫點點頭，並且說道：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初時我想一定會先放同學的，但是能一全釋放，那更好了。」

我也點點頭表示同意，但已經下午兩點半鐘了，還沒有消息，我說：

「預備倒恭桶吧，再住一天也沒有什麼要緊的。」

話還未說完，兩個憲兵來了。一個拿着名單，一個拿着鑰匙。先點我的名字，我站起來，他們說：

「拿東西。」

我正要拿東西，他們又看着名單說道：

「不是你，是沈聿溫。」

我嘆了一口氣，想道果然學生教員分開了。但同時又安慰自己道，陳先生問完了，我想一定可以走了。倒恭桶時，我向志章先生示意，他搖搖頭，好像表示兩三天內不會出去的。我回到屋裡再想一想，可不是嗎，周學章先生還沒問完呢。大概憲兵要節省饅頭，所以先放學生，後放我們吧。心裡雖然這樣安慰自己，血液却又沸騰起來了，全身

身爲之緊張。

聿溫慰祖知道我穿得不夠，而且又怕冷，臨走時都脫下衛生衣來給我穿。我很感激他們，但外面天氣那麼冷，同時我想加上聿溫的三張毯子，一定不會冷了，所以謝謝他們，仍讓他們穿上。

晚飯，我一人獨吃，很覺無味。我雖不怕寂寞的生活，但今夜却有點難堪了！一時，憲兵又嚷着睡覺的口號，我趕緊躺下去，加上聿溫的三張毯子，倒覺得暖和舒服，可是整夜思想着，終難成寐。鐘已打過四下了，我才慢慢地入睡。

十一日早上起來，我先運動，理好毯子，遂即禱告。早飯後，用半濕抹布擦地板——這種工作，直到我離開拘留室那日，從未間斷。

上午約莫十點鐘光景，陳其田先生又被叫出去了，好像沒有回來吃中飯，快到晚飯時候了，才見他回來。他見我靠木柵站着，就以手示意，我知道他已經過完堂了。他表示已經打過手印，並豎着四個手指，又向門一指，再向窗戶一指。我猜陳先生莫非已得了檢問官告訴他釋放我們的

日期，我照樣作了手勢，他在點頭，好像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心裡很有點安慰了，四天算不得什麼，反正就快出去了。我很想馬上找個方法告訴六號房的劉先生，但是沒有方法呀，還是候到明天倒恭桶時才告訴他吧。

床時才醒了。

(三) 拘留人之形色

我正盤腿坐在那里胡思亂想，忽然小木柵門開了，憲兵放進一個人來。這位新同屋是個小販模樣的，年約三十歲。眼睛很紅，他說一夜沒有睡覺了，是在戲院裡被扣留的。憲兵叫他立刻睡覺，他倒也不客氣，便躺下去，不一會就睡熟了。

「怪可惜的，還是留着中飯時吃吧？」

晚飯來了，我叫醒他吃飯，他看見是冷冷的兩個饅頭，菜湯又像水一樣的清淡，就搖頭不吃了，但我猜他一定很渴，因為不用一分鐘就把那杯開水喝了，然後對我說道：

「你的？快快地換衣服！」

「你還是吃了好，我實在吃不下。」

我先把髒衣服交給他，然後點數東西：蜜柑，蘋果，麵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我給你留着，待你半夜餓時再吃。」

我站起來，正見一個憲兵給對面屋陳先生送進蘋果，麵包及衣服等。我正在渴望着培志也照樣給我送食物來，果然

「你把饅頭和菜湯都吃了吧，我沒有心吃了。」

憲兵手上提了一個大包袱，走近前來，他叫着我的名字問道：

這時我肚裡實在餓得很，就吃了一個饅頭，給他留下一

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你還是吃了好，我實在吃不下。」

我先把髒衣服交給他，然後點數東西：蜜柑，蘋果，麵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這時我肚裡實在餓得很，就吃了一個饅頭，給他留下一

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這時我肚裡實在餓得很，就吃了一個饅頭，給他留下一

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這時我肚裡實在餓得很，就吃了一個饅頭，給他留下一

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這時我肚裡實在餓得很，就吃了一個饅頭，給他留下一

包，餅干，花生，牛肉，黃油，鷄子都有。我想這必然是

同學告訴家裡才送來的。一個多月不見這些文明出產了，真是喜出望外，我當時就吃了兩片麵包，一個鷄子，一個蘋果。

我一面吃，一面思索着：第一，燕京教職員一定沒有搬家；第二，我們一時不會釋放的。現在倒覺得回家不回家，沒有什麼要緊，反正有東西吃，好好的養着身體就成。待憲兵部滿意之後，恨燕京的情感消散了，我們就會出去的。大冬天，不會有什麼傳染病的，就算在這裡再靜養一個月吧。

我見同屋的餓了，送兩塊面包給他吃，又分點花生給他。他自然非常的感激，但客氣了一番才收下。

中飯時，憲兵又送進來一位穿西服的。很年輕，好像還不到二十五歲，是學生打扮，很生氣的樣子，大概過了一堂才進屋來的。他好像沒有看見屋裡還有兩個人似的，老在屋裡踱來踱去。我對他說道：

「不必生氣了，反正你已進來了，請你坐下吧，被憲兵看見，可不是玩的。」

他高聲地問道：

「你們是誰，姓什麼？我不認識你們，不要跟我說話。」

他的神氣變得更壞了，但到底還是怕憲兵進來，所以不得不坐下。

我現在估着屋子的極左端，那位小販在極右端，靠近蒸桶那邊——我初進來時估據的那個位置。新來的同屋，坐在當中。一時中飯來了，饅頭，菜湯，開水都是我送給他們兩位，我用黃油抹着熱烘烘的饅頭，吃得津津有味。那位小販吃完了，似乎還不夠，我問他還吃不吃，他却說够了。那位新進來的沒有吃，我對他說道：

「你吃不慣這個，我給你麵包吃吧？」

「我不吃，沒有工夫，你自己吃吧！」

「你餓時再吃吧？」

大概是下午兩點半鐘吧，憲兵叫了小販的出去過堂，我見那年輕的現在心平氣和得多了，就想跟他說話，先把我自己介紹一下，然後問他，却不問他的籍貫，因為他說話帶着東北口音，不問可知了。他見我還可親近，不覺和我長談起來，他對我說道：

「我想不到你這麼年輕，已經做了大學教授了。燕京我倒有幾位同學是認識的。」

但他說了好幾位，我却只認識一位，還是因為選過我的功課的。他自己是北京農學院的學生；對於燕京生物系幾位教授都很景仰。據他說他是因為一篇文章進來的，但文章恐怕不是真正的理由，憲兵扣留他，大概是因為他的日籍教授控告的原故。他相信兩三天就可以出去。他又問我廣東的風景，他很想戰後到各地旅行。繼而又感慨地說道：

「想不到你會願意跟一位東北人談話。」

「我素來不問人籍貫的，反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何必彼此分畛域呢？」

他聽了我這話，就很放心，說話也更坦白，我們間的隔膜，比初見面時減少得多了。

一個晚上又過去了，這是十三日的上午，家裡又送來棉袄棉褲，身上加了這兩件，那個用來作披風的毛毯就可以去掉了。鬍子長了，臉還是很憐，但倒不像乞丐了，回復文明人的生活吧，我這樣想着，不覺又獨自笑起來。

今天上下午，兩位同屋的都出去過堂。快到晚飯時間，那位農大學生才回來，他很快樂的對我說：

「快出去了，我瘦了許多吧？」

他的確瘦了，但我沒有告訴他。他進來已有三十多個時辰了，還沒有吃過一個整饅頭，不但菜湯不喝，連水也不喝。早上那碗大麥稀飯，也只嚼了一口，就往恭桶倒，饅頭菜湯倒是送給那個小販吃的。

不一會，小販也回來了，身上變得灰白，好像是被打過的，一個穿藍布大褂翻譯模樣的人和一個憲兵送他回來的。那翻譯的對憲兵說了幾句話，憲兵就向小販喝道：

「不許坐，在這裡站着！」

他哀求無效，只得靠木柵站着。他見沒有憲兵看着，即對我們訴苦道：

「我答話不好，被推到牆上去，還踢了幾下，現在還要罰站。」

一時晚飯來了，我對小販道：

「坐下吃飯吧，憲兵來時，你就告訴他站着吃飯不行，他不會說什麼的。」

他見我是老拘留人，倒很信我的話，但我可替他提心吊胆起來了。還好，憲兵好像也餓了，向送飯的要了幾個饅頭在外面吃，倒沒進來巡視。

憲兵在外面喊睡覺的口號，小販問我：

「能睡嗎？」

「等憲兵進來，問問再說。你累了，就坐在恭桶上歇歇。」

他很胆小，坐不一會，就站起來。整夜在那裡站着，怪可憐的。

第二天早飯後，小販的又被叫去過堂。中飯時，他才回來，仍是站着。他對我們道：

「這次過堂，倒沒被打，因為我把一切都告訴檢問官了。」

原來他是來往北京與某鄉間的。在鄉間被八路軍用作買辦，到城裡來買過好幾次貨，這次不幸而被扣留了。他下午沒有出去過堂，所以站了整個下午。晚飯後，他實在支持不住了，就依着木柵坐下。憲兵從外面經過，見沒有人在那裡站着，就用鑰匙開了門進來，拳打腳踢，不知打了

多少，踢了多少，他大概受不了了，心裡發嘔，像要吐血的樣子，憲兵說他是裝的，又踢了幾腳，才鎖上門走了。我的熱血在沸騰，可惜手無寸鐵，那裡制得了仇敵？中國還沒有亡呢，就要受這種刑罰，假如亡了國呢，那裡還堪設想嗎？

已經站了一日一夜了，今夜還得站着，我想任何人都血肉作的，那裡禁得住呢？小販看見我們都躺下了，他終于哭出來，大聲的叫道：

「打死我罷，我也是要睡的。」

還未躺下，一個憲兵過來，請了那位農大學生做翻譯。

憲兵罵道：

「小孩子才哭呢，你是小孩子嗎？狗整日整夜站着，也不哭，你連狗都不如呢！」

一個在罵，一個在哀求，鬧了大概已有一刻多鐘，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祇得站起來勸小販道：

「再忍受一夜吧，明天跟檢問官請求去，就行了。」

那憲兵盯着我，幸虧離他遠，不然，難免被打的。憲兵又叫農大學生把我的話翻譯出來，這位翻譯的一定譯得很

委婉，我總算沒有犯罪。小販聽了我的話，就不再鬧，鼓着勇氣，又站了一夜。

十五號上午十時左右，翻譯的又來帶了小販出去過堂。不一會，憲兵又送進一位新人來。這人身穿藍布大褂，棉襪棉鞋，很是老實的樣子，說話也很鎮靜，必然是飽經世故的。我請他坐下，便問他爲什麼進來的，他說：

「大概不是我自己的問題，因爲我與新民會有點關係，也算親日分子。但跟我同進來的有一位郵差，聽說有人告他替八路軍送信。我是南苑小學教員，這位郵差常來小學，我猜我進來，就是爲了這件事。」

我把自已過堂的經過告知他，作個參考，我們兩人談得很投機。

那位小販回來吃中飯，下午沒有過堂，他倒有機會坐下休息了。他整個下午都很高興，因爲憲兵告訴他快要出去了；我却給他澆了一盆冷水道：

「暫時不必高興，回到家裡再歡喜吧。」

但他仍是相信着憲兵的話。

晚飯後，大家談話就睡了。忽然，憲兵開門進來叫小

販的出去，我睜開眼見天色還沒發白，外面時鐘正敲着五下，我想憲兵對他這案子真是起勁呀！昨日下午他告訴他把村裡跟八路軍有關係的人名全告訴憲兵了，這回出去，許是到鄉下去做帶路的捉人去了，怪可憐，也怪可恨，意志薄弱的人，總容易被憲兵欺騙的。從五點直到憲兵呼喚起床，我總思索這件事，再不能入睡了。

十六號上午家裡又送來衣服和食物。其中使我最高興的，就是我心裡最想要的棉襪子和毛帽子也送來了。此後，無論外面刮着多大的風，屋內無論怎樣冷，也不怕了。前次送來的食物，昨晚已吃完了，今天正怕沒有得吃，這可來得真巧！

上午，農大學生和小學教員都沒出去過堂；於是農大學生發起愁來了，我安慰他道：

「你還沒有打手印，不用希望出去，還是多吃多睡，保養保養吧！」

快到中飯時候了，憲兵又送進來一位新人，身上穿着牛皮大衣，約有五十歲光景。他一坐下，飯就來了。屋內筷子碗都不敷應用，我跟送飯的要了一份給這位新來的，并

對他道：

「你吃不慣這個，我送你麪包吃。」

但他到底是個飽經世故的，倒覺得饅頭菜湯好吃。

下午農大學生又出去過堂了，我跟新來的那位談話。才知他原來是在稅關裡作事的，他不知道憲兵爲什麼會逮他的，想是因爲日英美荷戰前，他曾跟英美人合作過的原故吧？我以老拘留人的資格，把憲兵問我的話，都告訴他，使他有所準備。他問我家裡是否可以隨便送衣食的，我答道：

「英美派的才有這種優待吧，其他的人許是不成的。」

十七日下午，一個憲兵來叫這位海關職員，問他屋內有無自己帶來的東西，他答沒有，就跟着走了。我對南苑小學教員說道：

「這位海關職員，想是拘留錯了，不然，還沒有過堂，那能出去呢？」

教師聽了這話，點點頭，我們都替他高興。我想這位先生真不錯，得着機會進來住一天，開開眼就走了，怪有意思的，我真羨慕他！

星期六出去洗澡，見正誼在浴室，一面洗衣服，一面跟憲兵聊天。我問他：

「有沒有消息？」

「沒有。」

我們現在倒把憲兵拘留室當作旅館看了，有吃有穿，還愁什麼？其他拘留人既羨慕我們，又嫉妬我們，同時又沾了我們的光。拘留室那種可怕的景象，倒被燕京人改換了，見着憲兵，還可以和他們說說笑笑。西苑花田來時，我還大聲地問他什麼時候放我們，又常常聽見嘉通嘆餓，跟憲兵多要饅頭。

這幾天常常聽見拘留室外行人道上有女人說話的聲音，不知是什麼人？後來出去倒恭桶，才知道新進來的都是某女中的學生，她們一共有六七位，分住第二號及第七號。此外還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帶着三個孩子，住在第十六號房。我們初進來時，聾混對我說：

「這裡沒有女的，不是憲兵瞧不起女的，就是優待女的。」

現在才知道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十九日早上，憲兵又送進來一位，他的個子又高又大，大概四十來歲，臉寬寬的。他一進來，就坐下，盤着腿，合上手，嘴裡念念有詞，一看便知是佛教徒，我跟南苑教師看着發笑。

那位農大學生上午出去過堂，回來對我們說他已打過手印了，說時很高興。問我有什麼話要帶回家的，我謝謝他說：『沒有什麼話。』

果然，下午憲兵把他叫走，就不再見他回來。他是很會說話的，據他說他還跟檢問官辯論過一次，他認為他的問官是很笨的，但他對於日本人却很有好感，這次日本打仗，他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他也很佩服希特拉，因為希氏曾經坐過監，他常以坐監能做大人物來安慰自己。蔣委員長在西安拘留過，才做了抗日的領袖，這也是他念念不忘的。

二十日中午後，照例我合一會眼，睡不着，很是無聊，就跟南苑教師談話。他說他上午過堂時，憲兵問的都很籠統，如對日的態度，對現政權態度等。這些問題，在他初進來時我已提醒他，叫他準備了，所以他很感激我。

我和教師談得正高興，那位佛教徒過堂回來了。他滿身灰白，面有戚容，顯然是被打或罰站來着。果然，等送他回來的憲兵走後，他對我們說：

『好難受，跪着說話，雙手還舉着一張大椅子』

『爲什麼？』我問他，但他很不願意回答，反問我：

『你過堂時，有沒有這樣的跪過？』

『沒有。』

『檢問官會不會打人？』

『仔細點說話，就不會挨打的。』

他聽了我的話，倒像放點心。

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家裡又送進食物及衣服來，食物有雞，麵包，蘋果，蜜柑，魚肝油丸。衣服除了襯衣，還有皮馬褂，襪子手巾特別多。我想燕京同人儼然是拘留室裡的貴族了，連憲兵都很羨慕我們的，我計算着約每五天家裡就送一次東西，而且還是和其他同人一齊送來的。現在我一日除了正常的三頓外，自己又添上兩頓，上午十一點鐘吃麵包夾肉鬆，還就着黃油或Cliese等，下午四時半吃花生及水果。但吃時總覺得很不好意思，請同屋的吃，他

們又很客氣，除非很餓，不然，不會吃的，讓他們看我一個人獨吃，那更無法下咽了，所以總讓他們吃些花生糖果等零星東西。

我正在整理食物時，憲兵又送來一位新人。憲兵一走，他就一面笑，一面說話，但我們却聽不清楚他說的是什麼。一時又到中飯時候了，我見送飯的不給這位新來的饅頭，又不給菜湯，我替新來的說道：

「又有一位新的。」

「他是日本人，」送飯的答道，「不吃這個。」

我想這倒有意思，我正想看看日本犯人吃什麼，開開眼。我們支那人快吃完了，這位日本犯人才有飯吃。他有一大碗大米飯，一大盤豬肉炒青菜。自私的日本人，連飯食都有分別！可惜他還不想吃，問我們吃不吃。見我們沒有回答，只是搖頭，他就說道：

「在這裡面，通通一樣，沒有關係。」

我見他非常客氣，倒不好十分駁他面子，遂吃了一口菜，一口飯，終覺沒有意思，就不吃了，他把飯菜全倒進恭桶裡了。我對他道：

「你不願吃冷飯，我請你吃麵包如何？」

「不餓。」他答道：

從這十來天的觀察，新來的總是吃不下的，但往恭桶倒，真是可惜，假如那位年輕而短舌頭的還在這裡，他倒可以吃個飽了。

這個日本犯人很能交際，他的坐位老是改變，總想跟我們三人聊天。據說他父親在日本某城市郵政局裡當局長，他到中國已有三年了，娶了一位蘇州太太，住在天津。他這次進來是爲了憲兵疑惑他跟第八路軍做買賣，他每年總有二三萬元寄回家鄉，這引起了憲兵們注意了。其實他的進款都是由來往平津口外販賣鴉片得來的，他在天津日本憲兵部有靠山，那裡的曹長都是他的同學，所以他敢胡作非爲，但這次他却走了惡運，在北平某個日本旅館裡被憲兵拘留了。他已當過兩年兵，還有免役證明書存在旅館裡，他怕遺失了，又得重新入伍，所以他現在焦急的不在憲兵檢問官的問話，而怕那張證明書的遺失，他早已問過話，打過手印了。他說他快要出去了，問我有什麼話帶回家。我如今對於日本人毫不信任，那裡還敢託他辦事？

聊聊天，時間總算過得還不慢。到天黑時，晚飯又來了。飯後，日本犯人就唱起來了，憲兵過來，罵他一頓，他倒不敢回嘴，但見憲兵一轉身，就背着他空踢一脚，用日本腔的北平話說道：

「我才不怕他呢，去他的吧！」

夜裡大家都睡得很熟了，忽然憲兵來開門，推進一位赤漢來，總有七尺多高，二百來磅，約四十歲光景。憲兵沒有給他毛毯，他就躺在我旁邊，我見他怪可憐的，就分給他一條，又請佛教徒分一條。那人一睡着，即鼾聲大作，我有點受不了，却又不好意思說，倒是佛教徒起來了，叫醒赤漢，但一睡着，又呼呼出聲了。佛教徒一共起來幾次，弄得赤漢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清早起來，赤漢告訴我，他進城門時，憲兵見他手上帶的是軍用手套，就把他拘留了。他是替一個日本軍官作廚役的，還幫着日本人販過煙土。我們正聊得很好，憲兵把他叫走，就不見回來了，他確是一位很痛快直爽的人。

下午又來了一位大煙癮的，全身襁褓，骯髒非常，頭髮又長，臭氣逼人，很是可憎。他一進來，就躺在恭桶那邊，

我離他最遠，倒還好。日本犯人最近他，于是用手巾包着鼻子，背着他，合上眼。他又想跟佛教徒說話，佛教徒只得念起阿彌陀佛來避開他。還是教師能忍受，對他說：

「靜點吧，憲兵見着你說話，不是開玩笑的。」

他見大家都討厭他，沒法子，只得閉上眼睡覺。

屋子一來太暗，二來人多，憲兵進來多次，也沒見大煙鬼睡着，他總算是幸運者。

晚飯來了，我叫醒他，請他吃飯。飯他說不吃了，喝了半杯水，就想吐，涕淚交流。大家還未吃完，他終於哇的一聲吐得滿地都是。大家見了，都掩鼻。日本人站起來，躲得遠遠的，我也實在不能再緘默了，就對他道：

「你未免太髒了，一來，憲兵看見不會饒你的，二來，

對於屋裡衛生有碍，大家不便。」

他聽了沒有生氣，倒覺得我說的是，就先向我作一個揖，又向其他各位作揖，勉強起來，拿紙及布來擦。我一時生計，家裡送來的食物，有的是鐵罐盛的，就勻出一個來送給他當痰盂，他接過來，又說了一番感激的話。

睡了一夜，清早起來，這位大煙癮又着實難受起來，仍

要作嘔，他請我向憲兵要藥，憲兵大概知他的病因，遂說道：

『不必吃藥，死了更好。』

大煙癮搖着頭，重覆了憲兵的話，心裡好像非常難受。

他見大家都不愛睬他，遂對佛教徒道：

『你別瞧不起我，我從前很有錢的，家裡倒有十來萬，那時吃穿都很富足，像你這樣的皮大衣十件也不稀奇。但自從有了嗜好，一年化上二三萬，不上幾年就連房子都吃倒了。』

言下大有今昔之感。

屋裡恭桶越來越破了，便溺四外流，附近滿地都是。雖然我的地方離恭桶最遠，但爲了維持屋內衛生起見，我每于倒恭桶回來，就動手擦地板，日本人也愛潔淨的，見我作，也來幫忙。我又唆使他向憲兵要新恭桶，看守憲兵把情形報告他們的班長，班長過來看看，並無若何表示，倒是有一個高麗憲兵說得幽默，他道：

『你們不尿水就得了。』

一月廿四日又是星期六了，上午出去洗澡，又看見正

誼，問他有什麼消息，他很憂愁地答道：

『不大妙，許送軍事法庭。』

他在水槽上寫字，看守憲兵過來問我們說什麼，倒沒看見正誼動手寫字。我洗完澡回到拘留室，想一想，燕京既然抗日，到軍事法庭倒有可能，但這是團體的責任，個人想不至有問題吧。下午，倒恭桶時對陸先生說了，陸先生說這是憲兵吓唬人呢，他不信，我又得了些安慰。

今天下午憲兵又送進來一位，據說是電作工匠。憲兵部疑惑他與第八路軍有來往。他身穿藍布大褂，裡面套着棉袄棉褲，約有三十歲年紀。可惜我和他隔得太遠，沒有機會和他詳談，前後共住了三天，他就走了。

星期日早晨又送進來一位，眼睛通紅，流着眼淚，老用手擦，砂眼的程度，必然很深。約二十歲，身上穿得很薄。據說會像日本軍隊交通電線來的。進來三天，就送交北京地方軍警辦理。他倒是一位痛快人，臨走時還說：

『大家在外邊見面。』

星期一下午又送進來一位中學生模樣的少年人，據說有人在憲兵部控告他，所以進來的，我見他怪可憐的，先送

他一張毛毯，又請佛教徒也送他一張，然後安慰他道：

『不用害怕，反正你很年青，還不及法定年齡，憲兵不會難爲你的，說話小心些，就行了。』

他點點頭。過了一次堂，就打手印。大煙癮及佛教徒見他快出去了，都託他往家裡帶信。

燕京的同人們，不判也不釋放，在拘留室已經快兩個月了，還是不能走，真是把人悶死。近來差不多天天都聽見嘉通和正誼跟憲兵說話。正誼用日本語說，我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嘉通不是跟送飯的多要饅頭，就是跟翻譯的說飯菜不好。我差不多天天跟憲兵要便紙，不但屋裡人多，需要多紙，還可借此看電報，因為憲兵常送進印刷電報的紙張來當便紙用的。

我們對拘留所一切都熟識了，所以也不用十分畏懼憲兵，有機會就和燕京同人們說話，倒恭桶時，這是說話最好的機會，如陸先生，周先生，豁軒，仁之，差不多天天見面，這幾位都是住北邊一列屋子的，總是同一隊出去倒恭桶。我有時還藉着別人倒恭桶，得着機會還能見嘉通，艾積，賢能先生和一謬先生。煨蓮，東蓀，紫宸三位先生

住在第十四號，我們倒恭桶時先在他們屋門前排隊，所以每天總能見着他們，除非憲兵把他們的房門關起來。這樣彼此見見面，總會得着許多安慰。所以倒恭桶不但是一種好運動，而且還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社會接觸，這是一天最快樂的時刻。

天天倒恭桶時，常注意到各房間住的人數，近來每間屋總不會少過五個人的，有兩三間還住八九位呢。同屋日本人告訴我說外面憲兵嚷着人太多了，我們屋也常有六七位的。不知外面會有什麼變動，爲什麼憲兵捉人捉得這麼凶呢！

同屋的那位年青的中學生已經走了。大煙癮吐了幾天，也好了，現在已吃飯。他的足部像癩了一樣，行走不大方，但見我每天早起作柔軟體操，他也效法了。憲兵見他可以活動了，就叫他出去過堂。我不知不覺的有思想感化他，常勸他以後不要再抽大煙了，又常給他餅干吃。我雖然還嫌他髒，但倒覺得他很有點意思的。同時我現在才知道戒煙是這樣容易的，真是不費吹毛之力，只要把抽煙的關起來，兩三個星期就成了，但不知他出去後還會再染上不？

夜裡，大家都已睡熟了，忽然憲兵又送進一位新人來，我被吵醒了，却仍粘着睡，就怕憲兵又拿了我的毛毯送給新來的這位。憲兵把門關上就走了。我聽見新來的這位跟日本人說話，猜想他也是日本人。他穿着西服，很是年青漂亮。他在屋內踱來踱去，又在那裡自言自語，忽然又獨自笑起來。

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才問進來的原因。原來他是明太祖的後裔，滿清入關，祖先遷徙台灣。自從日本佔據台灣，他就變爲日本人了。他是昨夜在舞場喝醉酒，搶舞女，打人，被憲兵押進來的，同來的還有三人，他早飯中飯都沒有吃，下午三點就被釋放了。

我閒着，每天都跟日本人學習日本拼音字母。他是很樂意教的，用一枝很尖的筷子，在木牆上寫着平假名片假名。我一共化了三四天的工夫，就把字母記得爛熟的了。假如在外面學，就是用半年的工夫，恐怕也不會記得住的。同屋的人都跟他學日本話，他又跟我們支那人學中國話，他特別喜歡學中國各式飯菜的名字。

不學語言時，大家都算着舊曆年底到來的日子。自然大

家都願意回家過年的。我平常對於陽曆年陰曆年都不感到興趣的，但現在大家談到舊曆年節時，我也發生特別濃厚的興趣。記得陽曆年底時，我很可惜自己不能回家過年，但當時總不會想到不會出去過陰曆年的，現在想起來，回家過陰曆年也成問題了，心裡忽然又痠疼起來，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家的。

在閒談時，佛教徒總覺得自己很有把握快出去了，但有一天下午，忽然又被憲兵叫了出去，這是大家預料不到的。可是沒有半個鐘頭，他又回來了。他一進來，大家都覺訝然。他的臉是灰白的，兩個眼球凸着。棉袍掛着白灰，還有撕破的地方，脖子和衣服都濕了。日本人見他站不住，就起來扶他。他躺了好一會，才說出話來。原來憲兵叫出他去，沒有問話，先打了一頓，灌了兩大瓶涼水，身上又給澆了水，就把他送回來。日本人一面同情他，一面自覺慚愧，像有點想不到他本國的憲兵會下這種毒手。

佛教徒老嚷肚子漲，但又沒有尿。日本人替他解開濕的衣服，見滿身通紫，據說是用大塊劈柴打的，早年聽過日本憲兵非刑拷打的故事，全被證實了。我心裡想：中國人

已經被日本人打醒了，中國是再也不會亡的了！

是夜，佛教徒整夜睡不着，老是在那裡呻吟。幸虧他的身體壯碩，三四天就痊癒了。

不知是什麼原故，佛教徒忽然覺得我是可靠的了，把他做的事情都告訴我了。原來他在佛教會做事。佛教會辦過一間小學校，舊有二三位教員，是日本憲兵部認為有抗日行動的，憲兵去問佛教會會長江某，江某就請這位教徒去答話。這位教徒以為到憲兵部來說說話，就能回家了，想不到會被扣留這許多日子，更想不到會挨打的，況且江某是偽組織下的要人，是個親日分子，那會難為他的代表呢？想不到日本憲兵是這樣不留情面的呀！

檢問官初問教徒那幾位抗日教員，是否認得，他答不認得，更不知他們的下落。現在打怕了，他又想改供詞了，但不知好不好，所以來問我。我雖是很想幫忙，無奈不知個中細情，只得告訴他隨機應變而已，心裡覺得很對不住他。

又是一個星期六日（二月三十一日），大清早，憲兵還沒叫起床呢，同屋的日本犯人就請出去了，原來是為着洗

澡，其他拘留室內的日本人，也被叫了出去。日本同屋叫醒我，跟我借胰子及毛巾。我對南苑教師道：

「這又是一件優待日本犯人的事實，怕我們支那人沾污了他們。」

吃完早飯，我也出去洗澡，正誼告訴我說大概不用到軍事法庭去了。我雖然不相信日本憲兵的話，但心裡總減了些憂慮。

這幾日因空襲演習，室內的燈光都搵滅了。我們五點多鐘就吃晚飯。晚飯剛吃完，憲兵就叫我們睡覺了。我很怕滅燈，大小便多麼麻煩？但可以騎騎歇歇，倒也很好。

星期日晚飯後，日本人，南苑教師和我三人在聊天。日本人又跟南苑教師學中國國語注音符，他的聲音實在太大了。一個憲兵開了門進來，先叫日本人站起來，又命令他脫了眼鏡，好像要打他嘴巴的樣子，但日本人說了幾句話，憲兵就放下手不打了。又叫南苑教師，先罵一頓，然後舉起左右手分打教師的兩頰，日本人代教師求情無效。

我坐在地板上，忐忑不安，怕第三就該輪到我了，但憲兵打完教師，就鎖上門走了，我總算幸免于打，但很替教師

抱不平。

星期一上午大家記着昨晚憲兵打人的事，都靜默着不說話，真是無聊極了。午飯後，兩點多鐘光景，忽然憲兵叫着南苑教師的名字，又問他有沒有自己的東西，全帶走，他被釋放了。屋裡留下來的都替他高興，大家都說道：

「假如打一頓，就能出去，我倒很願意挨打。」

佛教徒自從受傷的地方痊癒之後，又過了一次堂。現在他天天很注意有沒有他認識的人進來，想是他已經把佛教會小學的舊教員的名字及住址都告訴日本憲兵了，這可是他自作自受了！

現在天氣漸漸暖和起來了，真像開春的景象。因為屋內人多，空氣不好，憲兵天天清早就把窗門打開，望見柳枝好像柔了許多。但同屋的人穿著太少的，覺得很冷。可巧最近家裡送來一張毛毯，我又存棉衣，皮袍，皮馬褂，所以一點也不怕冷了。

只是最可煩惱的，莫過那隻恭桶了，一天壞似一天，屋內臭氣難堪。假如春天到來，傳染病就不得了了，每天晚上又有耗子作祟，來個鼠疫，那就只有九死一生了。

想是因為快到陰曆年了，拘留人全體動員，把各人的房

間潔淨一下。上午憲兵送進胰子水來，於是同屋的都忙起來了。日本人和我是最努力的。我一面擦地板，一面想：希望是為別人擦的，如能回家過年，那是多麼快樂啊！地板擦完了，日本人可以出去洗手，我可沒有這個機會，真是不平等呀！

二月七日星期六上午，在浴室裡又遇見正誼，我問他：

「陰曆年前能出去嗎？」

「用不了等到那麼久了，兩三天內就可以出去。」

我聽了自然很高興，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日本人的話，於是對自已說道：

「到了家，再高興吧！」

下午倒恭桶時，正誼也出去了，我猜他必有許多話要說的。果然，他也不理憲兵有否看着他，就跟陸先生大談起來。他告訴陸先生最近跟憲兵談話的經過，他說道：

「憲兵長官，認為我們大家的供詞都差不多一樣的，燕京人既不抗日，又不親美。」

他又說憲兵長官要在釋放我們之前，開一個圓樺會議，

大家交換意見。最後他又主張：

「我們不要上當，還是維持我們原來的立場好。」

我點頭稱是，但一回到屋裡，把他的話再一細嚼，又把過堂時與檢問官對答的話，重溫一番，我就懷疑正誼告訴我們憲兵說的一些話了。

晚飯的時候，一個憲兵送進一枝鉛筆及十幾張紙來，上面寫着一個題目：「最後的心情。」我一面吃饅頭，一面想着文章的作法。我正拿起筆來寫，忽然聽見憲兵跟嘉通說話，告訴嘉通：

「今晚不要寫，明天慢慢的寫。」

我怕受干涉，於是放下筆。憲兵叫過睡號之後，我就躺在地板上沉思。我想周先生尙未過完堂，燕京的案子似乎仍未了結，但既然要寫最後的心情，或者是分批放人也未可知。我的心思于是又轉至文章的寫法上去了。這時屋裡較靜，我悄悄地執起筆來寫了幾條：（一）感謝憲兵部的優待，讓家裡送衣送食。（二）希望中日早日停戰，恢復邦交。（三）希望日美早日停戰，恢復邦交。（四）希望燕京大學早日復學，向世界新文化建設努力。寫完了，心裡覺得

很平靜，不一會就入睡了。

星期日清早起來，我將昨夜寫的重念一遍。日本人坐在我旁邊，于是我向他請教，他看完了，說道：

「很好。你快出去了。」

其他同屋見日本人這樣說，於是也來向我道喜。佛教徒又托我出去時到他內弟家，請他內弟轉求江某來營救他，我點頭答應了。

等了一天，憲兵仍未來收卷子，我又怕有什麼變化了。但又想星期日憲兵長官或許不辦公，收了去也無用的。反正發下來，不會不收卷子的，所以再不惦記這件事了。

星期一上午，一個憲兵進來收卷子，我將卷子鉛筆及剩下的紙張都交給他了，暗想今天下午不走，明天必是時候了。我把盛食物的空鐵罐玻璃瓶髒衣服等都包好了，吃剩的面包，蘋果，花生，餅干，我預備送給同房的吃。

下午倒恭桶時，豁軒站在我旁邊問我道：

「有沒有希望出去？」

「按着正誼的說法，明天就到期了。」

見他臉上表示滿意，我也增加了許多信心。倒完恭桶，

回到屋裡，遂把餅干送給抽大煙的，並對他說道：

「假如我明天出去，請你把我剩下的吃食，分給大家吃，餅干特別送給你，希望你出去，不再抽煙了。」

他點頭作揖，表示感謝。

我好像太興奮了，一夜都沒有好好的睡了，第二天（二月十日）早上起來，我自付道：

「今天該出去了吧？同學出去已有一個月了，難道我們比同學多關一個月還不夠？」

此時情緒非常緊張，我每分鐘都很注意屋外行人道上過往人及憲兵說話的聲音，本來每日十點多鐘，我就吃水果麵包的，今天倒不想吃了。

我正在注意外面的動靜，忽然聽到好多人腳步聲，但是走得太快了，我認不清楚是誰。我的心志忑地跳動着，血液的溫度，好像已升到沸點了。我覺得外面走路的人，一定是燕京的，不然，不會有這麼多人在跑來跑去。

忽然，外面腳步聲減少了，我想難道不是燕京人？明明隔壁六號有開門的聲音，莫非不是裕軒。但四號的正誼似乎無聲無息的。我這時非常焦急，好像沒有希望似的

了，同屋的好像知道我的心事，也在那里瞪着眼，看着我，向我表同情。

我正在焦急，忽然來了一個憲兵，叫着我的名字，告訴我把自己的東西全帶走。我急忙左右手分提了兩包東西，又指着剩下來的東西向同屋的說道：

「你們能吃就吃了這些東西吧！」

還沒有聽見他們的答話，就被憲兵催着我走出門了，我還在那裡穿鞋，外面的憲兵又在呼喚我的名字。心想：放同學時可沒有這樣催促的，難道真的要送軍事法庭嗎？既而又想，送去也吧，反正離開那個破恭桶就好了。

我沒有好好的穿上鞋，就走到地窖子的行人道上。燕京人早已在那裡排列成行，大家的臉色都不好看。一個憲兵手上拿了我們的名單，見我到了，就喝着道：

「全齊了，快快走！」

在路上我注意到學章先生，賢能先生，正誼，艾楨都沒有出來，心想這又許不妙，難道憲兵部又騙我們一次不成？憲兵把我們領到初進來時檢查衣服的那個大辦公室裡，我們一共十一位，因為許久沒有機會說話了，于是就低聲

的交談起來，憲兵倒沒來干涉。煨遠先生計算着只有四位沒有上來，大家猜想原因，都認爲周先生因沒有過完堂，正證跟檢問官弄翻了，艾植則因抗日書籍尙未解決，賢能先生或因達仁學院事，所以他們四位一時還不能出去。

憲兵把替我們保管的東西，交還我們，同時又把大衣記錄在各人的名單上。我偷着看名單，好像都寫着罪名，但因爲是日文，字體又草，看不大清楚。一謬先生站在我旁邊說道：

『不大妙，恐怕不是回家吧？』

我心裡也知道不大妙，但還勉強安慰他，也就是自己安

慰自己。我遠遠地看見鄧文如先生要走，但被憲兵叫了回來。其田先生跟嘉通正在談過堂的情形，忽然被憲兵叫了去，原來是上村來給陳先生送行。志章先生跟紫宸先生在比瘦，嘉通也加入比較，他說他最胖，因爲他從來沒有這麼多閒時間睡覺的，我用手摩摩鬍子，好像老了十多年。

憲兵見我們東西都拿齊了，就開始點名。名點過了，就叫我們排成一行，開步走。一個憲兵領頭，一個押後，身上都掛着公文袋。旁邊站的憲兵和翻譯，見我們開步走，面上都露着笑容，好像把敵人送去槍決似的高興。但我們十一位的情緒倒沒改變。

(四) 羣體生活

從紅樓後門出來，見早有一輛汽車等候我們，車身旁有警察局三個字，開車的是一位地方警察模樣打扮的。我心裡想難道要送我們到地方法院拘留所不成？

大家都上了車，其田先生，裕軒和我坐在靠開車那邊，其他八位坐在後邊。汽車開了，從後門開向前門去，路過

拘留我們的房間，東蓀先生很幽默地指着第十四號房笑道：

『這是我住的房子。』

車一開出大門，就往東往北拐去。我見不大對，正想開口跟其田先生說話，見他也正想和我說話，我們的意思是不約而同的，但坐在我旁邊的兩個憲兵兀自望着我們發笑。坐在後邊的同人倒很高興，志章先生問我道：

「承信，培志進地窖子來，我見着她，她還說話呢，你聽見了嗎？」

「倒聽見有人提我的名字，但不大像培志的聲音。」

我本來還想繼續說下去，要約志章先生，一謬先生，嘉通三位 Play Bridge，但沒有五分回家的把握，我終於把話收回了，沒有說出口來。

車開了不多會，車夫就問憲兵往那開，憲兵說了一句話，我見車夫點頭，但聽不清楚他說的是什麼胡同。走了約一刻鐘，汽車就停在一個黑大門外，汽笛亂鳴數聲，果然大門開了，門內有日本兵守衛着。汽車開進去，直到一座樓前停止。我們走進樓內，憲兵讓我們把東西放在地上。一個憲兵看守我們，另一個帶着公文袋到樓上去。

我們還沒有工夫說話，那個憲兵已回來了，有一個下級士官跟着，我們被領進一間屋子裡。屋內放着幾把椅子，幾張長板凳。屋裡有兩個下級士官，看守着三個日本軍士犯。這三個犯人腰裡都拴着大麻繩，手上套着鐵鍊，怪可怕的，暗想這三個必然是逃兵，不然，不至於用繩綁，又用手鐐的。我又見另一個下級士官手裡拿着一本簿子，簿

面寫着候審簿三個字，我想這必然是軍事法庭所在地了，我們必然是來過堂無疑了，憲兵幫同士官點我們的名字，交代妥當，就離開我們了。

大家正想交談，下級士官就禁止我們說話。不一會，又一個下級士官進來，雙手拿着手鐐，我數一數，共六套，我又計算我們十一人，必然兩位合用一套，另一人自用一套。我越想越覺得沒有回家的希望了，不覺又心酸起來，看看大家的臉，也是有不妥安的表情。

果然，新送進來的十位手鐐是為我們用的。他們十位合用五套，兩人一套，每人一手自由，另一手和別人的一手扣上了，我套到末了，自用一套，於是雙手都不得自由了，想不到身為大學教授的我們，竟有一天會和巨盜逃兵同住，遭受同等待遇，我的毛髮不禁聳立！

看守我們的士官，約有三四名，他們坐在椅子上，一面抽煙，一面說笑。終于有一人問我們會不會說日本話，有沒有到過日本。還有一個士官老搬動我們帶來的東西，我們初時不知他的用意，後來見他找到陸先生一鐵罐餅干和一瓶花生，請我們吃，我們才知道原來這是他的好意。大

家只在憲兵部吃過一頓早飯，現在自然都很餓了，不用多大工夫，就把滿滿的一罐餅干吃了一半，大家渴了，又問士官要水喝，他倒很客氣地說道：

「慢慢的。」

果然就吩咐勤務兵沏茶，但他們喝過了，才讓我們喝。在吃餅干花生喝茶的時候，下級士官不時跟我們說話。忽有一個對我們說道：

「你們到這裏來，就可以釋放回家。」

「我們又要住在你們的房子裡了。」東蓀先生半幽默地答道。

士官聽了，也發笑了，我們大家都覺得很不痛快。

大概是下午兩點半鐘吧，一個士官叫着東蓀先生的名字，我想必然是過堂的了。但不知問什麼，又不知怎樣裁判。心裡正在想着，東蓀先生已經過完堂回來了，看他臉上的表情，必是凶多吉少，想是今天沒有回家的希望了。坐在東蓀先生旁邊的文如先生和煨蓮先生，想跟東蓀先生說話，祇因士官干涉，所以不能如願。但是煨蓮先生好像得了一點暗示，他向嘉通用手示意，我看見是「八十」兩

字，我暗想已經扣留六十多天了，再監禁八十天，可怎麼好！

每位過堂所用的時間都很短的，最後輪到我了。士官帶我進一間小屋裡，屋內一張長方桌子，一個穿軍服的坐在側邊，想是翻譯之類，一個穿軍服的，手裡拿着毛筆，面前放着紙和墨盒，這必是書記，另一個穿着軍服，少將級的軍官，胖胖的，但身材倒不矮，坐在正當中。面上表情最為嚴肅，這必然是判官了。士官用中國話命令道：

「鞠躬！」

我鞠了一個二十五度角的躬，就聽着命令面對判官坐下。穿西服的翻譯先問我姓名，籍貫，年齡，履歷，繼問我承認不承認憲兵部的供詞，我逐一答了，他最後又說：

「以後再詳細地問你。」

士官要帶我出來了，我又向翻譯的問道：

「我可以向判官說一句話嗎？」

得了許可後，我即問道：

「若是我們在這裡住久了的話，能不能讓家裡送衣服換，送東西吃，送書看？」

『慢慢的。』

我又向判官鞠了一躬，離開審問室，回到候審室來。沒有歇了多久，士官便命令我們帶着東西走。我雙手套着鍊子，拿不了兩包東西，士官還不錯，居然肯替我提一包。

一時來到停着一輛大汽車那邊，士官命令我們上車。大家都不坐了，汽車就離開了法庭。開到大馬路來時，我遠遠的看見東四牌樓。路上車馬行人，一如往昔，依然沒有變化地繼續流動着。離開大馬路，即向狹路奔來，路上行人蹣跚着汽車裡的犯人，都看呆了，一輛滿載着東西的大車，差不多被我們的汽車碰壞了。

拐了好幾個彎，走的都是狹道，汽車停在一個黑大門前，待大門開了，汽車一直往裡面開去，來到一座樓前就停下了。

下了汽車，士官領我們進到一間小屋子去，我們把東西放下。士官出去，領進一個穿軍服的翻譯的來。翻譯的點着我們的名字，每人又給了一個號數，說是在監房裡不用名字，切要記着號數，我把我的號數『五〇四』在腦子裡翻來覆去，諷誦好幾遍，怕的是忘記了。

名點過了，翻譯的叫我們在行人道上排成一行，又命令我們脫衣服。穿着滿身的衣服，還覺着寒冷，若是脫得光的，一線不掛，那裡受得了？大家都在那裡亂跳，口裡嚷着：

『冷，冷！』

好不容易檢查完了，我趕快把衣服穿上，共有兩件羊毛衛生衣，一件絨布襯衫，一件毛 Sweater，一件棉襪，一件棉袍，一件皮袍，一件皮馬褂，一件絨布褲，一件黑呢西服褲，一條棉褲，兩雙羊毛襪子，一雙棉襪子，穿得真是不少了，士官又給我們每人三張毛毯子，我祇得到兩張，而且一張毛全脫下來了，幸虧我自己帶的毯子，也可以帶着，倒算不錯。

我正穿好了衣服，士官又命令我們走。我在我前面的文如先生，在我後面的煨遠先生及裕軒，都穿得不少，只有其田先生及嘉通，穿得最少，看着冷得怪可憐的。

出了行人道，經過一個像犯人集合的院子，就進了一座樓來，我看兩面的屋裡都住着四五人或七八人不等。我們十一人，排成一行，開始報數。押着我們進來的士官把

我們交給看守的士官就走了，看守的士官開了「西大監房」，翻譯的裝得很凶的樣子，大聲喝道：

「把蓆子鋪好，面向着牆坐下，不許說話。」

監房門關上了，十一位分成兩排，面向北的從靠門處數起，有：東孫先生，嘉通，志章先生，仁之，其田先生，

我共六位；面向南的有文如先生，豁軒先生，紫宸先生，煨蓮先生，一謬先生五位。我背後，與一謬先生旁邊，有

一坑，作大小便用的，坑的旁邊有一鐵罐，盛水用的，一把笤帚，掃地用的。屋子倒還大，三四丈長，一二丈寬。

我們鋪上蓆子，然後把一張毛毯疊高，當凳子用。大家坐下了，情緒雖還緊張，但一來因爲已緊張了一天，再加緊張也不可能了，二來，大家坐在一處，彼此仗胆，倒覺有點安慰。

我們還沒有機會談話呢，而一個軍官跟着幾個下級士官已來到門外，命令我們報數，從文如先生一起，直至東孫先生十一止。

我們一點沒有準備，晚飯就送來了，每人小窩頭兩個，菜湯一碗，水一碗，沒有筷子，也沒有匙子，祇得用窩頭

撥動碗內的菜來吃，窩頭撥不動時，就得用手指頭幫忙。

窩頭是雜合麵作的，砂子非常多。我沒有看見有人吃完一整個的。吃了沒有多大工夫，收碗的就來了。除了兩三位外，我們都把窩頭交還收碗的。押送飯的士官見我們送出窩頭去，就問道：

「通通不吃！」

「我們不吃，」大家搶着答道：「請你嘗嘗！」

「你們吃不了這個，」他很幽默地說道：「開路回家吃就好。」

「開路最好！」大家答道。

他笑着就走開了。

窩頭吃不吃倒沒有關係的，要緊的是屋內沒有火，而外面又刮着凜冽的北風，大家都感到奇冷。其田先生跟看守的要由憲兵部帶來的衣服穿，看守的明知衣服等已由他們軍部保管了，不能隨便拿出來，所以回答道：

「慢慢的。」

我見陳先生太冷了，就把我的黑呢西服褲脫下來給他穿。

我們已有兩個多月，沒有機會痛快地說過話，現在也不管外面看守的士官要干涉了，大家都說起話來。有的交換

着過堂時的經過，有的焦急着在監房拘留期間的長短，有的談論到怎樣交涉要衣服穿，有的注意到要求許家裡送吃食進來。和坐在左右的同人談夠了，又交換座位，和坐在

在遠一點的同人去談話。大家談得非常興奮，真不像在監房裡，倒像在校務長住宅茶會後，彼此聊天似的隨便。看守人間或打斷我們的談話，但是談話總是繼續着的，大家的話，也像無窮無盡似的那麼多。一時天黑了，我們都不知道。看守的說道：

「預備睡覺。」

大家才又想到怎樣鋪毯子，怎樣個蓋法，大家出主意，互相參考着，但到底還是各人各樣的。

先鋪好的，已經脫下大衣或長袍躺下了，外面看守的看見了，又說道：

「睡覺慢慢的。」

于是大家起來，穿上衣服。及至聽到睡覺的口號了，大家才又躺下。有的頭靠牆，有的頭怕風，改用腳抵牆。看

守人又說話了，他說頭得靠牆那邊，于是有幾位又得要起來，腳與頭換個方向。

我躺了一會，覺得風透過牆縫，鑽進來，吹得頭實在難堪，遂起來，脫下一件衛生衣來作包頭布用，但看守的看見了，又說道：

「不許這樣！」

我只得把衛生衣拿下去。待他看不見時，又把頭包上。回想起在憲兵部拘留室時頭上戴着毛線帽子睡，真有天淵之別了。

想是一則換了地方，二則天氣太冷，三則太興奮了，大家都不能睡着，有幾位好像仍在說話。陳先生見我翻來覆去睡不着，就向我說話，我才知道他也沒有睡着。大概是夜深了，看守人見我們還沒有睡着，遂問道：

「通通的沒有睡？」

「大大的冷，睡不着。」

一人開口，大家就跟着說道：

「太冷了，請送進我們的衣服來，請多給幾張毛毯。」看守的有點不耐煩了，于是又嚴肅命令

「睡覺！」

說完話，他就走了。

我不知不覺地總算入睡了，但尚未亮，又醒了，還聽見有幾位已悄悄地在說話。不久，大家都醒了，也顧不得干涉，又大談起來，討論着天亮時，怎樣要衣服，怎樣要毛毯。

等到「起床」的號令來時，大家就起來疊毯子，剛剛疊好毯子，就又聽見「報數」的號令。報數完了，外面就響起碗聲來了，幾位肚子早已咕嚕咕嚕叫的，喜歡得了不得，但飯不是送給我們的，陳先生說：

「大概日本犯人吃三頓。」

原來昨天我們問這個看守人，支那犯人每日只有兩頓，早九時一頓，晚五時一頓。但是因為昨天沒有好好地吃這一頓，今晨肚子實在餓得很。陸先生昨晚留下窩頭來，真有先見之明呀！到太陽光從南窗晒進來了，外面又有碗聲了，果然這回是給我們送來的，仍是每人兩個小窩頭，一碗菜湯，一碗開水。菜湯比憲兵部好，但窩頭仍是砂子很多，實在吃不得。我吃了沒有一個，陳先生只咬了兩口，

也就不吃了，到收碗時，押送飯來的士官又覺的奇怪，他拿起窩頭來咬了一口，自己也知道窩頭砂子多的程度，我們見他搖着頭走了。

飯吃完了，現在是交涉要衣服要吃食的時候了，先向看守的說話，他不懂，找了一個翻譯的。他回答說今天有個什麼紀念會，保管衣服的那人不在，下午再說，但是食物是絕對不能送進來的。這次大家都開口，顯着很亂，洪先生提議，以後請陸先生做代表，交涉一切。

因為吃了點窩頭，全時間水又太涼，我的肚子又有點痛，大便次數又多，怕是瀉肚，心裡很是着急，遂跟看守的要藥吃，又向他請求准許我躺下，這個看守人倒還通情理，所要求的都答應了，我吃過藥，就躺下。

例子一開，東蓀先生胃病，洪先生頭痛，文如先生胃病加吐血，三人也躺下了。

下午，衣服經過交涉，終於送進來了。文如先生襪子破了，陸先生送他一雙毛襪子。大家把送進來的衣服都穿上了，總算暖和了許多，但到晚間，天氣仍是冷得非常，所以大家商量，兩人全一被窩以取暖。看守人來干涉，我們

說太冷了，也不理他，他倒沒有繼續干涉了。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罇先生看見水桶的水已經結了厚厚的一層冰，他把冰送給看守的看，果然，下午翻譯的給我們送進毛毯來，但還不够分配。

星期五，我們進來的第四天，翻譯的進來告訴我們說：『你們的食物不能送進來，但對於你們的飯食問題，上官正在加以研究。待一會，還給你們送棉褥子來。』

果然，在晚飯前翻譯的押送日本兵士用的棉褥子來，說是長官特別施恩的，我們自然感激不盡了。晚飯時，又送進來日本飯球，大家見了歡喜萬分，以為飯食問題可以解決了，特別向押送飯來的士官致謝。因為得了這兩種優待，我們于是又想入非非了，怕日本軍部要利用我們，幾位元老又在討論應付的方法。在監獄裡的人們，大概都有一點神經過敏的，我心裡這樣想。

到晚上，聽到睡覺的口號，我們就準備躺下了，因為有了厚棉褥子，不一會大家都睡着了，半夜醒來，看見大家還是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起床的口號已呼喚過了，大家還是不願意起來。

星期六一早起來，我忽然想到今天是陰曆大年下，于是向陸先生說道：

『假如允許家裡送東西來吃，今天我們必然會吃到陸太太送來的生日蛋糕。』

陸先生聽了，向我笑一笑。蔡先生站在旁邊，趕緊唱起 Happy Birthday 歌來，大家都附和着，這樣，我們就算給陸先生作了生日。

今天不知怎的，太陽早已進來了，送飯的還是無踪無影。昨天把飯球都吃完了，沒有剩下來為今天解饑。我聽見好幾位肚子咕嚕咕嚕的響。蔭軒嘉通總是吃不夠的，他們早就嚷餓了。陸先生為着準備交涉吃飯的問題，問每人要吃幾個飯團，幾個窩頭。蔭軒，嘉通，仁之說多多益善，最低限度也要三個。洪先生及鄧先生說不必太多，能送飯團就行了。其中還有人提議吃三頓的，這真是難為陸先生去交涉了。犯人外交不容易做，我心裡想，不覺倒要笑出來了。真想不到這般 Professor Animal（記得陸先生在校務會議時曾用過這名詞）會計較到吃的問題來。

太陽快到中天了，飯才送進來，這次沒有飯團，但是很大

的兩個窩頭，此外，還多送了我們七八個，讓我們分着吃。

嘉通站在門那邊接着，真是喜形于色了，向送飯的說道：

「大大的謝謝。」

我吃了一個，留了一個，餓時再吃。陳先生吃了半個就覺得飽了。這次的窩頭，不但沒有砂子，還夾雜着大米大

麥米，香得很，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我們的肚子還沒有餓，太陽還沒有離開屋子，大約下午兩三點鐘光景，外面碗又響了。一謂先生跑到門縫去看，說是飯來了。大家都覺得可笑，想是日本兵要把我們榨死了。這回送來的是每人兩個大飯團，不愛吃窩頭的人可樂了，大家又得一個飽。

我素來對於年節都不發生興趣的，今天晚飯後却覺得十二分難過。假如現在在家裡吃年飯，那是多麼快樂的事啊！在我的一生裡又失掉了一個應該快樂的年節了。天啊，不知何年何月方能見到家人親戚朋友，想起來，真是悲傷悽愴！

大年初一早晨起來，剛報過數，有幾位正在作禱告，忽然趙先生跪在那裡，向大眾說道：

「On this day, I declare to you that we shall be delivered!」

他的表情比在禮拜堂說教時還要嚴肅，真是神託他說出話來的，我覺得室內的空氣，從零點升到百度。嘉通待趙先生說完，和一兩位交談了一會，就對大家說道：

「等太陽晒進來時，我們請趙先生替大家禱告。」

當太陽晒進來時候，鄰近東正教堂禮拜的鐘聲一下一下的送進來，大家都向墻跪着，由趙先生領禱。我心裡不由已地默禱道：

「神啊，願你的愛，拯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界，人類的罪惡未免太深重了，願主耶穌的寶血洗清我們的心靈。」當趙先生禱告完畢，大家合着說啊們時，我頓覺身在另一世界，得着無限大的解放。幾年來放棄了的基督教，在沙灘紅樓時已無意中恢復一些禱告的生活，但終未感到像今天禮拜時那樣的神聖。宗教的力量，究竟在那裡？當我心裡稍為平靜一點時，我問了自己這一句話。

大年初二清早起來，毯子還未疊好，一個士官開了門進來，叫我們出去洗臉。我們被領到一間三丈長的屋子裡。屋內崇墻那邊有一個大的浴桶，砂灰作的。屋內當中用砂

灰砌成二尺高的洗臉台，台的中央，有兩排自來水管，我們十一人就靠自來水管站着洗臉。因為沒有洗臉毛巾，祇得用兩隻手潑水到臉上去洗，然後用手絹揩乾就算了事。我們還沒有好好地洗完，士官又催着我們走了。

大家洗過臉回來，正在猜着今天會不會過堂，果然，一個士官又來開門了，叫了東蓀先生出去。這時大概已是日本時間十點鐘了，不一會，早飯來了，是小米飯，每人還分了一雙筷子。有些日子沒有用筷子，現在倒覺多餘似的。大家正在吃飯，一個士官又來點着嘉通的名，叫他預備過堂。

東蓀先生出去後一個鐘頭就回來了，嘉通要出去，士官說：

「問話慢慢的。」

東蓀先生剛進監獄時，很悲觀。我記得他曾說過：

「在憲兵部扣留時沒有死去，這次可有點不保了。」

看他臉上的表情，他當時的確很憂愁的。但今天過完堂回來，他倒高興起來了，很快樂地告訴陸先生道：

「大概再有兩個禮拜就可以出去了，過堂不過是一種形

式罷了。」

大年初三星期二，早飯來得很早，太陽還未進來，我們已把窩頭吃完了。嘉通一吃完，就被叫去過堂。他回來時，日本犯人正吃午飯。

東蓀先生和嘉通都是在監房樓內過堂的，沒有到法庭那邊去，而審問官，書記和翻譯的却都是在法庭問我們的。我想他們三人遠遠地從法庭那邊坐汽車到這邊來，每天只問一個人，未免太浪費時間和汽油了，真想不到日本人是這樣不懂得經濟學的呀！既然我們大多數人都承認憲兵部供詞的，快快地判決就得了，何必再來這一套，甚麼非法庭那邊利用過堂的程序來多扣留我們幾位，但這有什麼意思呢？未免太小氣了！

當嘉通出去過堂時，士官來叫我們洗澡，但大家都不願意動，祇有一謬先生，仁之跟我出去。我們三人被領到初進來時看見的那個集合的地方，可是現在沒有椅子了。我們把衣服全脫下來，士官每人分給一條毛巾。這時天氣很冷，我懊悔不該出來。

我們又被領到昨天洗臉那間屋裡，屋內已有幾個士官

等在那裡，爲來監視我們的，其實我們那能逃跑呢？若爲怕我們說話吧，但在大屋裡有的是說話的機會，何必又在這裡多此一舉呢？士官們根本不會想到這些，無非是機械式做做而已。

我們三人被趕進浴槽，槽內的水真是燙得很，幸而過一會倒覺得很舒服，聽說還可以洗頭，於是我們又洗頭了。在水內泡了幾分鐘才起來。身上水還未揩乾，又被催着離去，到原來脫衣服那個地方，身上只穿了衛生衣及內褲，手裡拿着衣服，就回到監房來。大概是血脈流得很快，身上並不覺得冷，倒給了我更換潔淨的襯衣及內褲的機會。

看着太陽慢慢地離開屋子了，還是沒有叫第三個出去過堂。大家正在無聊地談天的時候，忽然門開了，翻譯的跟着一個士官站在門外，我們以爲是檢查，但見翻譯的說道：

『把自己的鋪蓋全帶出去。』

我想這自然不是放人了，必是覺得我們說話太多，要把我們分開了。這可苦了，且看他們怎樣處置吧！

(五) 沉思的機會

在西北大監房門外排成一行，報過數，翻譯的就領着我們走了。拐了兩三灣，來到另一處所，翻譯的叫我們停住，又報數。先點趙先生的號數，然後洪先生，仁之，蔡先生，他們都進着不同的屋子。這時又輪到我了，我還沒有機會看清我監房的號數，就被推進屋裡去了。啊，天啊！多可怕呀！一個人一間屋子。真是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見天日了！但事已至此，也祇得聽天由命了！

我正呆站着，忽然又聽見翻譯的說道：

『把蓆子鋪好，面向牆坐下！』

我無意識地依照他的命令做了。記得在西北大監房時，一來因爲肚子不舒服，二來恃人多不怕，所以常有機會躺着。現在孤身隻影，如何是好呢？老是面牆坐着，豈不就要變成傻子了嗎？

記得在大屋時，一面吃，一面和大家說笑，倒不覺飯難吃。現在小米飯又送進來了，菜湯也與大屋時無異，但一人獨嚼，有何滋味！我一面吃，一面用手搓成飯團，用便紙包上，預備明天早晨餓時再吃。

晚上，睡覺的時候，更覺難堪，既想念着家裡，又回味

着過去一星期在大屋時所過的團體生活。我躺在地板上，翻來覆去，不能成寐。不時看見門外有看守人在巡邏，隔壁屋子送來的咳嗽聲，似是陸先生的，又像是陳先生的。

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才鎮定了一點。記得在大屋時，陸先生，蔡先生，仁之和我每天早晨總有一次柔軟體操的，現在隔壁屋裡又聽見有作體操的聲音，這倒提醒我了。我從日本犯人吃早飯時起，直到收碗時止，約共做了二十多分鐘的運動。今天上午的兩次報數，還是照常。我在第一次報數之後，便把昨夜搓成的飯團吃了，所以倒不覺得太餓了。第二次報過數，給我們的飯也送來了。這次是兩個大窩頭，我吃了一個半，菜湯裡還夾雜着魚刺，我連魚刺也勉強咬碎，咽了下去，以助營養。

飯後，我盤腿坐着默想：假如剛進來時，就單人一屋，那我非瘋了不行。現在呢？在大屋時，曾經得着機會和人家交換意見，知道在憲兵部問大家的都是些什麼，同時在法庭那邊問的是什麼，也略知梗概，倒不覺落空了。這種寂寞的生活，雖然可怕，但是利用這個機會，來省察省察過去的事工及人生問題，並非完全無意義的。早晨起來，

已經作過禱告，現在爲着心靈上得點慰藉，又合着眼，跪着，低頭默禱一會，我要爲家庭，爲學校，爲國家，爲人類禱告，特別爲在監獄及拘留所內的燕京同人祈禱，願他們的生命得安全，願他們的心靈得解放。從前以爲禱告有點近乎迷信，現在倒覺得它是人神合一，人與人團結的最可寶貴的表现，人類奮鬥與前進能力的最大的根源。

正在沉思着，忽然遠遠的送來東蓀先生跟看守士官吵鬧的聲音。大概張先生要騎着，看守人不許，於是衝突起來了。每一個聲音對於我都像刀刺一樣難堪，我心裡痛苦萬分。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只要低頭，爲張先生禱告。

張先生一共吵了兩天，以後倒很好了。每天我都聽見有士官及翻譯的跟他聊天。雖然不知道他們聊的是什麼，但常有人來解悶，倒是好事一樁。于是我又羨慕東蓀先生了，可惜我沒有他那種勇氣，不然，吵鬧一下子也好。

搬到這邊來以後，好幾天了，也沒聽見叫燕京人過堂的。心裡捉摸不定審問官要演什麼把戲。記得在大屋時，其田先生說過，上村在憲兵部給他送行時，還告訴他休息兩星期再到憲兵部去見上村的，難道真的關兩星期就放

人？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吧！

現在每天起來，總有體操，有時中午及睡前還有一次。一來可以消磨時間，二來盤腿坐，的確難受，運動，運動，才好受些。但是吃得不夠，又不能太消耗精力了。

講到吃飯，早上一頓是窩頭，很大的兩個，可以吃一頓而有餘。晚飯是小米飯，前幾天吃的是乾硬的，現在可有點太爛了，有時簡直像稀粥。假如兩頓飯隔得距離長些還好，若是上午那一頓十二點鐘才來，而下午那一頓兩點鐘就來，則上午要餓死，而下午又要撐死了。有時想到吃飯這問題，真是越想越生氣！初時吃小米飯，還給我們筷子，現在士官叫我們用手指頭，真是豈有此理！想不到日本人會這樣不通情理，也未免太瞧不起中國人了。對面屋的日本犯人，日食三頓，每頓都是大米飯，有時還吃魚，吃肉，筷子也有。而我們連一雙筷子都捨不得。有一次聽見張先生提出質問道：

「他們吃三頓，我們爲什麼吃兩頓？」

「他們做工，」一個士官答道：「你們不做工。」

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了，但是不做工的日本犯人居多

數，爲什麼也吃三頓呢？我想普通日本人家都沒有吃得這樣好的，主要的理由必然是爲的好好養着他們，將來好去打仗送死。

寂寞的生活，已快度過一個禮拜了。每天夜裡，總算睡得不錯的，但有一天，忽然覺得身上癢得很，我用手摩擦，全身癢子，這是怎麼來的？莫非晚上蓋得太多，但不覺得熱。脫開衣服看看，原來衣服上藏着許多蟲子和跳蚤，牠們吃得飽飽的，滿肚子都是血，而我的身上，疙疙瘩疔，白天還好，晚上癢得睡不着，真有點急死人，但是越急越癢，真是無可奈何呀！有一個夜裡，實在不能再忍受了，看見看守人在門前經過，我叫住他，跟他要藥，但是他不理，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又向別個看守人要藥，又向翻譯的要藥，可惜都歸無效，于是我就決定用自然醫治法，每天脫下衣服，用風吹吹，不到一個星期倒痊愈了。

兩個星期後可以出去的希望又消失了，隔壁依然住着陳先生，並未去見上村。若不是上村不知道我們又住在監獄了，就是他有意騙陳先生。進來已經快二十天了，除了在大屋時知道東葆先生和嘉通已經過堂外，現在却不知那位

又過了堂。上次出去洗澡時，大家見面，都表示還沒過堂，真是沉悶得很。

說道洗澡，每星期一次，這可以說是星期中最快樂的一刹那。每次洗澡，燕京人總在一塊洗，我們既可見面，又可以說說話，解解一星期中的煩悶。在大浴池裡，大家用手打着水，水聲響得很，看守我們的士官，就不理會我們在說話了。

大家都是住在西邊屋的，雖然不能像在憲兵部時，可以和對屋的人打暗號，但是在煩悶的時候，交換着敲敲牆，倒也有意思，可惜事前沒有約定暗號，所以滿肚子的話，就無處訴說了。記得在大屋時，洪先生還教過大家如何用手指表示意思，無奈現在也用不上了。

肚子越來越覺得餓了。以前還可以留飯球或窩頭，以備餓時充飢之用。現在換了一個很嚴厲的士官來檢查，每天下午吃過飯後，才來檢查。屋裡兩個窗台，都往下斜，當士官進來時，就看見向外開的西窗，當他出門時，又看見向內開的東窗。牆是沙灰的，地板很密，沒有一點地方，可以掩藏東西。棉褥和毛毯，全得敞開，水桶，便桶也要

查看。有二次，我聽見隔壁蔡先生的窩頭被拿走了。我想把自己留下的吃了，免得被拿走，但已來不及了。幸好，這次檢查的沒進我的屋子來。第二天，我又將半個窩頭收藏起來，下午檢查的進來了，他見了窩頭，也沒說什麼，我的心却忐忑地跳個不停，等到全檢查過了，他就把半個窩頭連包窩頭的便紙全拿走了，真是不幸之至。假如又瀉起肚來，沒有便紙，怎麼辦？於是鼓着勇氣跟看守的士官要便紙，這回倒沒有碰釘子。想不到在家時最不成問題的的事情，現在都變為最嚴重的問題了。

生活的調適，日在變化，初居獨室時，心情實在不安，現在總算慢慢地靜下去了。反正一時是不容易出去的了，還是好好地利用時間吧。一天除了鋪被，吃飯，體操，禱告，還剩下不少的時間，我計劃着怎樣利用這個空閒的時間。

自從被拘留後，我就打算寫一篇社會學方法論的文章，在憲兵部所擬的局內觀察法的試驗，來到監房，又增添點材料。同時，近來對於宗教問題又漸漸地發生很濃厚的興趣，現在每日用在思索這兩個問題的時間最多。此外，

便是毫無系統的思想了，一時想到家裡，一時又回憶過去各種的活動，于是又幻想着釋放後一切可能的工作。物質生活越簡單，心靈的生活，却越活躍了，有時思想過度，到晚上都不容易睡着了。

有一天早上起來，剛報過數，沒有多大工夫，遠遠地聽見士官叫陸先生的號數，我計算着日期，已是我們到監獄來三個星期之後了，隔着嘉通過堂時也有兩星期了。陸先生過堂比較快，他回來時正是我們吃早飯。飯後，隔壁的蔡先生又被叫了出去。他回來時，正是日本犯人吃中飯。

晚飯前，忽然聽見蔡先生叫士官道：

「大大的冷，蠶子在身上咬了一個窟窿，大概是斑疹傷寒吧！」

于是士官叫了一個穿白衣的來，穿白衣道：

「給你這個藥吃，睡覺就好了。」

晚上，蔡先生的病，似乎更嚴重了。夜裡好像都沒有睡着。本來他的身體最好，想不到他第一個先病倒了！

自從得了皮膚病之後，我天天都捉蠶子，跳蚤，臭蟲等，現在知道蔡先生的病是由蠶子傳來的，故更加細心

地捉拿了。

嘉通好像也知道蔡先生病了，于是跟士官要殺蟲藥。果然，過不了幾天，大夫就來檢查蔡先生的病，知道不是小的傷風，遂發下來殺蟲藥粉，叫我們往衣服及毛毯被褥上打。我連木板縫裡也打上了，不一會，用筲帚一掃，掃成一堆，跳蚤蠶子等總在百數以上。

我們來到監獄，大約已有一個多月了，一天下午，忽然聽見翻譯的叫着幾位燕京人的號數，不大工夫，又來到我的門前。從門的小窗送進一包衣服來，並且叫我把髒衣服都送出去。我接到衣服，非常高興，于是又希望將來還可以送進食物來。但是隔壁的蔡先生，因病不能換衣服，我想這倒苦了蔡太太了，不知翻譯的怎樣對她說呢。

蔡先生的病勢，越來越嚴重了，每晚的溫度總在四十一度。他要求醫生替他請求士官，許他回家醫治，好了再進來，法庭要舖保或錢保都可設法的，但是這個要求並未生效，而蔡先生的病却愈來愈嚴重了，已入危險境界，我此時也顧不了什麼了，聽見大夫來了，即站在門口高聲說道：

「醫生，回家不成，就送五零九號到日本同仁醫院去療

治吧，他的病太重了。」

「沒關係，」醫生很有禮貌地答道：「慢慢地就好了。」

我倒無話可說了，只是天天爲他禱告着，直到他的病痊癒爲止。記得在大屋時，他曾對我說過：

「承信，我們是前線的戰士，爲國而死，也是值得的。」他的話給予我極大的感動，尤其在�他的病中，更縈繞腦海，一刻不能即去。

近來窩頭已經不吃了，每天兩頓全是小米飯，而且越來越像粥了，有時還夾雜着許多砂子。我有一次真有點忍受不住了，細細的揀，揀出來的砂子，用紙好好地包上，看見大夫來時，就告訴他道：

「醫生，這一包砂子，是從一碗飯裡揀出來的，很不合衛生，吃了胃痛。」

他笑了一笑，沒有說話，但是過了幾天，飯倒好了，沒有什麼砂子了，可是依然像稀粥。有時還盛得淺淺地不夠一碗，想是日本軍部要節省了，不過日本犯人仍是吃得很好的。

飯食，砂子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就是生米，常常飯沒有熟，就送進來了，有一次我正要說話，遠遠地聽見洪先生說：

「飯實在不能吃啦，今天上午沒有吃，現在又不能吃，實在是餓，但是這個是吃不得的。」

後來到日本犯人吃晚飯時，洪先生倒得了一碗大米飯吃。

家裡每隔五天送來衣服一次，難爲她們遠遠地跑來。但是一星期內最高興的日子，除了洗澡時大家見面外，就要算家裡送衣服了。每次接到衣服時，總要想到家裡一定還平安的，不然，那能老如期送來呢？

只是我自己的身體却越來越不成了，虛弱得很，盤腿坐了一個多月，實在難受異常，腳與腿常常麻過去了，我小時常有抽筋病，現在真怕這病再復發，大姊姊就是抽筋病死的，想至此心裡就有說不出來的痛苦。因此，一有機會，我就起來走動走動。有一個晚上，被士官看見了，我立刻坐下，幸虧這個士官還懂情理，他說道：

「小小的踮踮腳可以。」

我聽了，倒很高興。其實一人一屋，走動走動，對於監房秩序沒有什麼影響的，這個士官總算還明事理。又一個下午，我正在那裡走動，被一個高級軍官看見了，他喝道：

『坐下！』

我這時真有點忍受不住了，乃解釋道：

『有病，不能坐得太久。』

剛好有一個穿白衣人經過，高級士官叫住他跟我說話。

我說道：

『醫生，這幾天我常常抽筋，要走動，走動，還得躺躺才好。』

『很好。』

『很痛嗎？』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機會呢，遂答道：

『痛得很，請你告訴我家裡人送補藥來吃。』

他沒有說別的話，祇簡單說道：

『痛時就躺下。』

從此以後，我倒得了方便，時坐時躺，而且躺的時候較多。

雖陸先生他們過堂時間已有兩星期了，這時太陽已晒進對面屋，而早飯快送進了，忽然從門縫中看見趙先生在外面經過，手上像是套着鐵鍊，腰間還拴着藤繩，像在候審室所見的日本犯人一樣，想是到法庭過堂去了，我心裡不由一陣酸痛，手無寸鐵的書生，何至于用對待大盜的方法來對待呢？

趙先生一連出去兩次，第二次大概是他沒有準備的，所以他對士官道：

『我五〇七趙紫宸，已經過完堂，也打過手印，大概是叫錯了吧？』

但是他照樣套上手鍊，又被帶走了。下午回家的時候，他好像已經很疲倦了，想來他老先生未曾受過這種痛苦，老來反要遭此不自，思之痛心，我差不多為他掉下淚來。

紫宸先生過完堂回來的第二次，遠遠地聽見洪先生跟士官說道：

『他五〇七已得法官允許看書，並且還可以見家裡人，我五〇六雖未過堂，但也很願意看書，我從憲兵部帶來的書，就存在你們那裡，請你幫忙，替我取出來。』

我聽了，心也動了，如果能看書，倒也是一件可喜的事。可惜，等了幾天也沒見他們得到書籍，趙先生也並沒有出去見趙太太。我覺得不是日本軍部號令不一致，就是有意騙人，我以爲日本國強雖是強，但未免太不大方了，專門愛作騙人的事。

因爲趙先生他們沒有得到書籍看，我也不必請求去了，免得再碰釘子。但是我的身體越來越壞了，不得已我又硬着頭皮請求翻譯的向上官要求准許家裡送食物來，說了許多話，結果還是無效。

又過了幾天，一個士官給東蓀先生和嘉通送來東西，說是家裡送的，但不知是什麼。又過兩三天，士官給我送來哈利巴，才想到東蓀先生他們收的也許也是這東西。

來到監獄已有七個星期了，忽然聽見隔壁陳先生的屋門開了，後來又聽見有陸先生的語聲，才知道他們兩位同屋住了。前些日子，已經知道文如先生搬到東蓀先生屋子去了；及聽到洪先生的語聲，又知道他同紫宸先生同屋了。洗澡出去時，又看見仁之跟一位非燕京人同屋，他們都不會感到寂寞了，我倒有點嫉妒他們呢。

一謬先生病了三個多星期，溫度總算下去了，白天也不叫冷了，也不大要開水喝了。晚上醒來，也聽不見他的呻吟聲了。我很替他高興，更爲蔡太太高興。回想到前些日子，一個晚上，蔡先生渴得利害，在那裡叫看守的士官，叫了許久，沒有回音。我已經勸下了，但爲了同情心的推動，于是我起來了，在門縫中看看有無看守的。好替他叫一聲。果然，對面房門外站着一個士官，我叫他一聲，他跑過來，狠狠地用劍鞘指着我。却沒打過來。原來他是在那邊靜察犯人說話的，怪不得他一聲不響，不但蔡先生白叫了，連我也白起來了。

又是一個上午，房門外行人道的士官，忽然很嚴肅地侍立着，不一會有幾個高級士官領着幾個穿白表的警官從那裡經過，他們大概是來檢查監獄衛生的吧？想來日本真有強國的氣象，一切都能近代化。可惜他們是強而不大，不但他們的領土小，就是人的胸襟窄得很，好像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家似的。這一次日本兵到中國大陸來開開眼，將來對於日本人的生活習慣與人生哲學，必有很大的影響。社會學上所謂的兩個相異的文化接觸了，必然會起變化。中

國的國民性和日本的國民性接觸了，將來對於東亞這兩個民族，不知會發生什麼影響呢。

醫官走過之後，翻譯的又送進一個小瓶子來，叫我們捉蝨子和跳蚤。我捉了三四個跳蚤到瓶子裡就算完事了，蝨子早已捉清，現在沒有可捉的了。聽見其他同人說不容易捉活的，但死的倒有九個，可是日本醫生不要死的。

晚飯來的時候，送飯的又送進一隻筷子來，我接着覺得很可笑，想是醫官不贊成用手指吃飯，所以送進筷子來了，但是只有一隻，從這也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多麼小氣呀！

寂寞的生活，已過了快兩個月了，雖然很難受，但是慢慢地也就不以為意了。按照過堂的延宕法看來，一時是不會出去的了。所以單身住了不多天之後，我就決定：如果能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釋放出去，總不會懊悔的。那些日子所思索的幾個問題，現在竟有點成熟了。

在這幾個星期內，我常常站在現生活的立場去看過去活動，覺得過去小小的紛爭，無論在家裡，在學校及朋友間，未免太無意義了。有時思想更走得極端，要站在死亡

立場來看人類的活動，覺得人與人的關係，有時因了一丁點的事，就爭到你死我活，互不輕恕，但是人早晚要死的，這些紛爭又有什麼意義呢？怪不得有些人因為感到生的痛苦，而願一死了事的。如我們這般人，住在監獄裡，受了這麼多的痛苦，究竟爲了什麼才活下去的？蔡先生病時，求生的慾望却比他身體健康時還要強烈。他不怕一切的痛苦，還在那裡掙扎，要保全生命，爲的是什麼呢？我越想越覺得一個人的生存，不是爲自己，而是爲他人，所以人類活動的意義要建築在對他人的影響如何而定。

我因此又從死亡的問題，回復到生存的問題上去了。記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群眾有的譏笑他能救別人而不能救自己，但是耶穌說道：

『人子來世，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他又說道，『凡要得生命的，反要喪失生命，但是爲人而喪失自己生命的，反過來得着新生命。』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還要爲釘他的人祈禱。這種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說法，實是一種極偉大的哲理，而他那種

爲仇敵來祈禱的精神，實在使他從『人子』化爲『神子』了，假如人類能彼此相愛，則這次的戰爭，根本就不會演出來的。當我想至此，我的心靈得到無限的解放。假如我的存在是爲別人的，則我在監獄裡的活動，自然也是爲着別人的了。

在監獄裡，假如站在囚犯的立場來看，則現在我們這種待遇，已是很滿意的了。敵人不特不殺害我們，又不用作工，這種不勞而獲，似是不該享受的。但日本人不是說這次戰爭是爲解放中國而起的嗎？因此在監獄裡，要跟看守的士官說話時，又得站在這個立場，要站在彼此平等的立場來說話。假如因爲燕京人進來，而日本監獄能因此改善中國犯人的待遇，那麼我們也就不自進來了。從社會學立場來說，人們對於環境刺激的反應，不但要看刺激的性質，同時還要看個人對於刺激的認識，以及觀察的觀點而定。

當我初進來時，我還禱告着心靈的解放，以及團體的自由，現在倒漸漸的感覺到監獄裡就得到了解放與自由了。假如不是因爲燕京大學抗日，以及日美戰爭而被拘

留，我那裡會有這種機會來思索人生問題，特別是宗教問題呢？心靈的解放，只要在這種寂寞的生活裡才能得到，人與人的團結，人與神的合一，也得要在寂寞的生活裡才能體驗得出來的。

講到身體的自由，平常就是托人情，也不會找到這麼一個機會，可以進來觀察囚犯的生活以及了解囚犯心理的。這次進來，却給予我一個研究社會學的機會，平常得不到的自由，現在倒得到了。這種自由，雖非普通人所喜悅的，但是一位社會學家却不能不承認這種自由是千載一時的。因此，我換了一個立場來看現在的生活，倒覺得身體也得到自由了——觀察（雖是局部的）與體驗囚犯生活的自由。

我這種解釋，雖是近乎心理學上所謂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但我的確得到無限的安慰，且已了解現生活的意義了。所以我要感謝那全知全能博愛的神，因他的愛，我才能得到心靈的解放與身體的自由。小時所讀的新約聖經，以及這十幾年來所讀的社會學書，不知不覺地在我腦子裡活躍着。人生的意義無窮，而神之愛是在艱難困苦中才能

體會出來的。宗教能使人超脫死亡，這就是人類宗教活動的功能，宗教的精神在愛，宗教的方法在信仰與禱告。從禱告與信仰能得到人與神的合一，了解人與人團結的可愛。我這時真像瘋了似地高興，于是很幽默地對自己說道：

「篤信宗教的人，總是像瘋子一樣的，不然，宗教不會被知識份子稱作迷信了。」

一個人的思想，到了一個地步，就想發表出來，得到別人的反應，所以現在我很想趙先生來交換宗教的經驗；但同時又很想跟仁之住在一塊，一來，從前跟他不熟識，現在倒想得個新知已，二來，我知道他研究北京歷史地理的，我雖然對於北京市發生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北京市的認識不足，所以很願意向他請教。可惜他們都有朋友了，我怎能再有這機會呢？

四月一日，早晨起來，我又在想法找跟燕京同人全屋的機會，特別想和仁之同屋，只是想不出什麼藉口，可以向

看守的請求。早飯吃過了，我肚子有點不舒服，于是躺下了。今天是星期三，日本犯人已經洗過澡了，一個士官來問我洗不洗，我告訴他肚子痛，要藥吃，不洗澡了，怕洗更不舒服。他沒有說什麼，就走了。我正在躺着，忽然聽見另一個士官叫蔡先生出去洗澡，蔡先生說：

「病沒有好，不洗了。」

但他到底還是被士官拉出去了，我想我自然更難免了，于是起來脫衣服。果然，來叫蔡先生的那個士官，又來開我屋子的門了。

在浴室裡，見蔡先生只有皮包骨了，病後抵抗力薄弱，那裡禁得起冷風侵襲呢？洗完澡，回到屋裡，還聽他在說：

「太冷，太冷！」

但過一會，他倒不嚷了，我才放心，這會，可把我自己的肚痛也忘了。

(六) 論學談道

當我回到屋裡，見屋內的毛毯和衣服都發濕了，原來日本士官連我們病人也叫出去洗澡，是爲的清潔房屋，消毒殺蟲。我想這也好，希望蟲子真個滅絕了，今晚得個好睡。我還沒有穿好衣服，士官又來開我屋子的門，送進來兩個人，仁之和他的同屋，事情來得真湊巧呀！

房門剛關上，我就狂喜地對仁之說道：

「仁之，我今早還想你來着，想不到你就來了，這豈不是神意嗎？真是不由你不迷信呀！」

我們兩人真是高興得難以形容了。整個下午沒有停嘴地扯天扯地。聽見我提到迷信兩個字，仁之就說到他的宗教經驗。從宗教經驗又說到學校被解散事，從這又回到信仰與宗教上去了。因爲仁之的 *THIRTEEN CASES* 裡，有許多記錄，沒有被日本憲兵查抄出去，我們兩人又在那裡感謝上帝。我們又彼此交換着在憲兵部過堂時的情形，覺得日本憲兵未免太倚靠他們的「漢奸」了，對於燕京主要

的秘密工作，他們都糊裡糊塗的，我們又覺得這也是神意。

一時送飯的進來，我們才知道太陽早已落山了。晚飯後，我們兩人又繼續不斷地談下去。外面天色早已黑暗了，我們仍沒有理會到。直到外面看守的嚷着預備睡覺的口號時，我才發現屋內還有第三者。毯子被褥鋪好了，我跟仁之不約而同的跪在那裡禱告。那位第三者，是信佛的，他也在那裡跪着，合掌向佛，叩了幾個頭。

聽到睡覺的口號，我們就躺下了。我對仁之說：「今天談得真有意思呀，現在咱們歇歇吧，明天再繼續着談。」

仁之答應了，一時都無話了，但我在那裡翻來覆去，不能入睡，聽見第三者却早已呼呼地睡着了，可是仁之好像也沒有入睡。我叫他一聲，果然他還是很精神的，於是我們又繼續談下去了。我問他第三者進來的原因。仁之說這位老先生是天津人，在六河溝煤礦做工頭，是個親日份子，被人誣告了，才由當地日憲兵押送到這裡來

的。他還勸仁之好好的親日吧。我們的談話，被外邊的士官罵日本犯人的聲音而打住了，這時已是夜深。這一個晚上睡得很安然，直到第二天早上叫起床的口號時才醒。

早晨起來，屋內三人，先鋪好被，就各自作禱告；禱告完畢，仁之和我又不約而同地作體操。他還記得在大屋時，陸先生說過：

「體操是維持身體最好的一個方法。」

我的身體已經弱了，氣力不足，體操時遠不如仁之能持久，不覺悚然。

我們正在談得起勁，忽然仁之記起一件事來，趕緊走到北塔那邊，敲了幾下，好一會那邊才有回聲，他聽着好像不是蔡先生的敲法。原來他住在從前那屋時，每天都敲牆向蔡先生問好的，連蔡先生病時，也沒間斷過。他敲完了，我又和他敲南邊的牆，那邊現在住着陸先生和陳先生，還有一位也是煤礦工頭，跟我們的同屋是夥伴。

當我一人獨佔一屋時，坐，臥，走都可隨意，現在住了

三人，一間長十五尺，寬七尺的屋子那能那麼隨便呢？所以我就躺着時候多，仁之曾經有過一次傷風，得着允許，可以背着牆坐。只有那位第三者很可憐，年紀他最老，而他得面牆坐着。我躺在緊裡邊，仁之靠着門。

我說話，外邊看守人是不會看見的，仁之說話時，總用手摸着鬍子，所以士官也無法看見。因為第三者背衝着我，所以和他說話很不方便。我要跟仁之說的話又很多，因此時常忘掉有這位的存在，只有大使時，才有機會和他說話，因為便坑是靠近他那邊的。

和這位第三者同時進來的，還有三十多位，他們都是在河南六河溝煤礦裡日本憲兵扣留了一個多月，沒有經過什麼詢問，當地的日憲就給他們作好供詞，叫他們承認，他們不肯承認就用火鉗燙他們的背，他們忍受不了這種炮烙之刑，才打了手印，承認抗日，于是就他們送到北平監獄來了。我見他背上的烙印還存在，真是可憐的。我們在沙灘紅樓時，不但沒有見過這種酷刑，而且也沒有聽過，實在想不到內地的日憲竟這樣的慘無人道。

他說在某縣的憲兵拘留所時，食宿都不好，幾十人住一間大屋，臭蟲蝨子等多得很。飯食是最壞的窩頭，但可以用錢買好的吃食，自然看守人可以從中取利了。

他們比我們晚來十天，初進來時，也是整幫地住在大監房裡，大概是我們搬走了，他們就進去的。他們也是一共住了八天，才搬到小屋子來的。在大屋時，他們三十多位，商議定了，推翻原供，他已在監獄裡過了堂，却還沒有判決。

本來我在他和仁之進來之前，已把屋裡的蝨子等殺絕了的，現在他們來了，又帶進來不少，我每天在身上總能捉到兩三個。仁之沒有帶眼鏡，看不見，第三者眼花，也看不清楚，所以屋裡的蝨子日多一日了。大家天天早上起來，就捉蝨子，仁之有時睡到半夜，還得起來捉蝨子，於是捉蝨子變成我們的必需工作了。

因為不常見而，我們很注意同人們說話的聲音，而說話的人也故意把聲音放大，好讓別人聽取，藉此互通聲氣，各得安慰。在獄中和看守人說話最多的，要算煨蓮先生，一謬先生，東蓀先生，嘉通，仁之和我，而紫宸先

生，志章先生，其田先生最爲沉默，他們很少開口的。

單人住一屋時，我天天自己掃地，現在三人，一把笤帚，有時倒搶着做，但還是第三者掃地的時候多，因爲一有機會，我就跟仁之說話，因此常把掃地的工作忘了。

看見第三者的襪子破到不堪，我就送他一雙。他家不知道他在監獄裡，就是知道恐怕也不容易送進衣服來的。我們也有三個多星期沒有收到家裡送來的衣服，不知外邊又有了什麼變故了，不然，爲什麼不如期來送呢？

隨着趙先生過堂，又有兩個多星期了，此外，再沒聽見有燕京同人過堂的。難道法官把我們忘了？想至此，不免又有些難過，恐怕白白地又失掉了一個春天。仁之從西窗往外望去，看見外邊柳枝已經抽條了，這又使我們憶起燕園春天的美麗來了。我本來已經決意不再眷戀燕園的生活了，但此番又叫仁之勾起我的舊情來。回想起教職員與教職員間，教職員與同學間來來往往，多麼融洽，猶如家人父子一般親切，連在校園內散步也是美的，但是這種美景良辰，要等何年何月，才能重現眼前呢？仁之不特是一位史學家，而且還是一位詩人，他口中念念有詞地好像在

吟詩。我見他臉上的表情，就知他已在夢遊燕園了，不禁硬着心腸打斷他的詩意道：

『不要再回顧過去了，忘掉它吧！我對於過去的一切，都覺得無可留戀的。』

但是我何嘗能忘掉過去呢？即以現在的兩頓飯來說，也使人永遠流連着過去的吃食。我們雖不敢再企望着燕園的物質享受，也不敢希望志兵部那種優待，現在只希望能回復到前些日子的大窩頭的生活，也不可能了。每頓飯完了，那位第三者總是嘆口氣，如在上午時，我總會說：

『不要緊，反正下午還有一頓。』

如在下午，我又說：

『不要緊，反正明天還有兩頓。』

說這些話，無非是彼此得些安慰，所以仁之每次聽了總是點點頭，而且毫無厭棄的意思。

停了一個月，家裡今天又送進衣服來了，仁之非常高興，用鼻子聞了又聞，覺得有特別的香味，顏色又潔白，比我們身上穿的相差何止百倍。但是我們到底不知當中爲什麼停送一個月。有一次聽見翻譯的告訴紫宸先生說他家

搬到西城去了，想來或者爲了搬家，沒有工夫送了，但是細想想，又不像。

記得北平的雨季，是在夏天，今年不知爲了什麼，春天就下起雨來了，一連幾次暴風雨。見到外面大雨滂沱，仁之的詩意，又被激盪起來了，他要歌頌讚美上主的恩澤，因爲雨水能使萬物化生呀！我則因了暴風雨而聯想到太平洋的海浪澎湃，但願人類的罪惡因這一次的大流血而洗滌淨盡。

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吧，我計算着培志會送衣服來的，但是這時天上已密布了黑雲，而且還刮着大風，我猜暴風雨快來了，若是真的培志送衣服來，下起雨來怎麼回家呢？招着涼，不免要生病的，所以很希望她來，但是又希望她來，心裡正在衝突着，而翻譯的已經送上衣服來了。翻譯的走後還沒十分鐘，果然外面傾盆大雨來了，風雨打得窗子搖動着。我又爲培志的安全祈禱。

大概是怕監房裡有傳染病吧？一天上午，我們都被叫出去注射防疫針。在路上遇到跟蔡先生同行的那位海關張先生。在沙灘憲兵部時他同我住了一天，我以爲他已安

然回家了，想不到也在監獄裡。洗澡時，我問他，才知道他離開沙灘就被押到天津憲兵部去，然後又轉來監獄，想不到跟英美人發生一點關係的，都會遭到這步苦難。在路上還看見一個高高大大的西洋人，像是白俄的模樣。再過幾天，又遠遠地聽見日本士官和幾個英美人說話，才知道最近還有西洋人進來的。仁之還告訴我他在門縫裡看見送飯的手裡捧着一盤面包，怪香的。真想不到西洋人在日本獄中還可以享受到西方的物質文明出產品，到底是強國的國民，日本人絕不敢輕慢的。

自從仁之搬來同住，時間都覺得很快。在這一星期當中，除了無系統地聊天外，我還請他講北平地理之史的發展。他在燕京時，曾公開的講過一次，又在北平美國婦女會講過一次，在憲兵部時，又給他的同屋講一次，所以他這次講來毫不費力氣。他靠牆坐着講，我躺在褥子上聽。始則還像聽講歷史故事，繼則真像跟他神遊北平城了。從元明直到現在，我們不知不覺地倒做了三朝的遺老和民國的公民。他從前寫的文章和收藏的地圖，這大都被日憲沒收了，真是可惜！

仁之很注意北平的水利，特別是北中南三海。我聽完了他的講演，便對他道：

「我們出去之後，我預備兩個臘腸的窩頭在北海與中海之間的橋上請你吃。我們要看看橋上來往的行人。你看北平是多麼偉大的啊！就是百萬大軍進了城，也會被吞沒的。三海適在城之中央，所以任何階層的人都可以欣賞裡面的美景。」仁之在監獄裡已好好地完成他的北平史地一文了，這一個多月，他可沒有白過。

爲着酬謝他有價值的講演，我將都市社會學的普通理論略爲說了一點。於是我們兩人又幻想着將來怎樣研究北平都市社區。我們常常討論到深夜，有時太興奮了，弄到睡不着。

一個上午，我們正在談得高興，忽然聽見翻譯的叫五〇六號，才知道洪先生過堂去了，於是我們又替洪先生作祈禱。但晚飯後，還沒聽見洪先生回來的消息，想是我們談得太專心了，所以沒有注意到洪先生及士官開門的聲音。洪先生過堂那日隔着趙先生過堂整整四個星期了，仁之搬進來也有兩個星期了。

接着北平都市研究的討論後，我又請仁之講黃河的故事。他借黃河史地的演變，來表現大漢民族二千餘年與自然鬥爭的活動，而勝利與失敗，常常歸結到民族內部團結與否而定。這又給予我許多人口社會學的材料，于是我又講人口社會學以及人文區位學作酬謝。我們越說越興奮，此時真有點怕在我們尚未講完預定的題目之前，士官就來放我們回家了。

屋內的第三者，早被我們忘掉了，幸虧他等仁之講完黃河故事後，稱讚道：

「侯先生，你還那麼年青，對於中國歷史就那麼爛熟，真是難得呀！」

這才提醒我們還有他的存在。

我記得仁之的太太是研究漕運的，于是又請仁之替他太太講漕運的故事，于是他好像又帶我去見了好幾位聞整運河的大工程師。

在仁之講運河的故事時，我常常夾雜着講些社會學的題目，如：文化論，社會階級論，社會組織論，米德所著的「心思，自我與社會(Mind, Self and Society)」等，爲着

使他有機會休息，那知道他還牢記着我所提到的作家與作品的名目。

一個晚上，仁之睡到半夜醒了。門外站的一個士官問道：

「睡不着？」

「想家！」

于是士官告訴他日本又佔據了什麼地方，很得意地走了，我却被他吵醒了，仁之遂對我說道：

「談得太興奮了，睡着時，還夢着背書。」

我猜他是在想家，又在用功哩。

一個星期六早晨，隔着洪先生過室那日只有四天的光景，我正在跟仁之聊天，不提防士官把門開了，翻譯的叫五百十一號。仁之站起來，定定神，就出去了。我見他套着手錶在門外站着等候命令，他必然是到法庭過堂去。外邊汽車鳴笛時正是我們吃飯的時候，我對第三者說道：

「怪可惜的，就差半個鐘頭，吃完饭出去過堂，豈不省得挨餓？」

當仁之站在門外時，我已替他祈禱過，飯後又替他禱

告，心裡才稍覺平靜。

我正在跟第三者聊天時，晚飯又送進來了，忽然聞外邊汽車鳴笛聲，我猜必是仁之從法庭回來了。果然，我們飯還沒有吃完，士官已把門開了，送仁之進來。

今天上午送進來的是兩個饅頭，又白，又結實，到監獄來，這邊是破題兒第一遭，我把仁之那份全留着。晚飯送進來的也是兩個大饅頭，跟早晨的一樣結實。因為許久沒有見過白饅頭了，所以看着它當作無上的珍品，捨不得立刻吃掉，兀自在細嚼緩咽，欣賞香味。

原來仁之在法庭候審室裡也吃過饅頭了，還受特別的優待，得吃日本犯人吃的豬肉。監獄內每天下午都聽到殺豬聲，我們總不免要垂涎三尺的，想不到仁之今天竟有這大的口福，吃上肉了！

仁之一回來，我就告訴他還替他留着上午的吃食，但他只覺得喉乾舌硬，單把上下午的湯和水喝了，却不願意多吃饅頭了。這倒是我和那位第三者有口福了，便把仁之上午的饅頭分了，吃了一個大飽，好不快樂！

仁之過完堂了，我們計算着，現在尙未過堂的只有陳先

生，豁軒和我三人了。我對仁之說：

「日本法官也該把燕京的案子結束了，他們無論怎樣的耽誤時間，也得要維持最低的效率呀，希望我們還能見着幾天春的风景吧！」

仁之本來很發愁他自己案子的，他怕他的案子最嚴重，惟恐一時不能釋放他。現在過完堂了，他覺得供詞比在憲兵部的好一點，所以他說：

「按照燕京的舊分數制來評判，憲兵部的供詞應得P（僅及格），法庭的供詞，可以得M（可畢業），即使要懲罰的話，也不會太嚴重的了。」

我聽了很替他高興。我覺得我們大家的案子都是爲着學校，祇因責任不同而有分別罷了，所以我仍相信着一定會一齊釋放的。

仁之過完堂了，我們釋放的希望更增加了。到五月十日，我們在監獄整整三個月了，連憲兵部的拘留期間算起來就有五個月了。用五個月的工夫來檢舉燕京大學四年半抗日的工作也該夠了。若是再延遲下去，未免太有點不講效率了。有了這五個月的拘留作刑罰，日本軍人也該滿意

了吧？到他們心裡的恨消失了，自然就會釋放了，反正拘留我們，對於日本的『東亞新秩序』沒有什麼好處的，我跟仁之都這麼想。

講到恨字，在拘留期間，我倒沒有恨過日本人。假如單是站在弱肉強食的原則來看，日本人這種作風是沒有什麼可指責的；祇得怪自己的國家不強就是了。但是從人類大團結來看，這種以鬥爭及侵略別國的土地來解決自國的問題，也未免太沒有意義了。人類爲什麼不團結起來利用大自然所賦予人類的資源呢？其實就是站在日本國民的利益來看，日本這次作風，也是缺乏理智的。試問打了五年仗，日本國民所得的是什麼呢？日本這次的侵略，結恐了四萬五千萬人民，將來怎樣解怨呢？假如戰後中國亦依照這個『恨』的原則來對日本人，那麼人類互相殘殺，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止息呢？但願我國人仍本一往寬大爲懷的精神，來對待戰後的日本，因爲日本問題實在跟中國問題息息相關的，我們於戰後欲解決本國的問題就不能不思及解決日本問題的方案，必需兩國的問題有了解決的方策才談得到安定東亞的政局。但願戰後，人類的關係建築在友

愛的原則上，能彼此互求了解，才能得到真正的合作的。我想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公義人道與和平的。我跟仁之此時又有點想入非非，大有解決人類將來問題之概。

四月廿一日上午，忽然聽見翻譯的叫五百一十號，隨即聽見隔壁屋子敲牆聲，不久，那邊的門也開了，即見陳先生身着藍布大褂，兩手套着鐵鐐，身上拴着麻繩，站在我們的小窗外。陳先生走了，陸先生又敲牆，想是告訴我們陳先生過堂去了，我們又敲牆把消息轉告張趙二位先生。陳先生直至下午我們吃晚飯時才回來。

陳先生既已過堂，現在剩下的只有豁軒和我二人了，慢則一個月，快則一個星期，就可以結束燕京的案子而放人了，我們想到這里真是高興呀！

仁之和我已講論了不少的題目，陳先生過堂這一天正是仁之開始講平綏鐵路的史地。平綏路一帶地方仁之全到過，關於平綏路的史地書籍，仁之也念過不少了。我記得清華大學張印堂先生曾用英文寫過一本關於這方面的書，就請仁之評論一下。他把張先生的著作，先講述一番，而後再加以批評，我覺得他說的很洽當。

(七) 大病不死

現在已是春天來臨了，睡覺時，不但減少了一條毯子，今晚又減少了衣服。本來天天穿着皮馬褂睡的，今晚也脫了，躺在棉褥上，才覺得舒服，沒有多大工夫就睡着了。

半夜忽然冷醒了，打了幾個寒噤。我以為是穿得太少了，趕緊加上毛毯，但依然是冷，而且像從裡面冷出來了，於是又穿上皮馬褂。這時仁之也被吵醒了，他又替我蓋上我的皮袍和他的皮袍，身上才覺得暖和一點。

後半夜都在夢中度過，早上勉強起來，鋪好毯子，再躺下去。白衣的醫生從門外經過，仁之即替我要了兩粒阿士片林吃了，不久，藥即生效，頭不痛了，可是煩悶異常，遂請仁之繼續講平緩路史地。一會，滿身出了大汗，只得起來換衣服，衣服還沒有換好，身上又發抖了。仁之替我蓋上毯子皮袍，仍是壓不住寒氣，于是他又拿了他的棉褥子給我蓋上，才把我心裡的寒氣壓住。

廿三號早飯的時候，我又要了一粒藥片吃。我想一點傷風，算不得什麼，兩三天就好了。但是今天胃口已經不開

了，吃了沒有幾口飯，就得放下筷子了。飯後仍請仁之講平緩路，但終于支持不住了，頭痛得無法忍受。下午我又勉強起來，脫了衣服，略為檢查，果然在襪子裡捉到了三個蝨子，滿肚子的血，大概一定是蝨子咬的斑疹傷寒了。

仁之好像飽有經驗的看護似地照料着我，連大小便都要他扶着。我的頭實在太痛了，就請仁之用濕手絹放在頭上，痛才稍為減些。仁之又叫醫生來試溫度，好像聽見他說四十度，心裡有些恐慌，幸虧有仁之在旁邊，坦然許多。但是這種病會傳染的，又怕招上仁之，心裡又有點不安了。

病好像越來越嚴重了，二十四號，醫生給我打了一針，二十五號又打一針，此外又吃過四包藥，可是熱度還是有退下去。醫生給我一個冰枕袋，頭痛倒是略為減少了。飯是完全吃不下去了，二十五號送進來的白米稀飯，呷了兩口，就不能再開吃了。

那位第三者，見我的病沒有起色，他心裡也駭怕了。起初，我以為他同情我，原來他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恐怕招上，一病倒，就不能再起了，所以憂愁。仁之安慰

他道：

「人家病着，還很坦然，你無事，倒先愁了。」

老先生見說得對，才稍爲安靜了一點。這邊老先生正在發愁，而那邊蔡先生又在說話了，他對士官嚷道：

「○○號有病，我的身上已經沒有虱子了，可否許我搬到別處去？」

我沒有聽見看守人怎麼樣回答，但是現在才曉得和蔡先生同住的海關職員也病傷寒了，陸陳二位的同屋煤礦工頭，也是這病，真可怕呀，已經有這許多人得了這病了。

仁之跟老先生正在吃飯的時候，我見外面站着好幾個士官及穿白衣的醫生。我想這一定是蔡先生的話生效了，士官怕所有的犯人都傳染上這病，所以要隔離我們這般病人了。仁之看出我的心思了，所以說道：

「我想我不必搬，好看着你，幫幫忙。」

老先生聽見說搬家，倒高興起來了，但我心裡着實難過，爲着自己，實在不願仁之搬走，可是爲着仁之，倒是搬了好些。我的心裡正在衝突之際，房門已經開了，翻譯的跟着士官進來，叫他們兩位搬走。仁之出門時，我見他

很難過，但我此時倒不覺得什麼了。

房門關上了，我勉強起來，拿着笤帚掃地，然後又將棉褥子搬至近門處。現在屋裡只剩下我一人了，這是我有生以來，從未嚐過的痛苦與煩悶。我好像聽見蔡先生在隔壁屋裡跟士官說話，於是慢步走到北牆那邊去敲蔡先生的號數，但那邊的回答，不是蔡先生的號數。我又繼續着不知道敲了多少次，那邊每次都有回答，遠遠地好像還有人在同情我，心裡的煩悶才稍爲減些。歇了一會，我又慢步走到南牆那邊去敲，敲了數十下，都沒反應。我想陸陳兩位也許都搬走了吧？我很希望仁之能跟他們同屋。我記得仁之說過，在學校時，沒有機會跟他們多說話。我勸他以後得找機會，認識這兩個不同的性格。假如他們真能同屋住，這豈不又是天意嗎？我的病能成全這件事，我于是從悲苦中轉到快樂去了。

日本犯人吃過中飯不久，兩個常見的醫生領着一個高級的醫生來了。我脫下衣服，讓他細細地檢查，他告訴我：

「身上全是紫紅色的斑點，這是 Meas. Fever，你懂得

嗎？不要緊的。」

他既然查得病源，對症下藥，想不致有誤，我倒放心了。

其實我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我覺得一個人的所有，全是從那至高無上的主宰那裏來的，生命既然從他那裏來，早晚總得回到他那裏去。他給我一天生命，我就替他作一天工，到我工作完畢時，我就回到他那裏去了。但是我現在覺得我的工作尙未完畢，我在世的生命仍未歸結，我還不能回去的。那麼說，這場病，許是大能者給我的一個鍛鍊機會。我既因他而活着，我就得依他而掙扎生存，我要繼續活下去啊！

大概醫生覺得我的病蔓延性很大，下級士官帶着消毒藥水在我房門外打了好幾次。醫生又在房門外貼了白紙條。送飯的連手都不敢伸進來，還是押飯的士官帶着手套送進來的。

醫生自己一天來四五次，早晚試體溫和脈膊。每兩天注射一次，還吃兩三包藥。溫度高時，還要一天注射一次。我自己整個星期都在夢中渡過，飯自然是不能吃了，就連

稀飯也不能下嚥。喉嚨乾得很，每日倒有的兩杯開水是不夠用的。在日本犯人吃飯時間，我總是向押送飯菜的多要開水。有時送進一大碗來，有時簡直不理，因此，我還得向醫生求情，多要開水。但是有一天我喝了七大碗水，那日碰巧溫度增高，醫生都怪我多喝水所致，所以也不大願意多給水了。

一個人病着，熱度高至四十度四十一度，沒有人看顧，的確痛苦。稀飯稠得很，我是吃不下的，多次向翻譯的請代求爛而且稀的粥，均告無效。開水常要嚷到喉乾了才送來，而且要看押飯的士官跟送飯的日本工作犯人的脾氣而決定給與不給。我雖然靠門那邊躺着，但總得坐起來才能拿得開水進來的，有幾次，手一軟，不但洒到滿地都是，而且連水都沒得喝了。

在病期中，大小便的問題最大，因為沒有吃飯，大便兩天一次，還可對付。但是每天喝上四五碗水，小便的次數特別多。二十四小時內，要起來七八次。頭三兩天還可勉強，後來簡直沒有氣力支持了。我看見房門那裡有一個大碗，送飯的士官怕傳染，沒有收去，我也顧不得公衆衛生

了，就拿來當便桶用，連廢水的罐子也用了。這樣我每天還得從門那邊爬到便坑那邊去兩次。每回爬到中途，就得休息幾分鐘，到了便坑，又得歇幾分鐘，風刮得滿地塵土，也顧不得許多了。

肉體的痛苦雖大，但精神上的煩悶更難堪。我這時感覺到社會服務工作的重要了。在最痛苦煩悶的時候，有人在旁邊慰問一下，那是多麼快樂的事呀！在夢中我常對自己說道：

「承信，這屋裡只你一個人，而你的工作尚未完畢，你得掙扎下去，從痛苦中尋求快樂，願你得到上主的恩佑，精神愉快，肉體康健啊！」

我的思想，無系統地從社會服務轉至宗教生活，想到這幾年背離了宗教的罪惡，現在真像「浪子回頭」一樣了。耶穌對尼哥底母所講的「重生」，我現在好像體驗着了。

在一個半夜裡，我忽然醒了，朦朧中看着燈光出神，我不知自己是誰。看見向外開的那個窗戶也莫名其妙。在迷失了路途似的好久，才想起我是一個人，但不知為什麼我會單人住在這間小屋裡，失去了一切的自由，我對自己說

道：

「天為什麼生我出來，要這樣折磨我呢！」

慢慢地我才回復到原有的意識，知道我有父母妻女，還有朋友。我現時身在日本監獄，是因為日美戰爭而進來的，一共進來的，還有十位，從北屋的東蓀先生，一直想到南屋盡頭的露軒。啊！我現在才知道我是病着。想是熱度太高了，弄到有點失了意識，想到這，心裡更痛苦了。又有一個夜裡，我好像聽見有人叫我，靜聽，像是博長光先生的呼喚聲。果然，他來了，對我說道：

「承信，中日美已經停戰了，我們用大汽車把他們接回燕京去了，我特來接你到協和醫院去調養。」

我謝謝他的美意，轉身已然在協和了。不一會，司徒先生也來了，安慰我幾句，我對他說道：

「我到沒有什麼，只是苦了您老人家了！」

到早晨，醫生送進溫度表來，我才發生疑問，問自己道：

「這是協和醫院抑是日本監獄？」我很費力的思索，然後斷定道：「這必是日本監獄，協和醫院那會這麼不舒服

呢？」

直至那天下午，我才清楚地斷定我仍在日本監獄，外面，人類仍在繼續着互相殘殺。

昏迷了兩個星期，熱度才漸漸地降下去，因為所有的內衣內褲全溼了，倒盼着培志能送衣服來換。一天上午，果然盼着了。我怕培志聞着衣服上的臊尿味，會想到我已病重得不堪，而憂慮了，所以對翻譯的說道：

「如果家裡送衣服的人問我近況時，你就告訴她已經病好了。」

我覺得好像大難已經過去了，心裡倒平靜了許多，因為轉着，所以不感到身體軟弱，但是說話的聲音，連自己都覺得有點可怕了，聲音不響亮，低沉得很。十來天連稀飯都沒有吃了，怎麼會有氣力呢？

在病中，我很感覺到日本看守士官的脾氣不同。有兩個實在不錯。每天早晚經過我房間時，總要站住看我一會，笑一笑，然後問道：

「好一點？」

見我點點頭，接着又說道：

「休息休息就好。」

我過去覺得日本兵可怕，現在倒覺得他們很可愛了，他們的一笑，竟給我很大的安慰。我想：假如中日兩國人民能常相往來，彼此自能互相了解，和平的基礎就會堅定。但實際上，中日兩國，已互相殘殺了多年，能不令人痛心？

記不清是那一天了，也許是五月十一日吧？那天上午，翻譯的在我房門外，狠狠地說道：

「站起來！」

「可以試試，但怕不行。」

我勉強扶着地板坐起來，他看了，又問道：

「能站起來嗎？」

「連坐着都不易，站着想怕更不行了。」

他對着看守的士官笑一笑，就走了。原來他是到崙軒那邊去的。我聽見他叫五〇五號，同時門也開了，才知道是叫過堂的。假如他早告訴我，我想也可以勉強出去的，現在真是因我的一病，而耽誤了大家釋放的日期了，心裡很是難受，因此，決定見翻譯的或看守人時，必然對他們

說：

『我要出去過堂。』

我正在希望出去過堂時，果然來了一位士官，送進衣服來，他笑一笑說道：

『趙承信，你家裡送衣服來了，你可有得穿了。』

我細看，原來正是我想要的駝毛袍子，此外還有一條新棉褲，我想有新衣服穿，就可以出去過堂了。但是錯過了機會，士官沒有給我機會說話，就走開了。

我坐得太累了，正想躺下去，翻譯的又來了，問我換了衣服沒有，我答道：

『已經換過了，還想出去過堂。』

果見他用鑰匙開門，領着我出去了，快到門口時，我又見着豁軒，彼此笑一笑，就走到剛進來時換衣服那個地方。我忽然抬頭看見培志，還領着宗羣宗平宗慈三個孩子，又看見陸太太陳太太她們，我先走到陸陳二位太太面前，對她們說道：

『陸先生陳先生都很好，他們住在我隔壁，府上都好？』見她們都點點頭，我就走到培志那邊去。原來培志手上

還提着一個筐子，像到什麼地方野餐去的。我指着筐子問道：

『這是什麼？』

『今天是娘的生日，這裡面有生日蛋糕，還有麵包，蘋果，預備到北海去。』

不要去了，讓我把吃食帶進去，分給他們吃吧，我們餓慌了！

得了士官的應許，我就提着筐子，很高興地回到監房去，逐一送給他們吃了。然後再回來齊集的地方，又跟豁軒吃了一個大飽，才上汽車到法庭那邊去。法官看見我身體軟弱得很，沒有問什麼，就叫我蓋上手印，算是結束了燕京的案子，回到監房，趕緊躺下睡覺。

一覺醒來，已是下午送飯的時候了，外面盤碗聲正響着。我睜開眼看見身上的衣服仍是舊的，新送進來的依然放在靠門那邊，像早上送進來時放下沒有動過一樣。我于是對於上午過堂的事情疑惑起來了，那難道又是一個夢不成！但是明明地還記着過堂時的情景，用手往嘴上摸摸，好像還留着蛋糕的香味。再看看屋的四周，發現門邊還放

着一大碗粥，想是上午送進來的，還沒有吃。

一時送飯的來了，才打斷我的思路。我對送飯來的士官說過：

「我已經病好了，不用吃粥了，改吃乾飯吧！」

他沒有疑問地就答應了，我接過飯來，只吃一口，就不能再吃了。菜湯倒喝個精光。我又朦朧地入睡了，整夜仍在夢中思索吃蛋糕及過堂的事。第二天早晨起來，還是繼續想着這個問題，最後決定星期三出去洗澡時間豁軒吧。好容易挨到星期三，看見外面士官走過，我叫住他說道：

「一會，我要出去洗澡。」

「洗浴慢慢的。」

第二個士官過來時，我又跟他說要去洗澡，他答道：

「你病，洗浴不行。」

隔壁東孫先生已經出來了，好像在那裡笑我不能出去洗澡。

下午我睡醒了，精神漸漸恢復過來，想越越覺得我前些日子完全是在做夢。

現在已然是春天了，白天太陽晒進來，很暖和，我脫下

皮馬褂來。但是一到晚上，天氣却又變得冷了。我實在沒有氣力起來穿衣服了，而仁之留下的那張棉褥子，已是滿積塵土，那能再蓋呢？于是我又像在夢中洗冷水澡一樣，終于冷醒了，遂對自己說道：

「承信，這不是在家裡，冷時你自己得起來找衣服穿。努力啊！你還得繼續掙扎你的生命啊！」

現在醫生已經不來試體溫了，每天只照例送進哈利巴來，並問我的身體可好一點沒有，他倒是很好心的。有一次，我對他說道：

「我的病已痊癒了，想不致再傳染人了。一個人住一間屋，一來太悶，二來沒有人幫忙掃地，屋子太髒，有了蒼蠅，很不衛生，怕再招上別的病，那就不得了的。請你跟士官說說，讓我搬到別的屋子去，跟他們同住。」

他點點頭，笑一笑，就走開了。直等到晚上。睡覺口號叫過了，我才知道沒有希望了，還是獨自掙扎下去吧！

前些日子，刮着滿屋子是土。現在稍能站立了，我就用沾濕了的布擦地板。只是身體依然很軟弱，東倒西歪，爬

了好些時候，才把地板擦乾淨了。仁之留下的棉褥子也抖乾淨了，冷是可以拿來當被蓋，暖時拿來作墊子用。但是想到仁之這些日子沒有棉褥子用，要睡硬的地板，很是過意不去。

又是一個上午，聽見嘉道問看守士官道：

「五〇四和五〇八的病，好了沒有？」

我真是病糊塗了，難道陸先生也病倒了？想到燕京人的身體，真是沒有幾個健康的，法官非要我們一個一個都弄倒了才甘心嗎？但是想到隔壁的東蓀先生連原有的胃病都消失了，倒給我不少的安慰。

因為沒有什麼滋補的，所以康健一時是不易恢復的，而且送進來的小米飯，常是半生半熟的，沒法下咽，照舊退回去，所以身體一點也不能健旺起來，幸虧精神倒還好。躺在地板上，不時尋味着過去這幾個月的生活，覺得很有意思的。有時又想到釋放後的工作，有時又計劃着回老家作買賣去，想到高興處，常整夜不得安寢。

又有一個下午，翻譯的跟一個士官走到我房門前，把小窗門開了，問我道：

「你能看書嗎？」

見我點一點頭，士官就把一本書交給我，還在他的簿子上打了一個手印，表示已收到書了。他們走了，我看書皮，原來是張著的日語讀本，這是我幾年前買的，大概是培志送進來的。書皮上還印着「許可」兩個字，並且還有我的號數。

日本字母在沙灘時，得一位日本拘留人指教，早已背得爛熟了。現在拿書來讀，對於平假名，片假名，倒不覺難了。只是躺在那里，自以為身體很不錯了，及至一看書，才知道自己還是不行，一看書就頭痛，所以每天只能讀一課。看守士官見我在看書，於是睜眼望着，直到看見許可兩字，才沒有話說了。醫生有時在門外經過，見我讀日文，表示很高興，還要用日語和我談話，可惜我那里學得那麼快呢？不過有了這本書，時間就過得快多了。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計算着是五月十六號吧？一個士官叫着文如先生的號數，又叫裕軒的號數。他們出去約一個鐘頭，又聽見好像是文如先生跟士官說話的聲音。我想也許要放他們了吧？他們十位全過完堂了，也該出去了，

留下我一人受罪也夠了。于是我走到北邊去敲牆，那邊立刻有回答，好像他們並沒有釋放。我又想難道又要重過堂了？真不知法官在演什麼把戲了！

現在天氣已然很暖和了，培志早把夾衣及單衣送進來了，翻譯的對我說道：

「你家裡送衣服來的人跟你要皮袍皮馬褂。」

我見皮袍已經破爛不堪，就交給他了，但是皮馬褂還是需要，晚上睡覺時我還得穿上，大概是身體太弱了的原故。但不知他怎樣向培志解說，誠恐說得不委婉，又得叫培志傷心了。

我有一個多月沒有洗澡了，身上癢得很。同時，病後身上全脫皮了，髒得很，也是需要洗澡的。星期三洗澡時間又到了，我要求出去，但碰了釘子，士官總說我還沒恢復，不能出去。一回想到蔡先生剛病好時，不願洗澡，被士官拉出去洗，凍得那份可憐相，我也不敢堅持着要洗澡了。

天氣漸漸地入于夏季了，太陽晒進來時，我穿上單衣就夠了。吃飯的時候，因為頭髮太長，有五個多月沒有理髮

了，滿頭都是汗，用手絹來擦，越擦汗越多。記得他們幾位在我病時，頭髮全剃去了，所以也想請求理髮。第一個士官答應我了，說是替我推光，但是過了兩三天還是沒有給我理。我又問第二個，他倒很坦白地告訴我道：

「你有病，不能理髮。」

我想了一想，還是向翻譯的說話，請他代向長官請求吧。他也一口答應，但還是沒有人來理，所以每逢到吃飯的時候，總有一陣難受的。

一天下午，忽然房門開了，嚇我一跳，三個士官站在門外，原來是送進一位新人來，我見他的樣子像是剛病好的，我就問他是誰，原來他是我那舊同屋的伙伴，煤礦工頭，曾先後跟蔡先生，陸先生，陳先生同過屋，比我略早四五天病的，我計算着要他作同屋，兩不方便，他見我病人模樣，也很焦急，但沒有法子，只得進來。我見情形還可挽救，遂向三個士官嚷道：

「他的是傳染病，我的也是傳染的，兩個人再病倒一次，可就活的進來，死的出去了。」

他們三人相視點點頭，就把這位工頭又請了出去。

再過兩三天，又是一個下午，我聽見士官叫着兩位煤礦

開。」

王頭的號數，以後就不見他們回來了，想是釋放了吧？我的舊同屋一定要念一聲阿彌陀佛了。記得他跟我同屋時，

我見他手上拿着一大把鑰匙，想是催我去過堂的，于是我又說道：

天天都怕不能出去，要死在監獄裡，又怕要在獄中替日本人作工，我常常告訴他道：

「要我出去，現在就行，不必吃飯了。」

「沒有問題的。法官既然告訴你說無罪，早晚會出去的。你們人多，過堂許慢一點，我們人少，也許會比你們先出去。」

他遂把門開了，我扶着牆起來，因為屋內的地板比屋外行人道高有一尺，我正邁步出去，不料久未行走，有點站不穩了，差不多滾下去，幸而那個士官手快，把我扶住，不然，一定會跌一跤的。

現在真想不到他們倒比我們先走了，我真嫉妬他們，却又替他們高興。

(八) 上帝之愛

五月廿五日上午，早飯已經送來了，手裡拿着一碗稀而

一個士官在前，一個在後，另一個攙着我，很費力的慢慢走到外面集合的院子去。那裡有三個犯人，早已手套鐵鏡，腰拴麻繩等候了。待我出來，也照樣套上手鏡，繫上

「吃飯快快的。」

麻繩，士官就命令報數，一、二、三、四、報完了，士官

「好。」

又押着我們往前走。黑大門敞開，一輛大汽車已在外面候

但是那裡吃得下去呢？我把碗菜湯喝下去了，又把碗水

着。

「飯吃不下去了，不吃也沒有關係的，反正胃口也不

汽車可以容下二十餘人的，車座已經破舊得很，除了我們四個犯人外，就是兩個押送我們的士官和一個開車的。

得着命令，車就離開我們初進來時那個通馬路的大門。車忽而往南，忽而往西，開得很快，我雙手扶着膝蓋，起初還可勉強支持，後來開到大馬路時，車走得更快了，我支持不住，就往前伏去，幸而士官扶得快，所以沒有捧着。士官這時才知道我的身體很弱，他就坐在我旁邊照顧着。我在車上默禱。我祈求全能的父給我大能力，渡過這個難關。默禱完，心靈上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的精神支持住我肉體的軟弱了。

汽車開進軍事法庭的大院子裡，士官就押送我們四個犯人到初進來時那個候審室，我靠牆坐着，三個日本犯人坐在面前，看守士官坐在靠門的椅子上。

我低着頭在禱告，剛禱告完，外面走進來一位穿軍服的，約五十歲年紀，臉上帶着一付很厚的近視眼鏡。他手上拿着一個小冊子和一枝鉛筆，慢步走近前來問我道：

「你是趙承信先生？」

「是。」

「你病好了，我們很高興。起初我們很怕你有性命的危險。你過一會就要過堂了，但不用害怕。」

「很感謝你們的大夫和士官，常來照顧我，使我在病中不感到很大的痛苦。又蒙你問候，實在感激，過堂時還請多幫忙！」

「洪煨遠先生，鄧之誠先生，劉豁軒先生他們出去已經有十來天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沒有聽說過。」

「你三兩天也就出去了，反正你沒有鼓勵學生南下，是不是？」

「沒有。我是單管教書的，其他事情用不着我管的。」

「一會過堂時，你也這樣答就成。」

我點頭稱謝。他說完，就出去了。不久，一個士官就來押着我到初來時過堂的那間屋子。法官書記官還沒有來，那位老先生却已在那裏坐着。士官叫我坐下，我就拉一把靠近老先生的椅子坐下，士官在靠門那邊站着。

老先生打開了手上那個冊子，問我的履歷。我以為不是正式過堂，也就隨便應付，但我見他好像還把我的話和冊子對照，又不時地作簡短的記錄。隨後他又告訴我道：

「你出去以後，在教育總署一登記，就會有事件，生活

費絕不會成問題的。」

我點頭表示感謝，但說道：

「我的身體太弱了，大概需要長期的修養。我又計劃着回香港去，家父在那裏有點小買賣，很需要我幫忙的。況且雙親都已年老，我也應當盡些人子之道。」

他只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這時又進來一個軍官，坐在老先生的右邊，正對着我，他沒有跟我說話，我也沒有站起來給他鞠躬。他一坐下，就向老先生詢問一切，老先生對他說了一大遍。有時老先生又向我問話，像是要補充什麼。我的身體已經有點支持不住了，但又不便說出來，只昏昏迷迷地坐着，似睡非睡。

最後進來一個書記官，這才把我驚醒了，我正要扶着椅子站起來，聽見站在旁邊的士官說道：

「不用。」

于是我又坐下去了，但還不知道這已在過堂呢。

書記官坐在軍官的右邊。他剛坐下，軍官就向他說話，他只是手不停揮地在那裏寫。寫了差不多有一頁了，軍官

才向我問道：

「憲兵部的供詞，你全部承認？」

我現在才曉得他就是法官，于是定了定神，對自己說道：

「這倒要仔細些，不可隨便說話了。」
想罷，遂即答道：

「我已經病糊塗了，憲兵部的供詞怎樣寫法，我也記不清楚了，最好請你再念一次。」

他好像沒有理會我的話，只問我道：

「你沒有勸學生南下嗎？」

「沒有。」

「社會學系有沒有學生南下？」

「有的。」

「你對於中日戰爭有什麼感想？」

「提到中日戰爭，我又要傷心了，我很不願意再說這件事了。」

說至此，喉間像有東西塞着，我的眼淚不由己的滴了下來。

不知他是否也有些感動了，他只說：

「我們就不問這個吧，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沒有了。」

一切似乎都已完畢，士官走到我的椅子邊，我于是也站了起來，正想走了，忽然聽見法官道：

「請再坐下，還有一句話：現在我要宣判你的案子。你

幫助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抗日，罪該殺頭的（說時，他還用手抹着脖子示意。）但是姑念你這幾個月來，思想改變了，所以本法官特根據軍法第〇〇條，特赦你無罪。你出去後，好好地保養身子，以後如有抗日行動，必然嚴重處罰！」

我聽完了判詞，扶着椅子，站起來，依照士官的命令鞠了躬，出了門。在路上，士官笑容滿面，向我道喜，我一笑報之。

回到候審室來，我又作一次禱告。雖然日本軍人說的話，不一定可靠，但到底已被判決了，就希望是真確的吧，而且那個老先生實在不錯，說的話也不像要騙人的。但是，我的思想又有點紊亂了。我不了解為什麼要分辯

放人？雖然責任有輕重，不過都為學校的事情，應由團體負責，日本軍部的心地未免太狹小了。我心裡一時高興，一時難受。我計劃着怎樣回到屋裡去給他們通消息，却又渴望着今天能回家，不但可以寬慰家人親戚朋友，並可調養身體，況且在監房裡再住一兩天，也許又會起什麼變化的。

中午的時候，三個日本犯人吃飯，我也很餓了，但是因為上午那頓飯已經在監獄那邊用過，所以士官沒有給我帶來。回想到仁之告訴我他過堂時吃的那頓飯，我真有點羨慕呀！見到士官吃過飯後，還有餅乾花生和糖等吃食，我更加口饑了。只得壯着胆向士官要水喝。他們的回答是「慢慢的。」直到他們吃完了好一會，一個勤務員才送進茶來，士官喝過，輪到日本犯人，最後才輪到我，但我有一杯水喝，總算聊勝于無了。

下午兩點了，日本犯人才去過堂。我身上的骨頭全都酸痛了，問士官能否讓我躺下，結果，碰了一個釘子。

太陽漸漸地離開屋子了，我來時穿得少一點，況且又沒有吃飯，身上有點寒冷，因此又餓又冷，真是痛苦極了，

幸而精神尚佳，於是安慰自己道：

『忍着吧，一會回到家裡就好了。』

我正在低頭沈思，一個勤務員拿着一封信進來，交給士官。臨走時，他看我一眼，笑一笑。我想莫非就是我的判決書？預備交與獄長的？想到這裏，我覺得下午回家的希望更大了，心裡非常高興。

士官等得膩煩了，一個老出去看第二個日本犯人過完堂沒有。下午四點了，第二個才回來，士官們站起來要走，而第三個又被叫出去了，大家只得又坐下。幸虧第三個出去沒有多大工夫，就回來了。

兩個士官一前一後，押着我們走到院門外，我們正要上汽車，士官見遠遠的來了一輛汽車，趕緊拉着我們往裡面走，到靠牆的一邊面牆站着，不許外看。汽車開過去了，士官才帶我們上汽車。

坐在汽車上，忽然想到汽車裡與外界的過往人，不過隔着一層很薄的鐵板，但是居然就分成兩個極端不同的世界，而且一分鐘內，就可以從一個世界的人轉至另一個世界，想至此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汽車開至監獄門前，就鳴笛了，裡面守衛的將黑大門開了，汽車直馳進去。兩個士官，四個犯人跳下車來，直進屋裡。進門時，我看見那集會的地方，正開着會，並且有一個軍官在那裡演講。士官命令我們四個犯人面牆站立，那三個犯人脫下皮鞭子，換上布拖鞋，就由士官押走了。

翻譯的出來，我正想向他點頭，但他裝着看不見的樣子。一個軍官走來和他說話，他才領我到我們初來時放東西的那間屋子裡。原來那屋裡還有一個高台，用板擋着。軍官走上台去，我在木板外站着，翻譯的站在我旁邊。

軍官把信封拆開，拿出一張信紙來，想是法庭那邊送來的判決書。果然他就宣讀了，我聽到『現在釋放你』幾個字時，不覺滴下淚來。

軍官走下台來，對我說道：

『你不用回到屋裡去了，你行動不方便，東西一會有人給你拿出來，你就在此地等着吧。』

說完話，他就離開屋子了。

沒有多大工夫，一個士官把我的衣服和毛毯都送了出來，初進來時交存的東西，也交還我，又叫我點清楚後，

蓋上一個手印，就完結了他們保管物件的責任。

我把鞋穿上，把零散的東西包好，正想要走了，翻譯的忽然和氣起來了，他說道：

「你拿不動的，讓我替你拿到外邊去吧。」

我實在連站都站不穩了，也就不和他客氣了，於是請他幫忙拿着兩大包東西。

來到黑大門前，他對守衛兵說了幾句話，兵士即把門開了，讓我出去。但這時街上沒有洋車，翻譯的還對我說道：

「你在這裡候一候，我給你雇車去。」

說完他就出門去了。衛兵見我靠門站着，不大方便，就讓我進旁邊的小屋子裡。

這間屋裡，擺着一張長方桌，八張椅子。我把東西放下，就提了一把椅子，靠桌子坐下。一會，翻譯的回來，說道：

「洋車已叫去，一會就來。」

我稱謝道：

「洋車來時，我自己能上車的，請你不要客氣了，你忙

自己的公事去吧。」

「已經下班了，我沒有什麼事了。」

果見一般士官往外走，也像下班的樣子，我見翻譯的很愛說話的神氣，遂問他道：

「他們都不住在裡面嗎？」

「有幾位不在，現在下班了，他們也想出去玩玩。」

「你住在這裡嗎？」

「不，我住在公寓裡。」

「和家裡人同住嗎？」

「家裡只有老母和小弟弟，都住大連，北京只有我一人。」

「這裡能住五六百人吧，日本犯人多，抑是中國犯人多？」

「日本犯人較多。」

「日本人犯什麼罪進來的多？」

「大多數是喝醉酒打架，或在上官面前，行動失檢。」

但是我想必然還有逃兵，他不願說這個就是了。談了有一會了，洋車還是沒有來，我怕就誤他的事，又

請他先走。剛好有一位中國廚役從裡面出來，他又叫廚役去叫。我們的談話又繼續了。這一次是他先開口的，他說道：

「當你們燕京人初進來時，我很替你們發愁，想不到這樣粗的糧食，你們也受得了。初時，我很替你們向長官說話，求他改善飯食。」

我聽着，趕緊稱謝。他又繼續說下去道：

「你太太有一次帶着小孩子來，長得很像你，要來見你，但是很對不住，長官是不許可的。」

略停一會，他又說道：

「你病時，我實在替你擔憂。後來你病好了，我向長官請求給你理髮，但是長官覺得你身體沒復原，所以沒有答應，很對不住你。」

我向他深致謝意，又問他道：

「在法庭那裏，翻譯官告訴我幾位燕京人已經釋放了。」

他點點頭，我又問道：

「其他的幾位怎樣？」

「比你們稍爲麻煩點。我常到法庭那邊去，跟那位翻譯的很熟。他是日本人，在北京長大，入中國學校念書。中文很好，法律知識也很豐富，他在法庭那邊，像是一位顧問似的。他對於你們案子很明白，也很幫忙的。」

我又向他作謝，並請代向那個老者致意，多多幫忙其他尚未釋放的幾位。

我又問他關於監獄組織的情況，不是他不知道多少，就是他不大願意講。這時，可巧看門的告訴我們洋車已經來了。翻譯的途告訴我家已經搬進城來了，又問我需不要錢，不，還要替我付，我辭謝道：

「既然家已搬進城來，洋車到家就可以付錢了，請你不必客氣。」

他送我上了洋車，才慢慢走開。我見他手裡拿着我案子的報告書，向隔壁院子走去（後來才知那是中國軍事犯的監獄。），相互道聲「再見」，洋車就離開可怕的黑大門了。

來到大馬路上，兩邊行人很多，却沒注意我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洗盡胸中積垢，重作新人一個！

洋車離開北新橋不遠的地方不久，車輪壞了。我換了一輛三輪車，三輪車夫替我付洋車夫四角錢。在大路上，三輪車走得很快，我有點坐不慣，頭有點昏暈，才發現原來自己沒有帶眼鏡，又不知道眼鏡現在那里，於是對車夫說道：

「請慢一點走吧？許久沒有坐車了，而且忘記帶眼鏡。你慢走，我可以多給你車錢的。」

車夫很客氣地說道：

「您上車的時候，我就知道您的身體欠佳。」

「是的，住了好幾個月醫院了。」

他倒有點相信，因為那里離道濟醫院不遠。

車到東四牌樓，就往西拐，我見馬路都換新了，倒有點不大認識了。想不到住了這幾月監獄，連北平的地理都有點模糊了。

過了八面槽，車往西走東安門大街。路上有一位中學生打扮的，騎着自行車，老看着我。他的車比我的快，所以他常回過頭來看我。忽然前面來了一輛汽車，差不多闖倒他了，這才把他嚇跑。其實我的樣子也真古怪，大暑的

天，還穿着棉鞋，頭髮長可蓋過額子。幸而我用大手絹遮着臉，不然那漫無條理的鬍子跟那髒臉，更會引起這位中學生的好奇心了。

車子經過中央公園前門，已經離家不遠了，我對自己說道：

「這次可真是放了的吧？就是日本兵趕上來，我也可以見着培志及孩子一面的。」

想至此，不覺又要滴下淚來。

過了西三座門，再經過石碑胡同，往南就到家了。敲三下門，一個看媽領着老三出來開門。離開家快半年了，老三自然不認得我了，如果在路上，我也不會認得是老三的，新來的看媽自然也不認得我的，連我的岳母也不認得我了，我叫了她一聲，她才如夢方醒一樣，趕緊轉叫培志，培志聞聲跑出來，後面跟着老二。我悲喜交集，身體幾乎不能再支了，兩腿軟了下去，幸而培志來得快，不然定會蹣跚一跛的。我扶着培志，心痛欲裂，大顆眼淚，不由地奪眶出來。哭了良久，我才扶着培志走到南屋。老大有點認生了，她站在書桌旁邊，瞪着眼睛看我。我無日不在那

里祈求一家團圓，現在已經達到目的了，宗教上所給予個人的希望，已變成現實，中心的快慰，無以名之！

洗臉的時候，對着鏡子，才知道我瘦得不成樣子，鬍子也長得可怕，怪不得老三見着我就哭。

到家時已是晚七時了，我耐不住等候晚飯了，先吃了三碗掛麵兩個雞子。八時，又吃了一頓飯。肚子已經漲得很了，但仍然口饑，到十點鐘又喝了一杯奶。

培志叫我早休息，洗過澡後，就上牀了。但是太興奮了，那裡睡得着？培志陪我說了一夜話，到早晨五時才合了一會眼，六時孩子們又醒了，我也跟着起來，望着孩子們也是有趣的，老大老二，現在也不認生了，環繞着我，跟我說長說短。在監獄時常想像着家庭生活的美滿，現在才實際地體驗着了。

上午十點多鐘，張東蓀太太，蔡一諤太太，趙紫宸太太都來了。原來她們三位早已約定今天來找培志商議怎樣打聽消息，好去營救我們的。見着她們三位，我的心裡好像針扎一樣難受。她們三位的眼淚不時地滴下來，老用手絹擦着。我原來預備好的一套安慰話，至此連說話的頭緒都

摸不着了。想不到感情充溢到頂點時，理智就完全失去效用的。

下午我請培志給仁之太太寫信，報告她仁之在裡面身體很好，燕京案子既已結束，想不久就會全部釋放的。

晚飯前，洪太太來電話說周學章先生已經從憲兵部出來了。在監獄時，我跟仁之常擔憂在憲兵部裡的燕京同人，他們只有四位，多孤單呀！但是想不到其他三位早已釋放，而周先生一直會留到今天才放，日本人作事，真是莫名其妙！

頭十天，每日總有朋友來探視。雖有吳大夫的告誡，不許多說話，但將有半年沒有說話，那裏禁得住呢？一說就是沒完沒了的，每次總得培志打斷話頭。

六月七日上午九時，我跟培志領着老大老二乘三輪車出西直門，到燕京去領辦公室裡個人自己的東西，這是日本人吩咐的，叫我們都在這一天去領自己的東西。

我這時身體仍未復原，行走很是費勁，但是爲着毀滅辦公室放的「通重慶」的函件等，不能不勉強走一踏。

到燕京校門，見日本憲兵在那里把守着，我心裡想看他

們能把守多久！校門內，橋西那邊，已站着不少的燕京人，都是來取自己東西的，大家見面，真有說不出來的感慨！遠遠地望見陸先生，也在人叢中，我趕緊過去招呼他。他的病已經好了，但仍然很是消瘦，走路的力量，和我差不多。我們有六個多星期沒有見面了，想不到陸先生倒先我們幾人就出來了，當時快慰的情狀，實非筆墨所能描繪的。我對於校園早已沒有什麼留戀的了，但是看見一遍荒涼，真是人去樓空，大有今昔之感了！

我的身體已漸漸復原了，但是心神仍然不安。白天說話，倒還容易渡過，一到晚上想起在獄中的六位來又覺得自身仍在監獄一樣。常常在夢中還念着與仁之同屋事，及至想到看守人把他撥開的那一刹那，我心裡痛苦起來，才把自己驚醒。

我計算着六月八號至十號這三天內，他們六位一定會出來的。燕京的案子到我過完堂，就該結束了的。六月八日正是同人們被扣留半年的期限，十日乃是轉送到監獄去的一天，所以我常用這話安慰還在難中的各位太太。到十二號，他們還沒有出來的消息，我也有點焦急了，難道到了

最後，還有變故嗎？在這期間，幾位被難的太太又聽到了不少的謠言，雖然我覺得全是毫無根據的，但無論如何，我的心裡也不能平安的。

六月十八日，下午五時，外面有人敲門。前幾天，培志一聽見敲門聲，就趕緊出去開門，以為陳先生出來了，陳太太來替他取居住証的，但是每次她總是失望回來的。這次他忙着別的事情，門是用人開的，而進來的正是陳太太。她非常高興地說道：

「全都出來了！」

啊，這可真是好消息呀！我心裡那塊大石頭頓時就放下了！

雖然經過不少的苦難，但是到底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出來了，這就是上帝的愛！

附一 社會學註釋

這一篇獄中雜記，原是一種記事的文章，但本人是研究社會學的，同時，進憲兵拘留所不久，即有社會學研究法嘗試的意思。獄中生活，本來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學的題

材，但這裡只欲將兩個較為有趣的問題，加以研討。第一，有關於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的問題，第二，為探討在一個特殊社會制度下個人所表現的行爲。

(甲) 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的問題。

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約略可以分爲兩部：第一，為概念的架構 (Conceptual Frame of reference) 的研究理論體系；第二，為研究的步驟及研究時搜集材料及分析材料的技術問題。本文所論以搜集技術材料方面爲主，次及材料分析方面，方法論其餘各方面則從略。

在社會研究法上，有所謂局內觀察一法 (Method of participant-observation)，原爲美國社會學家 Lindemann 所倡導 (見氏著·*Social Discovery*)。局內觀察法的應用，依照 Lindemann 原意，是局內者與觀察者兩人合作研究一個社會現象的，後來此法推演成爲局內者即觀察者，視察者即局內人，亦即二者合而爲一，一人兼作二人事。

普通局內人多無社會學研究的訓練，而社會學研究者又常缺乏實地參加各種欲加研究的活動的機會。結果，大多數社會活動在無記錄的狀態下湮沒消失，那有機會再去追

補呢？反之，社會研究很容易流爲空泛的玄學式的理論體系，所以局內觀察法，正欲補救這個雙重的缺點。

局內觀察法的實施，除了 Lindemann 所提倡的局內人與觀察者合作一法外，還有任何人類活動記述者，將社會學研究法當作一種必需的知識而去學習；或社會上各種團體，盡量供給社會學家多方面機會，觀察並體驗其群體各種社會的活動，同時，社會學家將自己有機會參加的社會活動，詳加記錄，以供作研究材料之用。

本來社會學家亦是社會人群之一員，參加活動的範圍甚廣，倘能將此種種活動詳加記載與分析，則社會學研究材料，亦將日積月累而相當可觀了。但是社會上有許多種活動是不易參加的，即便有機會參加，亦不過祇限于皮相而已。本文所論獄中生活，即屬於這一種普通社會學家不易切身經驗的一種社會 (或稱反社會) 活動。這裡所欲討論的，就是想在這種難得的社會活動體驗中，將局內觀察法應用的困難及其意義，加以分析，以供社會學者之研討。

拘留所或監獄，實爲社會法律制裁的一種機構。從社會

學上看，一個完整制度的推動，要有物質設備，有條例與實施的程序，還得有管理人（即是執行制度活動的人員），此外，則屬於受此種制度支配的人員，或享受此種制度所給予之權利的人員。

本篇獄中雜記中的「我」，即屬於特殊制度支配的人員一類。既受制度之支配，則身為局內人時，其觀察活動，亦受限制，因此，對於制度的整體不易作全部的觀察，所以局內觀察法在這種情形下，即受限制，即遇阻碍而發生很大的困難。但在有關機關賦予權利或機會自由觀察時，則此種困難較易解決。不過就本篇所載，這個特殊制度既屬於日本的軍事執行機關之一，則此種困難實無從解決，因而局內觀察法的限制，亦無法解脫。所以在此種特殊制度支配下個人的一切活動及思想，普通社會學家搜集材料的方法，只是向犯人詢問，並依照研究大綱的指導，務求被問者詳細答覆。美國罪犯社會學家 C. R. Shaw（見氏著：The Jack-roller 及 Delinquency Areas 二書）即採用此法。但是研究者，終未能親自體驗，對於身繫囹圄者的內心生活，難免有缺乏深切了解之說。

不過，反轉來說，已有此種實際體驗的人所寫出來的報告，是否會受主觀態度的支配而缺乏客觀性的嫌疑呢？其實局內觀察與局外觀察之別，即在前者很容易入于主觀的描述，後者則又偏于客體的皮相。社會學的問題，即在如何將二者的優點治于一爐。

一個受過社會學研究訓練的人，是否可以將局內人主觀的態度跟客體的表现加以適合的說明呢？我這裡所謂研究法的試驗，即求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至於答案圓滿與否，則要請讀者來裁定了。

假如主觀的態度與客觀的表现相符合，則社會學家無論抓住任何一方面，即可以了解個人是一個制度支配下行爲的意義。可惜實際上二者的關係往往是不太直接的，社會學研究的困難，亦即在此。

美國社會學家 F. P. Park 及 E. W. Burgess 主張：任何說出來或寫出來的態度，即已客觀地存在了。但是怎樣去利用這種說出來或寫出來帶有主觀性的語言態度呢？可惜他們二位都沒有詳細地說明。他們的意思，以爲假如研究者在理論上有深造，人生經驗豐富，則對於這種主觀的材料當可

客觀地利用了。W. I. Thomas 及 Znaniecki 二人合著的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一書，其偉大處，按照 Herbert Blumer 的意思，即在於二氏有其湛深的理論基礎，並有很豐富的人生經驗，才能將波蘭移民信札上及其他方面所有的主觀材料，盡量利用而發揮其社會心理理論的體裁。（見 Blumer 著 *Critique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 An Appraisal of Thomas and Znaniecki'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又拙著書評，見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II No. 1, Oct. 1940）

假如一位社會學家缺乏 Thomas 這種豐富的經驗而去研究一個社會學的問題，那末，他祇有親自去體驗一番了。我這次所寫的獄中雜記，就是帶有這種意思。

當我在拘留所及監獄內同時扮演著局內人及觀察者的地位時，我遇着很多的困難。第一，我沒有紙和筆來記錄我所見所聞以及我個人當時當地的行為及思想。因此，當我充任觀察員時，無論是觀察別人的活動，或是自己的活動，祇有憑着記憶了。但是我素來缺乏記憶力的，所以在

盡量記憶時，我的腦子可就大發氣力的了，同時努力記憶的心情也很緊張的。在當時以為可以牢牢記住，但過後慢慢地都遺忘了。依照心理學的說法，有深刻刺激性的事物，容易記着。不過所謂深刻刺激性的事物也得看個人對於事實的認識及接收趨向而決定。因此，我所記載的，一方面是所記載的事實的刺激性很強，它方面則因為我過去的訓練及習慣使我容易記住這種不平常的事實。而且，無論如何，所記載下來的事實，在我生命史上是曾經發生過作用的，對於我此後的生活，也許還有很大的意義。但是我不必否認，有許多事實，從第三者看來，或是從現在的我看來是很重要的，可惜已經被遺忘掉了。

第二，在一個人的生命危機中，常要作存亡掙扎的，因此，局內人的活動要支配着觀察者行為的。在我過堂之前，我認為假如憲兵部將燕京抗日的活動及與我個人有關的活動全部知道了，則死刑是有可能的，同時我常常在想，日本軍人是不講理的，即使在過堂之後，生命的安全，仍然沒有保障的。況且，缺乏健康抵抗力的我，不幸染病而歿的可能性也很大。這種思想常常使我不由己的放

棄觀察者的地位而單獨地過着局內人的活動。這種不由己的活動，在現在看來是很重要的，而往往就在這種場合，我無意識地用力記取，單憑刺激的強度來幫助追記罷了。

第三，在我大病期中，有幾次完全失掉意識，連自己是誰尚不知曉，其餘更不必提到了。因此，不但對於當時的情形，無從觀察，連過去用力記過的事情，也全部遺忘掉了。本篇獄中雜記，是病後慢慢地追憶，且又經過半年的休養，才動筆寫的，所以將它充作研究材料自然難免有很大的缺點。幸喜所寫下來的事實尚屬不少，或可供社會學分析之用。

第四，在我寫這篇雜記的時候，北平尚在敵寇統治之下，許多過激的話語，不易寫出來，誠恐被日軍查獲，而又重生是非。經過日子久了，爲着生活的逼迫，思路早已轉了方向，現在重新再來整理材料，從前認爲過激的話語，現在大部已被遺忘，那些追憶所及的又不易插入，因此整篇的記載，就沒有什麼可更改的了，這樣又難免缺漏一部分重要的材料。

第五，於已於人有害的話語，全部沒有寫出來。社會學

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間的行爲，但在現在階段的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仍有利害性存在的，這種有害的話說出來，難免會發生預想不到嚴重事態的，不過這種話不寫出來，自然是可惜的。社會學直到現在仍然沒有進到自然科學的階段，大部分就是因爲人類仍然沒有將社會現象當作自然現象去看的原故。社會學上本來有一種避免真姓名與真姓名的描述法，但這施之于與我們無關係的人當中，尙屬可以，若在自己的朋友看來，雖是假姓假名，也難遮掩得住的，所以這個社會學方法論的問題，在最近的將來恐怕也不易解決的。

因爲以上五種困難，雜記裡所寫的材料不能爲獄中生括全部，但希望是主要的那一部份。至於在以下所討論的特殊制度下個人的行爲時，都不是完全根據雜記裡材料的。雜記裡有許多材料或者是沒有採用處；反之，沒有寫出來的材料，無論現時在我記憶之內，或記憶之外，都有意無意地影響到以下的討論。

這裡所欲附帶說明的即普通所謂的洞視或明見(Insight)好像在討論社會科學問題時，特別有用處。許多難解的問

題，忽然有了解答，這就是得助于所謂洞視或明見的。洞視原來是一個很主觀的現象，直到現在，還沒有用科學分析過。客觀的說，我以為洞視是根據一種或多種已經遺忘的事實或是一種或多種不能公開的事實以及個人的經驗所生的理論而起的。自然這種事實及經驗要經過腦神經中樞的作用，才能表現于外的。至於腦神經系裡各種刺激反應聯繫線(S. R. bonds)怎樣發生作用的，這得等將來的生物心理學家解決了。這裡所欲指明的；即是洞視也得根據經驗，根據事實的，不過這些經驗和事實，或許不能公開，或許早已遺忘，而下意識地帮着解答問題而已，因此，缺乏經驗，缺乏事實，也就談不上洞視之明了。

(乙)特殊制度下個人的行爲

個人的行爲，簡單地說，起于刺激，但是刺激刺激無時無地不存在的，究竟那個刺激才能引起反應呢？社會心理學的答案是：除了刺激的強度外，還有個人的過去經驗，各種的習慣以及社會的習俗來決定。

個人行爲的分類，因此可以根据外界的刺激，亦可以根据行爲對於外界的影響——此即普通所謂行爲的意義。要

分析拘留所內或監獄內個人行爲類型，以根據刺激的類型爲合適，因爲這裡是要分析特殊制度——刺激——對於個人行爲的影響的原故。

一個制度，是由什麼來構成的呢？具體地說，個人所見到的構成拘留所的及監獄的要素是什麼呢？第一，很容易見到的就是物質設備，例如拘留所及監房的佈置和衣食住所需用的物具等。關於佈置方面，拘留所及監房都是很簡單的，除了牆壁，地板，屋頂，窗戶，及閘門外，祇有飲食所用的碗，杯，睡眠用的毛毯，大小使用的恭桶而已。因此，物質設備，非常簡單，但是要緊的所在，即在它的簡單。所謂文明人所需的設備，差不多減至最低限度，而近于野蠻人的生活了。更要緊的就是：牆壁不單是一種物質設備，而且還是一個控制室內人行爲的象徵——室內與室外(即拘留所或監房之外)變成兩個世界：一個自由的——雖然這種自由仍然受風俗習慣以及法律的限制，一個是不自由的。兩個世界的鴻溝，祇隔着一層牆，因此，這牆的社會意義實較它的物質意義爲大。

誰使這個物質的牆發生這般大的社會意義呢？這就是構

成制度的第二個要素，那就是制度的條件及實施的程序，還有第三個要素：執行條例的人員。對於室內人來說，條例的主要作用，就是限制個人的自由——衣食住行的自由，人與人交通的自由。一般執行條例的人員，就是室內人破壞條例的懲罰者。因此，執行條例的人員，特別是下級士官如看守者，他的一舉一動，與室內人的喜怒哀樂表情息息相關，而檢察官則因見面時少，所以還屬次要了。

最後的要素，就是室內拘留人數的多寡：各人性格及背景處處影響到個人的行爲，譬如孤獨生活與羣居生活發生着相異的作用。雖然在室內羣居生活有限，但正是因爲物質享受簡單，而自由受着限制，所以這種羣居生活對於拘留人，有如大沙漠中的清泉一樣寶貴需要。

拘留所或監獄制度，對於個人行爲的外形控制效力較大，至於內心生活，如個人的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的精神生活，則制度的物質設備以及制度條例跟執行條例人員的控制力是不能如預期奏效的。固然這些物質設備，條例，以及執行人員等於拘留人的內心生活有着影響，但是影響的性質和影響的程度却不爲它們所支配。關於這方

面個人過去的習慣，訓練和在外而原有的團體生活，都能發生各種影響的。所以，關於這種內心生活的變幻，就容易從特殊制度各要素所施行的刺激來決定的。

在一個特殊制度控制下個人所表現的行爲，概括的說，得可分爲：(一)類似行爲，(二)合作或共同行爲，(三)個人的個別行動等三類。從人類基本需求如衣食住等說來，普通任何人都有的，其差別祇是程度而已。在普通社會裡，因爲個人對於物質生活的支配權利相差很大，風尚習慣各有不同，而且滿足這種基本需求的物質種類亦甚多，因此個人的選擇色樣亦隨意變化。但在拘留所或監房內，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物質設備不但簡陋，而且款色一致，拘留人絕對無自由權選擇的，因此滿足這些基本需求的行爲，在外形方面差不多全是類似的。在局外人看來，這種類似的行爲，差不多佔據了拘留人整日生活的全部。在拘留所或監房內，合作或共同行爲可以說是已減到最低限度了。只有室內的清潔是由拘留人合作來維持的，拘留所的倒恭桶工作，亦屬合作的共同行爲之一類，其餘的共同行爲就很少見了，而且看守人最怕的也就是拘留人的

共同要求。但我們十一人同住西大監房時，曾有過不少的合作或同行爲的表示。因爲天氣冷了，一致地要求衣服

引起哭與笑兩種相反表示，雖然恨在心內，各人都會有

被褥，因爲飲食不良，一致地要求改善。星期日的公共禱告，亦是其同行爲之一。這種共同行爲，一方面起于類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却起于室內人的同類意識。這種同類意識是要靠室內人彼此認識，互相了解的。而在拘留所期間，燕京同人是隔開住的，所以這種共同行爲就不易做到了。自然，互不相識的人同處時間久了，也會發生共同行爲的，所以普通監獄管理人最忌的，莫過于犯人們彼此了解而生一致破壞的行動了。

在拘留所內，燕京人得到家裡送來的衣服換，送來的食物吃，因此，燕京人就跟他拘留人在外表行爲方面顯着一種等階的以及習慣的分別了。但是以普通拘留人論，室內人等級化的現象是不易存在的，反過來說，不同階級的人住在同一拘留室內，也會漸漸地表面上同化了的。

個人的個別或特殊行爲都起于相異的需求，相異的習慣，以及相異的刺激。如在室內人有疾病時，或被懲罰時，就常會表示着相異的行爲。同是染了疾病，有的會向看守者要求藥餌，有的會要求大夫來診治，或請暫時取保釋放到外面去醫治調養，亦有得了病，惟恐給日本人治療了的，因此情願聽天由命讓疾病自然消除了。

拘留人彼此間的關係，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現象。原來在階級，習慣，文化水準，職業等相同的犯人間，易于交談。若是從前曾經認識，或是彼此間有個共同朋友，則交談更能密切而親熱了，若在同一室內，拘留人多，則彼此之間，會因同類意識的深淺而形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交談群體。反言之，在一個拘留室內，雖彼此間物體空間距離相差不大，可是彼此間，因爲習慣，文化水準條件的不同，而發生很大的社會心理空間距離的。假如一個拘留室內，人數只有兩三位，而又是素不相識的，那末，爲着減少寂寞，就使文化水準等條件有着差異，也會衝破社會隔膜而交談起來，甚至會變成很知己的朋友。

懲罰痛苦程度的深淺，固然會影響個人反應的強弱，但反應的姿態却因個人的性格來決定。同是一種懲罰，可以

會隔膜而交談起來，甚至會變成很知己的朋友。

還有在拘留室內，人與人的關係，處處受着個人的脾氣以及其它的人格要素的影響，個人的地位以及交談的問題，也受着人格要素，文化水準等條件的異同而交互影響着。在這方面來說，拘留室內人與人的關係，實為大社區內人與人間關係的縮形，不過各種交互過程的外形較為簡單而已。

最後要提及的，就是拘留人個人的思想以及靈性生活上的差異。簡單的說，文化水準越高的拘留人，在物質生活越為簡陋時，他的思想越龐雜，而往往還會想入非非。至於思想素有訓練的人，常會利用這個閒靜的機會，作着將來工作的大計劃。有過宗教信仰的拘留人，在拘留期間，靈性生活必能豐富，即使宗教信仰思想沒有深遠的拘留人，在此時此地的情景中，也會作着各種迷信舉動的。宗教的社會功能，每在人類遇着死亡的問題時，給予生命的答案，在各種生活習慣各種知識失去効力時，人類仍然不願束手待斃的，所以在這種場合下，祇有宗教信仰才能使人類發生希望，感到慰藉。從社會學上來看，宗教信仰能使人與人的關係，因人與神的關係，而得到更鞏固的基

礎。到一個人為着大眾的幸福而犧牲自己時，社會就會慢慢地將這個人的生命神聖化了的。歷史上民族英雄的神化，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故吧？

拘留人生活的外表同點，多于異點，至於個人的思想，則變化較大。同在一個拘留室內，雖然外界的刺激相同，可是思想的變化，却就相差很大了。這就是因為思想的變化，受着個人過去文化薰陶的影響，大過現時地刺激的影響的原故。個人常意識到自己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因為個人的思想受着過去文化的薰陶以及對於未來計劃的影響，所以拘留人的思想，彼此間就相差得很大了。反之，個人的物質生活受着現時地的物質設備的影響，所以拘留人間衣食住行的外表行為就缺少變化而增加類似性了。

但是拘留人在思想上也有類似點的。第一，所有拘留人都希望生命得到安全，並且早日恢復身體的自由。第二，大部份拘留人都想念家屬以及親戚朋友，而且越親愛的人越被想念的。第三，大部份拘留人要求宗教的信仰，尋求精神的慰藉。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說，監獄的恐怖，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影響，較少于普通一般農工商等，因為越有知識的人，越受着自己過去及未來影響的。反之，普通一般人多為現時現地的生活所支配。所謂「殺身而不能殺其靈者勿懼」，大概祇有受過精神訓練的人，才能說的吧？出獄以後，我個人仍然受着自己過去的，現在的，以及未來的影響，監獄生活那一片斷的影響並不是日本軍部所預期的。如此說來，究竟監獄這個特殊制度，對於人類的行為，有什麼影響呢？對於社會秩序之維持有什麼作用呢？對於類此的問題，甚願國內外的學者多加注意哩！

附一 後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美戰起，燕京大學即被日軍強迫解散，我亦于是日下午失掉自由，直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出獄後，才又恢復了自由。在日憲兵拘留

所住了兩閱月，其餘的三個多月的日子，都在北平城東北角，日本陸軍監獄渡過的。我認為這個短短期間的生活，在我的生命史中頗有值得紀念的地方，因此，就草成這篇獄中雜記。同時，我對於社會學有着很大的興趣，乃又寫了一篇社會學註釋。獄中雜記是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動筆的，直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才完稿，而全是晚間寫的，有時寫三四頁，有時就沒有工夫寫。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聯合國軍投誠，我在興衝之餘，又將雜記重讀一遍，然後將社會學註釋草成。因為參考書不便，理論的出處就沒有加上附註，關於這點還請讀者原諒！我希望住過拘留所或監獄的讀者，能够化點時間寫出各人的經驗。這樣，社會學材料就可增加了，而社會學理論亦可減少空泛的程度。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于北平寓所

癸卯年七月十三日

趙承信先生贈

8

4/

1